

我

選

擇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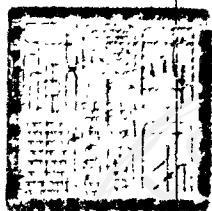
自

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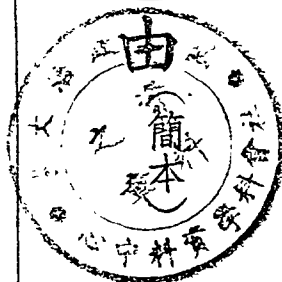


維克多·克拉夫青科著
勤宣譯·冰士節

我
選
擇
了
自



臺灣省教育會印行



108578

潘序

原始的材料，最爲史家所珍視，因爲是親身的經歷，而非捕風捉影之談。「我選擇了自由」一書之可貴，也就在這一點。這是一篇自述，作者爲蘇聯聯料委員會駐美代表克拉克夫青科，自述其個人的身世和生括，投身共產主義的經過，以及奉派至美，思想改變的原因。這不是第三者的間接記載，而是一件件親身經歷過來的事實，「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在文獻中當然最爲可靠。何況作者原是個共產主義者，爲主義而主義的信徒。他加入共產黨，全出於一片執忱，甚至於不顧他的父親的勸告——他父親也是個老革命黨。但痛恨共產黨的所作所爲，不能合他的理想。後來他又毅然脫離了共產黨，不願殺身之禍，情願做個亡命異國的流浪者，而其時他是黨的中堅份子，統治階級的一員，前途正無限量。這個思想上的人轉變，祇有讀過他那篇自述的，才知道這裏面有種種事實上的依據。他所說的話，出於至誠，是信而有徵的。

科學家勸人多用兩目，少用兩耳，「耳食」之談，不可輕信。培根說得好：「世界爲思想所桎梏住，而思想又爲言語所桎梏住了。」洛克也曾說過：「人們都喜歡用他人所用的字面，覺得滿意，好像這些字面的本身，有固定的意義似的。」卻不知有好多話，只圖說着好聽，聽着好玩，心裏舒服，並無固定的意義。「自由」和「民主」都是很好聽的名詞，大多數還不是人云亦云，說着好聽，聽着好玩麼？作者在他的書後中說：「我們蘇聯人民，連一點最小限度的經濟和政治上的自由都不曾有，卻要人相信是我們遠組織中，也有一種所謂自由，所謂民主，似乎與向來所謂民主，有點不同。」這是多麼沉痛的一句話！作者在國內時，四周全給密探包圍着，他的言語，他的行動，他的思想，他的靈魂，無一不受人監視。等到他



到了美國，又親眼看見這些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所謂「滾落」的資本國家人民，他才明白他所要的自由，不是那一種而是這一種，而決定了最後的出奔。他說他脫離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長期考慮的結果。他又說：「我要詳細，坦坦白白，切切實實寫出來給人看，這是我的責任。蘇聯人民不能把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希望，說給人知道，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們，勿再自欺欺人。」這幾句話，正可作為一般賁耳賤目者的當頭棒喝。

勞工政權，集體農場，五年計劃之類，我們都已耳熟能詳了。誰又想像得到所謂勞工政權的後面，仍是壓榨和奴役，其痛苦反十倍於沙皇時代？誰又想像得到所謂集體農場的後面，卻是一大箱的血帳——飢饉和恐怖？誰又想像得到所謂五年計劃中的天文數字，是這樣製造出來的？美國年來很關心蘇聯，調查研究，出版的書也真不少。但他們所看到的，只是外表而不是真相。作者曾說：「我出國時，曾領到兩本異常機密的小冊子，警告我們須留意資本主義者，達到他們問及蘇聯國內情形時，應該守口如瓶。」所以，研究蘇聯的書籍多，大都是「皮相」之談，讀後仍在五里霧中。無怪此書在美出版之後，要轟動一時，不脛而走了。

這本名著，經勳宣君譯為中文，信而能達，可說是一部好書。我們要平心靜氣地去讀這本書，不存絲毫偏見。事實俱在，請閱本文。

三十六年六月潘公展序於上海。

目錄

潘公展先生序

一	晚上的逃亡	一
二	在俄羅斯的童年時代	四
三	光榮與飢餓	九
四	在共產黨中的青年時代	一四
五	和過去分裂	一八
六	卡庫夫的一個學生	二一
七	機器的勝利	二七
八	農村的恐怖	三三
九	地獄內的收穫	三六
一〇	我遇到了第一次濟黨	四五
一一	伊麗娜的祕密	五〇
一二	尼古泊爾的工程師	五五
一三	快些！快些！	六二

一四	大蕭條時期	六六
一五	我的苦難開始了	七〇
一六	正義的尋求	七四
一七	夜半的拷打	七九
一八	自由的製奴隸式的勞工	八四
一九	當歷史在重編的時候	八八
二〇	西伯利亞的謊計	九一
二一	當歐洲在作戰的時候	九五
二二	意想不到的戰爭	一〇〇
二三	莫斯科的恐慌	一〇四
二四	戰時的克萊姆林宮	一〇八
二五	兩種真理	一一二
二六	到美國去的前奏	一一八
二七	史達林的海外部屬	一二二
二八	因不公平而出亡	一二七
	書後	一二九

我選擇了自由(簡本)

維克多·克拉克青科原著
功宣譯·冰士節

克氏此書，近六十萬言，敘述雖詳，檢閱則難，故刪繁就簡，約存十一，情節並無脫漏，字句仍依原文，不失本旨，取便誦讀而已。——節者識。

一 晚上的逃亡

在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坐了一輛街車，從寓所到聯合車站，差不多每一分鐘都在顧慮到危險。我住在這城內已七個月，經過這條街也有幾十次；每次都是心地輕鬆。這一次可就不同，——這一次我正在逃亡。我在華盛頓，寄寓於一美國家庭中，他家對於我這位生客，很友好而慷慨。我的房租，總在一星期前預付。但我離開寓所的那夜，我沒有提到這是最後的晤面。我祇同他們說，假使到星期二還不能回來，我允許他們將這屋子出租。我恐怕蘇聯聯料委員會或前前來問訊，我要我的房東，真的一點不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

我在委員會辦公室內，已經有好幾天裝作頭痛和不舒服。那天早晨，我無意中和幾個同事說，我最好這是在家裏休息，星期一恐怕不能出來辦公。我竭力想隱蔽他們，希望我的逃亡可以遲一天發覺。我收到了三月份薪水，就主張要結清我最近的旅費賬單。我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對我逃亡的解釋，絲毫不能加以

在金錢上舞弊的罪名。我並且把我的文件，整理清楚，所有剩下未做的工作，別人立刻可以接辦。

這是一個寒夜，天上一顆星都沒有。車站上似乎都給恐怖所籠罩。假使我在此地撞見了同事，他們張揚起來，那怎麼辦？既非因公出差，帶了這兩只手提箱，當然可以立刻引起他們的疑心。假使黨洛夫同志，或魯登古將軍，已經發現了我的計劃，那又怎樣？正在惶恐間，我瞥見一個穿紅軍制服的人，頓時覺得渾身戰慄，偷偷地沿牆溜走。

我特地坐在平民車中，減少碰到熟人的危險。在遺黑暗，擁擠，和寂寞的火車上，我獨個兒沉思。我正在將我過去的生命，連根斬除。從那天晚上起，我把自己造成了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朋友的人。我和我的親友，骨肉，將永遠不再見面。在我生命中，將永久留存着一種空虛，可怕的空虛。在我的祖國中，我將成爲一個正式逃犯及流亡者。我的政府將判我死刑。祕密警察將追蹤我，監視我，甚至牽了他們主子的命令，來處死我。在我的故鄉，愛我的不必說，凡是我的朋友，都要永遠受着嫌疑。因爲要救他們自己，他們都否認和我發生過什麼關係。

假使我慈愛的祖父，沙皇與上帝的忠僕，飛烏特·配姆泰來維基，現在還活在世上的話，他對於我的舉動，作何感想？又假使我的父親，執事的蘇聯革命黨人，在野蠻德人的佔領之下，再能多活兩年，他對於我的舉動，將怎樣說？祖父從來沒有明瞭過，何以他的兒子安得烈，即我的父親，一定要反對沙皇和其他傳統上的習慣，但常在黃罵一番以後，反而爲他祈禱。至於父親，雖愛他的妻子，然而因爲要達到他的目的，不惜使我們餓餓哭泣。我絕對相信，他可以諒解而且贊同我的行爲。我想到同我很友愛的哥哥康司坦丁，他是高加索前線的軍官，爲了保衛祖國，抵抗納粹侵略而陣亡。難道政府的報復竟要施於我母親，一個剛從德國集中營裏釋出，孤苦無助的老婦人身上嗎？或許也會施於三年來曾做我妻子的人，雖然她

對於我的逃亡，是完全不會知道的？

這種思潮，在我心中起落，直到列車於星期日清晨三時抵達紐約車站，方才稍減。在月台上，我又遇見了那個紅軍軍官。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我，但我仍向後略退。我用一個意大利人的名字，借住在一家郊外的小旅館內。我住的房間，狹窄，陰濕，令人煩悶。我闔上了門，在半明的電燈下，做了一篇宣言，其中一部，將於兩天後，在全美各報上披露。

如果有人在這最緊張的幾天內，注意到我的詭譎行爲，或許以爲我闖下了大禍，但我既不犯捕案，更不會殺人，我所決定的，不過是放棄我國政府的經濟使命而已。我敢說沒有一個美國人會想像到全能國家的人民，犯罪的含義與後果，更有比我所犯的來得可怕。這是最大的叛逆行爲。他的生命不過暫寄。蘇聯人民，如有接見他或善待他的，即等於政治上或事實上的自殺。我所採取的步驟，任何蘇聯人民，決不肯因一時高興，而輕於嘗試的。這種舉動的起因很遠，純粹是內心的表現，漸次萌芽生長，終至無可抑制。我做這事的原因，不能從表面上去猜度，一定要向深遠的地方去探討。換言之，要在一個人整個生活的關鍵上着眼。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星期一，我接見了幾個新聞記者。那天深晚，這件新聞，就在紐約泰晤士報封面上揭載着。這時間的支配，很關重要。假使我的蘇聯上司，在此項新聞未公開發表以前，就知道我的行踪，駐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館，將立刻向美國務院宣布我的罪狀，甚或指我爲德國的間諜，要求立刻將我逮捕，押解回國。現在美國人民都已明瞭這事實的真相，而且正在注視其發展，蘇聯大使館，至少是棋輸一着了。

泰晤士報的標題爲「蘇聯官員在此辭職」，原文第一節說：

「指斥蘇聯政府，表面上似乎顯與英美合作，而實際上採取雙重外交政策，痛責史達林未能將公民所應得的自由，給予蘇聯民衆，維克多·克拉夫奇科，駐華盛頓蘇聯聯料委員會官員之一，昨日在此間宣布辭職，並請求美國輿論界予以保障。」

「克氏護照上的官銜，爲「蘇聯政府代表」……乃紅軍中一上尉，在去年八月來美以前，曾任莫斯科大型集團工廠的指導員，以前則曾當過機械股主任，該股隸屬於人民委員會。克氏自一九二九年起，卽爲共產黨黨員。並在蘇維埃政府中，歷任經濟要職。」

「克氏爲愛國起見；拒絕談論蘇聯的軍事動態，及經濟詳情，尤其關於運用租借法案的各點。」

其後卽是原文全部。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向美國民衆，祖國同志，解釋我何以要出此驚人的舉動。我寫了劃去，劃去了又重寫，可說是用盡心血的。

我決定對蘇聯及其他在特務機關控制下的國家宣戰，並非出於意外。要解釋他，我先敘述我的一生。

二 在俄羅斯的童年時代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印象，對於安得烈·飛烏特羅維基·克拉夫奇科的三個兒子——康司坦丁居長，我第二，猶備尼最幼——較之其他個人經驗，更深刻一層。這雖是局部的革命，只限於伊加坦立奴斯拉夫一城，只限於與吾父親有關的一切，但在我們心目中，我們的父親，才是起事的真正領袖與英雄。

總罷工是叛變的前驅，而鐵路工人的罷工，又是大罷工的開始。父親是在伊城一個鐵路工廠內做工的，也是罷工委員會的一份子。他在沒有希望的戰爭中，努力掙扎。父親如果在那次十月的晚上，給他們提

去，恐怕要當作叛徒絞死。在他逃走以前，他不肯放棄和他的妻子，康司坦丁，及常和我們住在一起的外祖母，作最後一見的希望。他就在半夜裏抄小路走回來，到達了加拿脫納街八號，那就是我們的家。

他嚇地怔住了，屋內燈火通明，並有騷動的聲音，這一定是警察在搜查屋子。但他不能往後退，便爬上窗沿，留神向內張望。他發現到他是錯了。他輕輕地彈了彈門，外祖母就迎出來，並且示意教他不要作聲。父親直向臥室中跑，但她阻住了他。「丹雅正睡着呢。」她說。然後帶着微笑：「是的，又是一個男孩。」她跑到臥室中，立刻取出一個襪襪來，放在父親的臂上。

這就是我誕生之夜。

突然，我哭鬧得這樣利害，把我母親吵醒了。「這個叛逆！」父親溫和地說。以後在喜歡的時候，我常常喚我爲「叛逆」。他那時正溫柔地向他的妻子話別。

我的一生，在最初九年中，父親只是一個生客，他從沒有和我們親熱過。最使人興奮的，是他在逃亡中的省視。我從母親和外祖母的言語中，從革命同志密談的片段中，約略地得到我父親的印象。常常有逃亡的人，避匿在我們的家中。康司坦丁比我大十八個月，供給我全部情報：「爸爸並不是個強盜或刺客，他是個政治犯。」

有一聖誕節晚上，我在世間的第三個聖誕節，外祖母從好夢中喚醒了我們。「來，向你們苦命的父親說聲再會，」他泣着說。我們都穿着長的睡衣，睡眼矇矓，拉了外祖母的手，走到客堂裏面。母親一面在啜泣，一面在整理着手提箱。外祖母領我們到基督聖像的一角，喃喃禱告着。一個男人，我知道是我的父親，舉了我起來，把我緊緊抱住，吻了我許多次。但這一夜他有些異樣，——面龐慘淡，鬍子已剃去。他把康底亞也抱在臂上，和他接吻。於是外祖母就領我們離開了那間屋子。在門口，遇到了一個魁梧的長得

憲兵。以後我纔知道，父親本來是躲藏着，但決定在聖誕之夜，來探望家族，而警察突然到家裏來搜捕。在未將犯人帶去以前，只給他一小時去收拾行李。

又有一天晚上，來了一個長個子，很漂亮的學生。母親倒了一杯茶給他。他說關於那天晚上越獄，樣樣都準備好了。假使沒有什麼牽累，安得烈在半夜以前，一定可以回來，但他祇能逗留三五分鐘，母親一定要替他準備好出門的用品。在亞密斯拉夫脫林諾城，有一個藏躲的地方，並且有最好的身份證明文件，在等着他。第二天，母親同外祖母常常在哭泣，那高個子的學生，充滿了憂鬱的情緒，遲遲消息。

亞城感化院大越獄的計劃，遭遇到了懷慘的失敗。雖然也會偷運進了幾把刀和幾枝手鎗，那叛犯是很容易的給抓壓住了。父親似乎是受到鞭打，差一點給他們打死，送進了監獄醫院。假如他仍不死的話，恐怕要判決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也許寬處絞刑。隔了幾月，那個學生又來過一次。母親很緊張地說：「你們將要看到爸爸。」馬車早在門口，一直向那廣闊的普希金大道而去。不多時，我們望見了在城中心的一所灰暗古老的監獄，車夫就走了下來，理着鞭帶。母親的腮脰與發地張着：「這兒，這兒，這就是你們的父親！」我竭力地看，隱約有一個人在那兒把手巾擄着。康底亞也高聲喊着，「爸爸，爸爸！」於是車夫重復回到了原位，開始趕着馬走。外祖母常這樣說，父親還一次沒有被絞死，真是一個奇蹟。不知如何，他的刑罰竟會減做普通監禁。

那時我年紀太小，所以未曾想到克拉夫背科道一家，當家的人已關了起來，是怎樣過活的。猶僅尼在這時已去世了。母親常要替別人家修補衣服。有一夜，——這時我已經六歲了，——我無論如何睡不着覺，蹣足走到門口，向外望着。我只見母親在燈光下，低頭做着女工。「母親，你怎麼還沒睡覺？」我問。她抱我坐在膝蓋上說。「我想你一定懂得，要養活這許多人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維底亞，如果你和祖

父一同去住；這事情可就容易辦了。你可以在那兒上學，我們也可以常常來望你。秀萊姑母明天來接你，你現在可以去睡了。」她不經意地把我推下牀來，但我知道她正在抽噎。

亞力山圖斯克是個清潔安樂的小鎮。克拉夫肯科的一家，祖父飛馬特·配恩奈來維基，祖母耐德里亞·麥克西摩夫那，和秀萊，他們老年所得的女兒，靠了並不十分豐厚的恩俸，加了他三所小宅子中二所的租金，在那裏過着簡單而舒適的生活。祖父快要八十歲了，是個很自負的人，鬚鬢已白，大腹便便。在一八七八年，他曾參加過俄土戰爭，以下級軍官的資格退役。祖母比她丈夫年紀要輕十二歲，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老太太。她的幽默，常使祖父無法對付。每逢禮拜日，祖父穿上他的戎裝，一身輝煌的藍色軍服，胸前掛着許多獎牌和十字勳章，挽上我的小手，一起上禮拜堂去。

祖父對於他的孩子，也很覺得滿意！雖然他的嚴厲的信條，是不准他陷於溺愛的。他說：「安得烈究竟要些什麼？我罰著一點也不懂得他！」他爲了我的緣故，有時又故意說：「安得烈坐在監牢裏，這是確確實實的，但並不爲了偷盜，或謀殺，祇是爲了政治，這是不可一概而論的。」母親信中，常有一些關於父親的消息，祖父有時會壓制不住自己，對於這倔強的兒子，加以痛罵。有一次，我實在怒極了，竟去咬祖父的手，他却反而來安慰我，因爲我肯護衛我的父親。他說：「我們克拉夫肯科一家，都是忠義的。」我們所過的生活，是一種半軍事式的訓練。祖父教我無論天氣怎樣壞，要在露天用冰冷的水洗浴，「像一個兵士」。他教我忍受痛苦，不准啜泣，早期受到磨鍊，不懼寒暑。在公立學校裏面，我結交了許多朋友，讀書進步還不算慢，然而很頑皮。年青的許都加的亨是鎮上富翁的兒子。坐了一輛華麗的馬車，有人護送着。他喜歡把袋內的金錢，叮噠地敲着作響。這是不能不罰的罪狀。有時他設法用金錢和糖果來運勸我們，但我們常常先收了他的賄賂，然後給以相當限度的打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正九歲。生活突然充滿了興奮和情感。教員簡直連教書多無心了，整天的講着愛國。祖母也爲此而灑同情之淚。但祖父對於家族的號令，更來得剛毅而嚴峻。他現在差不多天天都穿上那身藍地白邊的軍服。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的一天，我和祖父剛捉魚回來，忽聽見門上有剝啄的聲音。祖母連忙跑去開門，我們就聽見她興奮過度的叫喊：「安得烈來了！」真的，這是我的父親，衣服穿得很整潔，和藹可親，更像個父親。他吻過了他的父母和妹妹，便走到我面前，舉起我來擁抱着。

沙皇會對某幾種的政治犯，下令大赦。父親因此得到釋放，特地來探望他的父母和兒子。祖父喜出望外，但在吃晚飯的時候，忽然又無法抑制了。「安得烈，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坐在監牢裏，和罪犯一樣？你難道對於妻子沒有一點責任心嗎？」父親忍耐地聽着。「爸爸，」他說：「我希望你能了解我。我要人們自由和快樂。我要全人類過着人的生活。我要打倒專制政治和奴役經濟，有了這一代的犧牲，然後後一代將更快樂，更文明」。祖父想了好一晌：「你所說的並沒有錯，但我尚不能明白。我會效忠沙皇，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都是如此。但是，安得烈，你可不同了。假如你是錯了，兒子，我祈求上帝饒恕你。祇要我生存在世，我決盡我的力量來扶助你的子女。」

第二天早晨，我們參加了一個愛的國示威運動。父親領我坐在公園內的凳子上，一面吃着滑冰冰淇淋，一面談話。他告訴了我獄中的生活。「我要你終身記着這許多事件，永遠爲自由而奮鬥。沒有自由卽沒有生命。我們不是做人家的牛馬，是要做人，既要做人，就不願做奴隸。假如我的同志們和我都失敗了，我們的子女，就得繼續我們的工作。」

那夜他就回去了，答應我在聖誕節可以回家省親。

以後幾個月似乎過得很慢。母親寫來的信很愉快，因為現在父親又重新做工了，她可以無需再替人家縫補，件件事情都很順利。最後秀萊姑母帶了我一齊上火車。其餘的人，含着眼淚，在月台上揮手。

等我們到了家裏，大家便無所不談。母親的眼睛沒有離開過我，「你的氣色真好呀，維底亞！」這一夜的聖誕聚餐，外祖母第一個起來獻辭：「感謝上帝，使我們都能生存，康健，住在一起。」然後父親立了起來說：「我提議我們大家為今夜坐在監獄裏的同志共乾一杯！」我們在聖誕樹的四週，唱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民歌與各種革命歌曲。

我回到亞力山圖司克，又住了十八個月，直到一九一六年，才修畢小學課程。

畢業那天晚上，家中又有一件極興奮的事情發生。父親的兄弟，彼得，忽然從前綫請假回來。他和我父親全然相反，放縱，樂觀，喜歡說說笑笑。聽見我的畢業考試成績優良，他笑着請求我要學他的榜樣，不要去學我那十字軍的父親。「讓別人去救這世界罷，維底亞，」他大聲說着：「救你自己已很够了。人生在世，不過活一次，我說還是享受一點的好。」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故鄉，幾個月後，進了中學。猶僑尼在小學，康司坦丁在中學二年級。父親現在每月可賺八十至一百二十個羅布，還在工人，已是很好的收入了。母親比較的快樂，但父親却似乎仍傾向於憂鬱方面。

三 光榮與飢餓

一九一六年冬季，象徵着凶兆似的，趨於沙皇制度的沒落。戰爭進行得很壞。人民的怨恨，也更公開

，更激烈。前綫軍士，成羣的逃亡，紀律崩潰。教員也不再禁止學生發表革命論調。父親的朋友們，談着如何去激動「羣衆」。經過了工廠內一連天的忙碌，父親很少時間休息，全是開會，討論。我們的家成爲西伯利亞流成區域之亡命者的中途站。我們小孩子往往給關在會客室外。父親雖然沒有空，但仍設法在幾個晚上，和我們同讀漢臣，托爾斯泰，及其他作品，闡釋他對於解放我國及人類自由的見解。

暴風雨終在一九一七年爆發。革命本來是一個很熟悉而又半禁止的名辭，現在突然地公開了。空氣中充滿了標語。新名辭在我們心中，如爆竹般的炸裂出來，共產黨，社會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黨，……開倫斯基，米里柯夫，列甯，托羅斯基……赤衛軍，白俄，遊擊隊。有一天，大家示威遊行。父親在演講台上，發表演說：每個人似乎都認識他。他的聲調鏗鏘，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他說，「現在人民都得到自由了。這是值得奮鬥的！」

然而這革命的蜜月，不久就變爲分裂，爭執，和艱苦，熱忱化做了忿怒與怨恨。同時食物更覺稀少，木煤柴油，似已絕跡。有幾個工廠，斷斷續續的做着工，其餘完全關門。每一天過去時，父親愈加沮喪，愈加靜默，比我從前所見在危險的年頭更容易發怒。我有時請他解釋，何以有這許多黨和這許多黨綱；他也似乎覺得茫然。

父親到羅馬尼亞前線去，那邊正鬧着煽動工人。他留在那邊，直到十一月中。當時聖彼得堡的共產黨，由列甯與托羅次基領導，已經掌握了革命政府的實權。他回來講戰爭是過去了，兵士們都丟了他們的鎗，跑回家去。我們年輕的，對於混亂狀況，一些不懂。唯一確實可靠的事實，那就是饑餓與寒冷。貨幣失去了他的價值。商店的櫥窗內是空虛了。我們將每一塊麵包皮珍藏起來。

有一夜，我正在讀屠格涅夫的小品文給外祖母聽，她伸出手來撫着我。我繼續地讀着。不久，他的手

又放鬆了，我以爲她已入睡。但當我向她仔細看時，祇見她張大了眼睛，異常安靜。「婆婆！婆婆！」我驚呼着，別人也都匆匆跑來。外祖母的去世，我以爲也是革命所給予的例子之一。她在未忍受飢寒以前，本是個很壯健的女子。

在極北的俄羅斯本土之一部，不多幾月，蘇維埃聯合政府即告成立。在其他部份，尤其是我們烏克蘭，仍在內戰。混亂局面，可說是野蠻的，流血的，和無意識的，甚至於罪惡的，延續至數年之久。

秀萊姑母從亞力山圖司克發來電報，問及彼得叔父會不會偶然和我們住在一起。父親立刻打回電去說：「他並未來過。過了幾天，我們又接到一封信。彼得已發見了，是給人家暗殺的。我們假如能去參加葬儀，或可使老人稍減悲思。父親立即出發，決計帶康底亞與我同去。」

彼得並沒有參預革命的狂潮。他以爲生活是很簡單的，祇要人們不作無謂的擾攘，肯加改良，生活也可以說是很快樂的。至於革命，那不過是給他可厭的障礙而已。他從前總回來後，就拋棄軍服，謀到了亞力山圖司克一家小銀行的董事位。我們上火車後，都奇怪着他怎樣會死的。

火車擠得氣都透不過來。突然在車子兩頭，站着幾個武裝的人，正在搜取錢財珍寶。「你有些什麼？交過來！」一個土匪向我父親狂喊着。「我有些什麼？」他帶着微笑，很鎮靜的回答，「一只錶，幾個羅布，以及我兩個孩子。」

等到搶劫完畢，土匪們才一個個的跳下車去。

我簡直認不得亞力山圖司克了。從前銷燬我童年的那所住宅，已變得怪可憐了。我們不及參加葬儀。祖母擁抱着我們：「你的和善的叔叔，彼底亞，是沒有了，死了！他們殺死了他。」祖父看見了我們，和我們點一點頭。「安得烈，」他悲痛地說：「人民互相殘殺，轟擊，搶掠，給我們大衆受飢寒的痛苦！這

並不是革命。」夾着憂愁和憤怒，他的聲音高了起來：「德國人並沒有殺死我們，像我們自己所做的！父親始終一聲不響，低下了頭。他覺得用言語來解釋是無效的。祖父立起來，揩去他頰上的眼淚：「安得烈，希望上帝饒恕你，和你父親饒恕你一樣，」轉身向他的妻子說：「奈得亞，請你給孩子們吃飯，叫他們去睡覺。」

我們帶了幾顆沉重的心，回到家中去。幾個月後，祖父就死了，隨後祖母也跟着去世。

近高畢謀的伊利英別業，在尼泊河邊可算是最富饒的產業。革命以後，給城市中的工人做了農業合作社，亦稱「實驗區」。這批移民約有「百家，組織了一個警鐘社。我們克拉夫齊科是其中的一份子，差不多住了四年。事實上父親是這個計劃的發起人。

這時候，共產黨正利用他們的祕密警察，拘捕大批民衆，假借極微細的理由，置人民於死地。父親會有好幾次被邀加入共產黨，但他拒絕了。即在紅色的旗幟下，他總是很率直的說，他對於迪克推多制的恐怖，不發生興趣。他仍是一個爲了世界進步而奮鬥的「孤軍」。

內戰實在永沒有離開我們多遠，有幾次險些將我們的實驗區毀掉。康司坦丁和我，現在皆已長成，加入了父親和其他領袖所組織的武裝自衛團。連我的小兄弟猶德尼，也學會了打靶。

在一秋天的薄暮，有一輛農家貨車，正向我們跑來。車中有四個男子和一個女人。這女人，約三十歲，面貌清秀，身上佩着護士符號。內中一個男子穿便服。兩個男子穿「却加」軍服，「却加」乃是新組織中人民見了懼怕的蘇維埃祕密警察的名稱。第四個男子着的是水手軍服。

這便衣人員，介紹他自己的名字爲李霍梅奴夫。他說有一隊白俄，正在追蹤他們，所以一定要借兩匹新馬，纔能逃走。假使我們要還馬的話，可以跟他們一同上卡門司科驛站。我們一切同意，於是七個人全

上了車。

我們在晚上抵達卡門司科驛站，住在一所小屋內，在黑暗中解衣入睡。過了幾小時，我忽然聽見護士在喊着，「不要來犯我，你這禽獸！」月光使我看清那水手的衣服有一半沒穿好，正和這女人撕扭着。她拚命的抵拒，頭髮散亂，衣服也給撕破，胸脯都露出來了。

那水手瞧見我在坐起來，立刻放手逃了出去。我不能再睡了。她告訴我，她是一個沙皇的高級官員的女兒：「當革命初來時，我用整個的心去歡迎他，因此我纔和我的家庭破裂。我現在祕密警察隊中服務。他們所作所爲，有許多我不很喜歡。」

當那天清早騎馬回去的時候，在途中我們瞧見有許多死屍，大多裸露，祇有少數穿着皮靴，可見死者衣服，都給活人剝去了。

一九二〇年的秋季，我同康司坦丁都考取了卡密薩洛夫加的農業學校。這校雖屬蘇維埃管轄，但在學術範圍之內，絕少政治作用。科學耕作的淺管，使我在集合農場時代，得益不少。

獲得食物的困難，每天在增加着。我們在習慣上已吃得很少，但仍須籌劃着第二餐的糧食。在這春天，一車一車的紅軍隊伍，開到前線去，那時正在醞釀着波蘭戰事。我們就偷閒在火車站用學生流動理髮店的名義，開始營業，「極誠服務，實物報酬」。我們常帶回去很多的麵包，豬肉，蔬菜，和別種物品。

很快的運部好運也就完了。沒有人再有多餘的食物，可以作理髮的交換品。學校裏既沒有食物可吃，我們便一起回到了實驗區。在那兒我們又失望了。我現在已十六歲。在卡畢諾，輾轉警鐘社沒有幾里路，有一家小型的冶錫廠，我找到了生意，做一個鎖匠的學徒，用勞力來換得人家的報酬。

內戰差不多要結束了。蘇維埃是毫無異議地掌握着政權。我很熱心的聽黨部派來的宣傳員演說。我知

道父親反對苛刻的共產政策，但漸漸覺得父親的品行太方正了，他的理想，無論如何有些「舊式」。

一九二一年的夏季正是饑饉的高潮，同時傷寒症流行，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政府雖提防着瘟疫的蔓延，禁吃已死的牲畜，可是一轉眼便吃光了，連樹皮都剝了下來泡着喝，沒有確過的皮革也有人嚼着過活。田內連一根柴和一片草，都給拾完了。農家吃死人的故事，愈演愈多。死亡——有的全身腫脹，有的面黃肌瘦，——是我們生命中最平凡的事實。我們都祇能顧到自己的生存問題，無暇想到別人。

我和實驗區內另一個孩子山雅，一起乘火車到北方去找尋糧食。我們帶了許多可以掉換食物的東西去，如日用品之類。我們亦帶同狗，足使一家再延長幾個月的主命。以後幾個月內，我又出去旅行過好幾次，覓覓食物。

新收穫在開始了，我才回到了高畢諾廠的鎮匠部去。

四 在共產黨中的青年時代

一九二二年夏季，新農產物已生長高大，帶來的是一種希望的萌芽，與生存的興趣。數百萬的死者都已埋葬了。我現在將近十七歲，決定要做礦工。高畢諾俱樂部演講員說，「同志們，我們蘇維埃共和國所需要的強壯工人，圖內資盆地的煤礦，就需要好幾千。」

山雅和我逆而視，心中都有同樣的決定。當我在家中發表我要到煤礦中去時，父親面上，很露憂色，母親低低的吸泣着，但他們也不想阻止我。母親連日替我準備衣服和行李。

我們被派到亞爾契夫斯克區的鐵礦中去。這是圖內資盆地內一個最老的煤礦。我們第一夜住在那又長可

暗的勞工宿舍內，睡在那雙層床的光板上，污濁的人氣，腐臭的食品，和惡劣的煙味，都很令人難受。爲了長途疲倦，我睡得很甜，早上醒來，發覺衣箱都給人偷去了。到鐵工區中去觀光了一次，也絲毫提不起我們的精神。煤灰的濃霧，籠罩了每件東西。用我們自己的雙手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幻想，是很快的消滅了。山雅被派到煤坑中，但工會職員主張派我在管理處工作，運用槓桿和算盤。宿舍中的生活是粗俗而醜惡的。人們喝着伏特加酒，喝醉了就吵鬧和打架。有幾個在賭錢。我個人的生活，當然集中在俱樂部方面。我的讀書慾曾受內戰和飢饉的影響，現在又服了一帖興奮劑。除了圖書館內能得到的書以外，我們還互相借讀。

回想到我成爲共產黨員的私人歷史，我應追溯到拉柴來夫同志來的時候，那時他正連續地演講着社會主義問題。他年近三十歲，是位大學教授。一晚，他在圖書館內見了我，他要知道我現在看些什麼書。「列寧的讀過一些，」我回答說：「但沒有讀過馬克斯。黨義當然是讀過的。」那夜我們談上了幾個鐘頭，關於書籍，共產黨，及蘇聯的將來。拉柴來夫說，我應當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然後再加入共產黨，當然，他承認這青年團也不能說是盡善盡美。事實上我贊成他的言論，並且早已決定了我的志願。

當拉柴來夫同志動身到莫斯科去時，我也跟了一大羣人聚集在車站上送別。「你也在這兒，維底亞，」他獨自和我講。「我偶然聽到你已經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真好極了，恭賀你！但你爲什麼不先告訴我？我早就可以舉薦你呀。」「我知道的。我很感激，但我想要靠我自己去做，……不要人家照應。」「或許你是對的，」他微笑着。

我在「工業波濤」洶湧之地，饑區中間，加入了青年團，更含有神秘的意味。現在再沒有空餘的時間，可以從事娛樂。發現了我能寫作，又有天生臨時演說的口才，我便立時成爲一活動份子，在各種委員會

中服務，在非黨員中做着宣傳工作。因拉柴來夫同志代為請求，我被調到煤坑內工作。我請求去做最困難與最危險的工作。爲了要把事實來表現我的熱忱，有一煤礦爲水所淹，提防着坍塌，用木架撐住，但工作仍不斷地在進行，我便自告奮勇去開採這煤礦，做個榜樣。我在礦穴內努力地工作着，突然這礦口的一部份已崩陷了。待我再張目四望的時候，我已一個很敞亮的房間內，病床一排排地放着，我就睡在其中的一張床上。一個穿白衣的醫生，正按着我的脈息。在醫院內兩個月，我成了一位英雄。醫生們禁止我回到煤礦中去，所以我準備回到警鐘社實驗區。

消息傳來，列甯已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逝世。每一個人都感覺到列甯之死便是個人的損失。幾天之後，我們在本地報紙上，讀到約瑟夫·史達林在莫斯科紅場上列甯墓傍的宣誓。這是一篇很簡短而又差不多像祈禱式的諾言。他說要遵循着已故領袖所指導的途徑做去。史達林在政局中是很有勢力之一員，共產黨的總書記，開始即是新政體的重要份子。然這還是第一次我眞眞注意到他的存在。從那天起，史達林的大名，逐漸傳播於全世界。

我回到了實驗區。在茅屋窗口，看到母親是更老了，比前消瘦，鬚髮也變爲斑白。我輕輕地推開了門，「維底亞，吾親愛的！」喜極而流涕。這實驗區差不多已完了，只有三四家仍過着耕稼生活。父親和我的弟兄已回到蘇伯洛屈洛夫斯克去，賺着很好的工資。他們希望在來春能找到一所兩間或三間的公寓，一家又可團聚。父親同我小弟弟都在貝屈洛夫斯基·列甯冶金廠內做工，我也加入了他們的機械實驗室。康司坦丁又在另外一個工廠內有了生意。我在廠內差不多做了三年。直到我廿一歲的時候，才遵照條例，被征至紅軍中服役。

過去幾年，並不能使父親對於共產黨感到滿意。他不能抑制他常要發洩出來的尖刻論調，把官吏與高

級公務人員的豐厚生活，和平民所受的痛苦，互相比較。至於猶僅尼與康底亞則對於政治多很冷淡。他們工作勤奮，並不參加其他活動。「你確有做共產黨官員的資格，大哥，」猶僅尼取笑着說：「祇要你不給父親所幻想着的人道主義所誤而走入歧途。」

一九二七年的春季，我正懷戀着我的情人，名叫安娜，祇有十七歲，很惹人愛。安娜的父親，是鐵路上的總工程師，和新的蘇維埃社會並不十分契合。她的母親，尚保持着革命以前的態度，看輕「普通人民」。雖在我初戀達於沸熱的時候，我仍有一點不能忘懷，即安娜實非「吾匹」。我倆都承認，結婚決不可能，——因為在思想上是完全矛盾的。後來我和安娜便如勞燕一般，東西分飛了。十四年後，我才再遇到她，那是在莫斯科的一個防空壕內。

一部貨車內，共有二十四人，都是從蟲伯洛貝屈洛夫斯克來的新兵，被送到土匪出沒的區域中去的。音樂和游行，歡迎着我們。後來我很奇怪，爲什麼這邊境防衛隊，不從他們自己的人民中間去招募。最後我纔知道，紅軍踴躍處處裝作同志，實在是一枝佔領軍隊。

我們的軍事訓練，開始是蒸氣沐浴，衣服消毒，頭要剃光，和我們的面部一樣，此外還有政治演講。我早已加入軍部機關報，「赤色邊界防衛隊」的編輯部，在青年團軍隊裏，很嚴肅地負起責任來。軍事機構中，除了嚴格的紀律以外，大部尙稱民主化。我們在軍報上常常能批評環境，批評長官，時常直斥其名。

訓練完成後，我們被派在晚上去搜查販私貨的游擊隊。有好幾次出征，一無所遇，不過大家互放幾槍。有一次，我及其他數人，奉派到前哨去。原駐那處的兵士，看見我們到來，都喜出望外，因爲他們可以調到後方去休息。內中有一位是從基輔來的，留下他的愛馬，交给了我。這匹馬脚步穩健，雖曾幾次救我

性命，但我之結束軍事生活，他也要負些責任。那天深夜，我同另外一個兵士，在離開前哨線很遠的森林區域中巡邏，相距不遠，忽聽見有嘈雜的聲音。我便大聲下令止步，隨即一齊向前衝去，那馬忽然跌倒了，連我也給他拋得很遠。好幾個星期，我躺在軍人醫院中，受盡痛苦，住了差不多近一週月。後來又在療養院中住了兩個月，便復員了，回到森伯洛貝屈洛夫斯基的貝屈洛夫斯基·列甯工廠中去當工頭。這是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季，我已二十三歲了。

五 和過去分裂了

在一九二九年開始時，我是劇中人之一，一個熱心的青年，深深地為這時代中高遠的理想與計劃所感動。這時期，國內正在發動一個新的，也可以說是進一步的革命。這個時期，史達林正和他的親信同僚，與政局及黨部中的反對份子，進行着劇烈的鬭爭。他們想根除資本經濟思想的餘孽，以為如此即可領導全國趨於工業化與農業集團化。

我選擇這時期入黨，並非偶然。我熱心工作，有時簡直近於瘋狂，因担任軋鐵廠的技術工頭，所以常和官員及有勢力之共產黨人交游，同時又担任廠內日報編輯的重要職務。

這秘密警察，即政治警察，並不使我驚異。相反地我以為國家在此嚴重與緊張的時期中，每人應受監察與管束。祇有記憶力很不錯的老人，像我父親，非常震怒。一九二九年初，共產黨中一位著名的老前輩，克立司欣·拉可夫斯基到我們廠中來，並在大會中演說。這恐怕是史達林的敵人能和人民談話的最後一次，不多幾天以後，父親在聊天中提起了這個集會，他很不快。他說：「我們猜上去他們是在爭權，而且

是史達林得到了勝利。拉可夫斯基去了，就在第二天早晨，兒呀，那些向他表示友好態度的工人，都給秘密警察傳了去。……」數星期後，我遇見區黨部委員的書記，他熱烈地歡迎我。他^{知道}我差不多就要正式申請入黨。「啊，克拉克夫青科同志，你父親真怪僻！」卡司洛夫笑着。「你甚麼時候申請入黨？」他接着問。「快了，我想，」我回答說。我要坦白地加入共黨，不憂懼，不懷疑。我要做新工業化世界中或更積極一點的新社會主義世界中的建設者。

在黨的範圍以內，我們廠中的報紙，享到很大的言論自由。起初辦的是週刊，後來改爲日報。銷數約三萬五千份。報紙內容須經過檢查。凡懷疑工業化或共黨政策的文章，當然不能登載，攻擊工廠當局，工會職員，和黨務人員，披露生產或管理方面的特殊錯誤，那是可以的，因此造成了此報足以代表輿論的幻想。我很忠實地而也激烈地去攻擊生產及業務上的失敗，絕不顧慮到要得罪人家。後來我才知道爲何廠內的重要份子，忽然和我親熱。無疑地他們認爲這是一個最好的計劃，去買服一個青年人，因爲他有一枝利筆常在詆毀人。

我自己也說不出是甚麼理由，我覺得十分窘迫，當我在父親前，發表我準備正式加入共產黨。「我知道你早晚要加入的，」他說，「但我不能說我感覺到十分快樂。你自己當然明白，在我們四周，有多少不平之事。——」我尊重你的誠實態度，尊重你的革命過去。但請你也原諒我。我對於黨的信仰是一步建築起來的。這黨所做的是否全對，祇有經驗與時間纔能告訴我們。不過我信任他的目的，我願用我所有的能力去使他實現，無論如何，你並不反對工業化，你也不反對讓農民自動地加入集團農場。」「當然我不反對這些事情，維底亞。你現在有一種信仰了，祝你成功！」

我在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照准入黨，這似乎是我生平的唯一大事。

我入黨後，奉召去見廠內的董事長。他告訴我，送到唐拔司特羅士卡夫司基工廠中去的物料，品質都變壞了，應當立刻就去實地調查，回來給他一個報告。經過一星期的旅行，我帶回一個極詳細的報告。因我成績很好，他要給我一筆豐富的金錢報酬。「我不需要金錢，」我說，「但我却需要一個公寓。我的母親至今還留在鄉間。」幾天以後，克拉夫青科一家已住在廠內一個舒適的新式公寓內。母親終於放棄了聳鐘自治區的那所屋子。

在這時期，黨員有一種假定，即許多在革命前受教育的工程師和技師，乃舊制度中的餘孽，可能與工業化者為敵。要更換這批過去承襲下來的工程人員，我們必須訓練一班新人物。因此上級人員，決定派遣黨員和工會會員，到新舊各大學和工業專門學校去研究。這計劃是由最高權威的「政治局」主動。

一九三〇年，共產黨中央管理委員會的代表團到本廠來視察工作和人事。我奉召至董事長室。阿凱第·羅生哥而夫，莫斯科最重要的領袖之一，著名的中央委員對我說：「黨內現在正需要工程師。你喜歡讀書嗎？我們要送你到工業專門學校去讀上幾年。」「謝謝你，我很願意為國效力。」我說。

第二天霧果·奧實和尼基次自己到廠中來了，出其不意地跑進了我們這一部。奧實和尼基次，乃史大林的好友，農工檢查部部長，共產黨中央管理委員會的首領。董事長在介紹我，「是的，我會經聽到你。」奧實和尼基次顯出很起勁的樣子，並且把手伸了出來。「此地的工作怎樣？」「部長同志，」我說，「我覺得人員過多，容易牽制。我曾經調查過本廠在革命以前的紀錄，管理處的職員現在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我以為這是錯誤的。人各有其所長，人人負責，其結果即是沒人負責。我們的工作太壞，消耗太多。至於工人的工作效率，却與過去一樣。」「你是對的，」他說，「領袖也正在思索着這許多事情，克拉夫青科同志。」他和我握了手，隨即走開，又回過頭來和我說：「假使你遇到什麼困難，或是需要什

麼東西，寫信給我好了，我會幫助你。」

在將來困苦的時期中，我會接受遺邀請。我覺得似乎已收羅在奧賓和尼基次的門下了。

我正結束我這一部的工作，預備去做學生。我懷疑廠內的管理處，有少數人是很喜歡我離開的。我的父母兄弟，對於這一次的轉變，都很欣慰。父親以為我對奧賓和尼基次所講的話，很合他的脾胃。

我化了幾個月的工夫，匆促地預備入學放試，先入專科補習班肄業。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期，我在卡庫夫的工藝專門學校註冊入學。

六 卡庫夫的一個學生

卡庫夫的工藝專門學校，設在一座古舊的大廈內，貼鄰即是公園，風景不差，在尋常時期，無疑地是一個模範大學園地。在這兒可以看到五年計劃進行的匆促和忙碌，處處都是標語。

這許多形形色色的男女長幼，聚集在一個教育機關內，可說是空前絕後。大部份學生在二十三歲以上，很多的已三十左右了，有面貌黧膚，從沒有到過西方城市的中亞西亞人，有退伍的兵士，有來自西伯利亞的遊擊隊，也有懂得新政治的共產黨職員。幾千個學生，一齊住在宿舍。宿舍名為「巨人」，人數不少，四五個合住一室，嚴寒往往凍得麻木，酷暑受盡烤炙。我們就這樣地生活，研究，辯論，和夢想到國家工業化的前途，而現實方面却正在飢寒線上掙扎。

我和四個人合住一室，——亞力克山·卡諾可夫，喬治·維古拉，葛雅·亞夫特許京科，和帕凡爾·帕可而欽——我們全是黨員。亞力克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委員，和我立刻成了知己。我們都愛黨，

都信仰黨，所以毫不躊躇地用公平的態度來談論他。喬治是共產黨的另一派。他以為討論黨的命令和決議，似乎是褻瀆的行爲。喬治沒有意見，——祇有引用史達林，真理報，消息報，和別的權威的言論。帕凡爾，和喬治同樣，是個忠實黨員，面色灰白，步履維艱的病夫。但真正有問題的人物，却是萬雅。他或許已過了三十歲，情懶非常。內戰時期，他是一個遊擊隊的鬥士，而且並不笨，假使肯用心的話，也可以學會許多功課。他有天賦政治活動之才，認識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也都認識他。在學期結束以前，萬雅給學校除名了。後來我無意中在莫斯科遇到了他，他已是信託局的首長。

我們的課程表中，政治教育比技術科目更重視。政府所需要的，不祇是工程師，而是有蘇維埃思想的工程師。我們五個同房間的，都讀飛機建築專科。校中也有新聞紙。我不久就當副編輯。大家都不滿於「巨人」宿舍的管理，報上各欄中，可以見到許多呼聲。這些都預備在學生大會中去解決。亞力克山便提議立刻委我做管理員，因為我是各項事業的指導者，學生全體都很信任我。

拋開我們自己的困難不談，大多數人仍不很愉快，因為城市情形，在急遽地變壞，農村方面，當然更不好。大家雖不敢多開口，公開的談論，確有危險，然每人至少知道一些事實。大家傳說着關於農村中清理小地主階級的種種殘忍手段。共產黨官員在農村中每被暗殺，而反抗的農民，也集體地判處死刑。謠言散播着說農民反對強制集團化的「焦土」抵抗。他們把牲畜都屠殺了。莫斯科所下的一道命令，凡不得許可擅殺牲畜者，處死刑，證實了這最壞的消息。各城市的車站都擠滿了從家中逃出來的衣衫襤褸，腹中飢餓的農民。

報上講着種種光榮的成就。爲了新工廠和新房屋計劃，有許多「感謝史達林」的公開信。各國的代表團——遠至美國及澳大利亞——都來觀光。他們見了五年計劃的奇蹟，爲之矚目。在接見記者時，他們頌

揚着蘇聯的勝利。如何還許多來賓會忽視了這畫面的另一端，是一件我們所永不能解決的神祕。

那一方面是現實，那一方面是幻想？是農村的饑餓與恐怖，兒童的流離失所，還是事業的統計？私下我們都在談論着。

我剛進這專科學校，生活上忽又起了一重紛擾。因為有道命令，教授和考試，都要用烏克蘭文，不用俄文。凡學校機關都得實行。這是莫斯科對於非俄羅斯的蘇維埃民主國的最大讓步。理論上，我們學生會中的烏克蘭人，應該表示歡迎。實際上我們對於這變更所感到的痛苦，正和非少數烏克蘭人一樣。譬如我自己從小就講烏克蘭話，然而並不慣於用他做讀書的媒介。有幾個最好的教授，爲了文字更張，極度恐慌。最壞的在於本地方言，追不上近代學識，對於電學，化學，氣體動力學，物理學，和其他學科，都不適用。

本來是自由的權利，在實行時，却變爲強迫的義務。現在不但准許用我們的方言，而且非用不可。幾百個男女，因不能運用這種言語，給解除了政府職務。在大衆面前，假使不用烏克蘭方言，差不多就是反革命。俄羅斯化的家庭中出來的兒童，因爲要用這種外國語，受到許多磨折，功課也退化不少。

用他們自己的言語，可以說是非俄羅斯份子的蘇維埃民主國區域中所僅有的「自主」權。用這種語言去寫或想種種不合於共產黨路線的事情，就是叛逆。語言自由，本是國家自立的第一要義，可是實際上已經消滅。「國家主義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這口號，實際上掩護了一個完全中央集權的警察管制。幾百個烏克蘭人是被處決了，還有幾十萬人給關了起來或充軍，都爲走入國家主義的歧途，證實其爲分裂派。

事前並未和我接洽，我留在卡庫夫的時期，突然給截短了。我從航空科被調至冶金科，而且奉命先到

列甫格勒的冶金專科學校，然後再進本城的專科。我寄寓在卡盧夫，爲時雖短，印象却很深。回憶中最易記起的是兩位女子。她們都很美麗，而且巧得很，她們的婚姻都不美滿。

薩滿林博士，我們的化學教授，是個駝背。我對於他的演講，很感興趣。有一天我請他吃飯。飯後他說，「維底亞，到我家裏來。內人會彈鋼琴，彈得不差，我知道你也愛好音樂。」他住在一間設備俱全的高尚公寓中，我那一晚親眼見到他的太太克萊芙地亞，我也震於她的嫵媚，連聽音樂和談話的心緒，都給擾亂了。我就很早藉端告辭。

不多幾天以後，我在微雪中走着，忽然對面遇到了克萊芙地亞。「你那一夜是逃走的，」她立刻說，並不招呼，「爲了要賞罰你，你今晚一定要上我那兒去。我要等你的。」

我心中決定不去，然而隔了幾個鐘頭，我已在她門鈴的門鈴。「但薩滿林博士到那裏去了？」我說，突然覺到狼狽，中了圈套。「喔，他去望他的兄弟，在這幾天內不會回來。」

我們在晚餐中的談話，很受拘束，雖然有一瓶高加索酒相助。飯後我提議到公園裏去散步，在月夜的雪景中。「不，我親愛的俘虜，」她笑着；「假使你一定要賞月，此地便有月光曲。」她就在鋼琴上彈起來。

我聲明我一定要走。「但這一次我不讓你跑。」她說：「親愛的，讓我們坦白底講，爲什麼我不應當消遣一個整晚，和一個人——多少與我自己的性情相近的呢？」她的聲音充滿了抑制的眼淚。我又坐了下來。她告訴我一些關於她個人的歷史。當她講的時候，我們間已無拘束。

革命時，克萊芙地亞還祇九歲。她是一個富家的女兒。在起事的幾個月內，她的父母，便給拘捕了。不久，他們在屠殺「資產階級」人質時遇難。她和她一位姑母，同住在一間黑暗閣樓上，非但爲人所不顧

並且沒有法律保障。在十七歲的時候，她愛上了一位詩人，便和他同居。但這位詩人忽然失蹤了，到今天還不知道他的下落。他曾反對過新政體，倘使現在還活着的話，可能是在什麼集中營內。

「我那時正年青貌美，許多少年都向我求婚。我希望我的愛人，至少要有一張黨證。後來我碰到了這位薩滿林博士。我固然厭惡他的形態，但我也覺得歡喜，因為能得到一個共產黨的注意。我對於他的好意很感激。姑母和我，都以為他雖駝背，又是共產黨，但他的靈魂可不壞。我們便結婚了。所以你看，維底亞，你們這班聰明的共產黨，對於人生的認識真是太少。」

在我離去以前，已過午夜。我素來尊重薩滿林，以後我沒有敢再去擾亂他的家庭生活。

我時常去拜望F同志，烏克蘭省的官員。他在無意中使我遇見了裴麗亞。他送我一張歌劇院的雙人包廂入座券，我帶了亞力克山·卡諾可夫同去。在隔壁包廂內，坐着兩位盛裝的漂亮婦人，我立刻認得中有一位是塞輔療養院中的病人，那時候我在波斯前線受傷，便由該院治愈。「那是裴麗亞、蒂克海洛夫那，R的妻子」。我低聲和我同伴說着。「R——」他喊了起來。無怪他要驚喊，R是烏克蘭政府中的一位最重要的官員，權力很大，和史達林最接近。裴麗亞當然也認得我，她做着手勢，邀我在第一齣演完後過去。「她好美呀！」我想。在看戲時，我們倆互相偷覷，偶而視線接觸，我便覺得面紅。在幕已下落之後，我們走到她的包廂中。劇尚未完，裴麗亞低聲對我說，「爲什麼要等到做完？我們何不同去用飯？」大家欣然表示同意。裴麗亞遺去了那輛等候着她的大汽車。亞力克山同瑪麗坐了一乘雪橇，我和裴麗亞也合坐一乘。同載的一刹那，我告訴她關於我在校中及黨內所做的事業。在毫無目的的談話中間，我忽然喊着，「今夜每一件事都是何等的美滿啊！」跟着我倆就接了一個長吻。

我們轉入了一條小街，停在一所小巧的屋子面前。瑪麗和亞力克山，意會到我們或許不喜歡別人打擾

，堅持着要上菜館。裴麗亞用鑰匙開了門，單請我進去。我站在這小屋之中，簡直目眩心搖。裴麗亞笑着：「這是真的，親愛的，這並不是影戲中的佈景。」她隨說隨脫去了她的豹皮外衣，「僕役們今晚都出去了。——他呢，在莫斯科開會。」我似入幻境。這兒是另外一個世界和我們蘇聯生活的背景，貧窮與困苦，差得遠了。

早晨我回到了宿舍，時間已很晚，整天瞌睡、貪懶、簡直發狂似的過却。我在想着裴麗亞。我驚異地對自己說，天下竟有這種「一見鍾情」的事情，但爲什麼要看中一個已嫁的婦人——尤其是嫁給一位黨國領袖的夫人！鄭重地我下着決心不再去看她。但以後仍常和裴麗亞約晤。有一晚我問起她關於她丈夫的事情。我知道這有些像易卜生所著的「傀儡家庭」。「不要在今夜，親愛的，」她哀懇着，「我不要糟蹋這初戀的光陰。」「不，我們愈早講愈好！」我堅持着。

「我不是黨員」她說，「我的丈夫，現在正向勞工們宣傳社會主義，但他爲什麼要享受這許多，」她做着一連串的手勢，指着這花園，這富麗堂皇的家庭和她的皮大衣，「而幾百萬人營養不足。監獄和集中營天天擴大，更加腐敗。你聽到過現在鄉村的情形嗎？親愛的，我覺得我們是在假面具之下過日子，受到了極大的欺騙，」她最後說：「即在我初結婚的幾年，我就憤恨且和他的朋友的生活方式，談話態度，以及對於勞苦人民的輕視。我早已覺得我是一個有勢力人家的田奴。」

他的丈夫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我和裴麗亞常在她朋友瑪麗亞家中會晤。我覺得她丈夫也很明白她的行徑，但他不願詳細講道事實。我們常談起將來要像夫婦一樣同居，但這是一句戲言而已。

事情突然轉變了。我被傳至黨部中央委員會。人事股副主任告訴我，「黨部議決，命令我們學習工程師的，須與過去的經驗相符合。你入專科以前，是在冶金廠中工作的，現在調到赫伯洛貝屈夫斯洛克，

轉入冶金專科學校。黨部怎會知道這並非飛機與冶金的對立，而實是婁麗亞與其所發生之關係的對立呢？我們又會面了好幾次。我勸他不顧一切，和我同走。但壓力太重，究竟無法抗拒。我從職員洛貝屈夫斯克連寫了幾封信給她，都沒有收到回信。亞力克山經不住我的請求，跑到R公館中去訪她。當她問起了她，那女僕就啜泣起來，「婁麗亞已經去了，她不再在此地了。」後來我又聽到一個不甚可靠的消息，即婁麗亞·密克海洛夫那，用了那個新姓名，在邊遠的省區中教書，但我也無法去證實他。

七 機器的勝利

我的父母和弟兄見我回來，不勝欣喜。我也強作歡笑，雖已飽嘗與婁麗亞生離的痛苦。我要祛除憂慮，所以努力於讀書，辦黨內雜務，為工廠設計，在工業學校中，又擔任了一點政治經濟的課程。

我想避免因寄居宿舍而發生的許多困難，故與父親同住，但和簡單樸實的工人，混在一起，又不能避免對於農村的痛苦的認識。他們談論着種種暴刑，殘忍的手段，饑餓與死亡的新聞。我們時常派遣比較活動的份子，下鄉視察，雖然他們曾經授意，在回來的時候，不許討論他們的所聞所見，但他們的靜默與掩飾，更使人不言而喻。

在學校內，與每個蘇維埃機關一樣，有一個與秘密警察有關係的特務處，由勒佩特同志當領袖。沒有幾個人能知道他做些甚麼。同時也沒有人不知道在特務處內，每個學生有一本功過簿，一言一行，無不詳記。特務處深入學校的每一部份，甚至在黨部的核心組織中，都埋藏着密探。但黨部委員會在核心組織中，也有他們自己的密探，不給特務處認識。所以在這種互相偵察的複雜情形之下，佈滿了恐怖的濃幕。這

種組織，一直伸展到最上層，最後乃至史達林所領導的政府當局。我們簡直住在密探的世界中，「屬垣有耳」，直言不諱，乃自取滅亡的掩徑。

笛尼克教授所支持的實驗工作，費用浩大，甚關重要。他不是黨員而是革命前的智識階級。怎樣去偵察他的活動呢？就利用他的妻子。她是實驗室內的主要助手，年齡不過三十有餘，比她那位丈夫要輕三十歲。她極愛重她丈夫的工作與學識，所以不能把她認作絕端可靠的密探。因此在她的生活中間，又安放了一個不很容易拒絕的愛人。另一工程師，乃黨部中堅人物，名叫柏夫侖古，有着男性美，很容易的把那年輕的教授妻子勾引上了。笛尼克教授，是校內少數者之一，不知道他的妻子有個愛人。而他的妻子也是少數者之一，不知道她的愛人，乃爲了特務處而盡一種職務。她的犧牲是無用的。但在這位教授的實驗室內，並沒有發現過反動的形跡。

在黨內，這種監視和暴露人家的隱私，使人無可祕密，也有一種名稱，就叫做「黨部的民主」。

一九三一年六月，史達林同志在經濟會議中發表一篇演說，包括很著名的提高效率「六要點」，尤其要者，爲嚴密的成本會計，更集中的企業指導，失敗和浪費的責任問題，以及收入方面的精細區別。收入平等，本來是蘇維埃的理想，現在却變成了罪行。平等兩個字，已斥爲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從前限制黨員收入的「最高限度」，已廢止了，一概採用論件計工的法，不論是否可能，或竟全然不通。」

蘇維埃最喜極端，多頭之弊纒去，獨攬大權之弊又來。所謂從下層出發的「工人管理」，其最後飾辭亦已拋棄。當然命令改良是一件事，而實地施行又是另一件事。有人會和我說：「他們要我們合理化和近代化，減低成本，那都是很對的。但假如我們做了胆大一點的事情，我們便冒着生命的危險。最安全的方法還是不做事情。」

那年深秋，我和本校的董事長及另外一個學生，一齊傳到區黨部委員會中去。黨部書記要請我們到尼古泊爾去做一番調查工作。那兒正在建築一座鉅大的冶金聯合工廠，化去數百億的羅布，但不知怎樣，工程進行得極緩。

到了尼古泊爾以後，我們纔知道這建築工程，在三年前即已開工，一片空曠的草原，離開鐵路有好幾里，很不便利。當初何以要選擇這樣一塊地方，也沒有人知道。

該廠的董事長到任不久，所以他將工作腐敗的一切過失，不受拘束地盡量披露。

這地方充滿了紊亂和污穢。最使我們驚心的，就是那價值昂貴的進口機器，大部份是德國出品，都堆積在露天，因而銹蝕了。任何地方，我們見到已廢棄的建築物，有的才完工一半，有的還不過剛築基礎。當建築物開工時，中央有命令，停止一切工作，把全部人力，移到別處去。計劃已經改變了，金錢與勞力，都擲諸虛耗。據我看來，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外來的干涉和掣肘。遠地官員，無意中發出一道命令，決不會料想到他所能發生的破壞影響。本埠官員呢，祇有服從，希望不要發生什麼問題，無窮的拘捕，無窮的傳詢，無窮的恫嚇，造成了不穩的空氣。

第二種原因，概括的說：乃是在生產的過程中，忽視了人的因素。血肉做成的工人，都擠在草草建築的木板宿舍內，連最簡單的衛生設備，都殘缺不全。他們所注重的是生產，而對於做這工作的人們，反而絕端輕視。

第三天，尼古泊爾工廠的負責領袖，都給召集到市黨部委員會去舉行會議，我主張整理工人宿舍，隨後幾百人在擦洗和修理，努力打電話到卡庫夫去，有一次竟打到莫斯科，把大箱的新被單和枕套，絡繹送來

。工人宿舍內，開始接上電線。

我們動身的前一夜，我和一位總工程師同進晚餐。「我不是黨員，」他說，「我們提議給中央的每一件事，都遭批評。他們不是從工程的立場，而是從政治的立場來研究這問題。無論什麼決議，我們必須服從，即使是毫無意識的。中央錯了，我們祇有受他的累，而且還要關閉我們的嘴。監視我們的機關多得很多，幫助我們的簡直沒有。」

我們做了一篇詳細報告給黨部，曾否到達莫斯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這次經歷，增強了我好幾個月來纏在心中的計劃。我要到莫斯科去，預備謁見奧實和尼基次同志，去和他談論我四週所見到的缺點和弊病。我得到校中董事長的同意，承他允許担负旅行費用。

這是我對於莫斯科第三次的訪問。我出示身份證，得到一張派司，便去謁見奧實和尼基次部長的秘書塞末許京同志，我從前已認識他，所以能通行無阻。我把文件給他看，他允許陳報部長。

奧實和尼基次出來了，我便將書信呈上，他匆匆看了一遍。「你好嗎，老朋友？」他說，「我很喜歡和你談談。就在今晚十點鐘好嗎？塞末許京同志，請你好好的接待他。」我坐了一輛大林肯汽車到都城飯店，我覺得接近權要，受到寵待，心中非常興奮。

我在部長的應接室中，十點不到，塞末許京便來和我接洽。「你恐怕還要等一刻。布加林同志正同部長在一起。」布加林同志！我興奮得至於心跳。革命時代的偉人中，布加林祇次於列甯和托羅次基。不多一刻，塞末許京招呼我進去。「布加林仍在裏面，」他低聲說，「部長請他留在此地，和你會面。」

接着我就同奧實和尼基次和布加林握手。「很好，克拉夫青科同志，」部長說，「顯然叫我不拘束。」「簡單明白地告訴我，你所知道關於尼古泊爾工廠的計劃。」

關於這問題，我胸中早有成竹，所以能剴切地陳述。廠中的某幾部份，需要擴充。我用確實的數字來證明，假如用數百萬羅布去改良現存的工廠，比投資十倍於新工廠，可以得到更大的生產量。布加林面露微笑，頷首表示同意。「就人體論，我很贊同你的意見，」奧實和尼基次說，在簿子上摘錄了一些。「部長同志，祇要化數百萬去改善工人的居住狀況，我敢斷定該廠便可省却鉅額開支。」「對啊！」布加林插了進來。「你不要以為我們並不知道，」奧實和尼基次說，「但是診斷病症，要比醫治容易得多。」他忽然問起了我會否留學。「不，我沒有留過學，」我回答說。「等你讀完了專科學校，我們或許要送你到美國和德國去。我給你五天假期在莫斯科。」

我離開他們的時候，坐在應接室的人們，都毫不掩飾地表示驚奇。塞末許京不多時也就來了。「同志，恭賀你，」他說：「這是布爾許亞戲院和莫斯科藝術院的戲票。你旅館內的費用，有人會替你代付。這兒還有一千個羅布，奧實和尼基次同志給你的薄禮。倘你需要什麼，打電話給我好了。」

拉柴來夫同志，圈內資煤礦的講師，這時也正在莫斯科。「你近來到過鄉間嗎？」他突然問我。「不知道得很多，」我說。他告訴我，他到過奧特薩去。該地農民抵抗得最慘烈，常採自殺政策，用強硬手段來對付。他用雙手遮了面部，似乎要祛除一切可怖的回憶。

在我做給董事長的報告上，敘述經過，已意興毫無，隱約地自己覺得有些慚愧。

尼古泊爾，莫斯科，以及其他種種事務，阻礙讀書，必須上緊去補。幸而我覺得技術科目很容易領會，很快的就趕上了所授的課程。

我從莫斯科回來了不多幾個月，小卡底亞就加入了我們的家庭生活。母親簡單地告訴我這故事。我的表妹娜妲莎，工廠指導學院的黨員，因公出門，乘了火車回來。忽有一個年約十一歲光景的流浪女小孩子

，到車廂裏來討麵包吃。她的聲音，顫抖而低微，很使娜坦莎感動，就把她帶到了我們家內。母親立刻就決定將她留下。「我們已有這許多人，多一個人吃飯也沒有什麼關係，」她微笑說。

小卡底亞嗷嗷啜泣，開始講她自己的來歷。「我和家屬離散已有一整年了。我們住在普克洛夫那耶。父親不肯加入集團農場，各種各色的人來和他辯說，帶他去，鞭撻他，但他仍舊不肯加入。他們大聲疾呼的說他是小地主階級的密探。我們有一匹馬，一條牛，一只小母牛，五只羊，幾只豬和一所穀倉。每夜警察要來帶爸爸到村裏的蘇維埃分局去。他們和他要穀，不相信他沒有。足有一個星期，他們不讓父親睡覺，用棍子和手槍打他，直到他遍身紅腫發紫。當最後的一普特穀給他們逼了出來時，父親宰了一條牛，留一些給家裏人吃，其餘都賣在城裏，買了麵包回來。以後，他又宰了一條小牛。於是他們又每夜拖他出去，告訴他，假使沒有得到許可證而私宰牲口，即是一種罪行。然後在一年前，有許多陌生人跑到我們家裏來，中間有一個是秘密警察，把家中所有一切，統統裝走，剩下的牲畜，都給趕到集團農場中去。我們奉命穿好衣服，帶些麵包，鹹肉，洋蔥和山薯，因為我們要跑很遠的路程。沒有人知道帶我們往那兒去。有人說西伯利亞，有人說極北或酷熱的沙漠地帶，都說不定。「近卡庫夫地方，妹妹和我，都得到了許可去取一點水。等我們跑回火車站時，已太遲了，火車早已開去。」

卡底亞和她妹妹，就在村間流浪。她們學會了討飯，搶劫食物，和攀登火車。最後她們在市場上，給民兵追趕着而失散了。卡底亞單獨地漂泊着——直到娜坦莎領她到我們家裏。我們都喜歡卡底亞，她也漸漸和大家熟悉了，但常常在夜深的時候，我們能聽見她強制的哽咽，「母親呀，你在那裏？爸爸呀，你在那裏？」

八 農村的恐怖

校中黨部事辦處，命我到區委員會中報到。其目的是；動員黨部的義勇隊，到田間去幫助收穀，完成集體化。黨部中央員委向我們演說：「你們去執行的任務；第一，須拋棄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第二，須用任何代價去查緝穀物，不論藏在灶內，牀下，窖地中，或曠場裏。第三，要完成打穀，修理農具，曳機引，刈穀機，及其他設備。你們等在此地，勃勞慈基同志會分別傳見你們。」

勃勞慈基同志對我們說：「你們要到派克路持奴伊村去，克拉夫青科同志主持完成打穀的任務，負責整理農具和機器，朱凡脫可夫同志結束集體化和收穀事宜，你們兩人都要在主任阿希諾夫同志手下辦事。」阿希諾夫吩咐我們帶些衣服食物，他並且說要帶手槍，第二天在火車站候車室會面。朱凡脫可夫問我：「我們爲什麼需要手槍？我們並不希望要用武力去奪取糧食。」列甯會說集體農場是一種自願的組織，史達林也同樣說過好幾次。」

在火車上，阿希諾夫的毛瑟鎗，很神氣地掛在肩上，使我們感到不快。在日落的時候，我們到達了目的地。蘇維埃分部主席叫人帶阿希諾夫去，又帶我們兩人到一所堅固的房屋中，「這史都本古一家，新近加入集體農場，房子是很清潔的，」他說。

在門口我們遇見了一位將近六十歲的高個子，他們全家都在晚膳，女兒剛祇十八歲，還有一位慈祥的老婦人和一個孩子。我們自己介紹了一番，就和他們一起用膳。一鍋熱氣沸騰的烏克蘭式羅宋湯，沒有放着肉，第二道是烘薯與酸果，麵包都切成細片，便可明白這家庭的處境是很艱難的了。我便回到房屋間裏

去拿我們所帶來的食物，沙生治，魚和冷雞，和他們一起吃。

「謝謝你們，」這老婦人接連說着。「我不知道我們還是在什麼時候看見沙生治和糖果的。」「你這小兒子的名字叫什麼？」我問。「他不是我們的兒子，」主人翁解釋着：「他是一個集體化的孤兒。佛文一家——丈夫，妻子，和一個獨生子，就是你所見的佛司亞，祇有兩匹馬，一條牛，一只豬，和幾隻雞，但他不肯加入集體農場。他的財產，全部都給搬去，他們又將他拉出屋子，拘捕而去。女人便用繩子吊死，因此我把佛司亞帶回家來。」

這佛文家的命運，和小卡底亞所經歷的一樣。

「謝謝你的招待，」我說：「我們要住一個月。這是我們給你的錢，不要過分張羅。」「我已奉到命令，不許接受任何金錢。」「不要管他，我們要做合理的事。」

早上我們到蘇維埃分部，阿希諾夫已先來了，他十分忿怒，因為他所寄寓的那一家，沒有充足的東西給他吃。

我們分別向集體農場出發。一切都很有紊亂，我和農民計劃了好幾個小時，每人担任一項指定的職務。晚餐時，我的主人告訴我，「他們說你做得很對，尤其因為你並不詛與恫嚇。」

我問朱凡脫可夫，他和阿希諾夫進行得怎樣。「他是個殘虐狂者，我不能再緘默了。這畜生往往在深夜裏把農夫們拖來，用毛瑟鎗來恫嚇他們。有人和我講，他甚至要用非刑拷打。」「爲甚麼不早些告訴我？穿起衣服來，我們一同去！」

從百度窗中我能聽見辦公室內農夫的哭聲，夾着阿希諾夫的叫罵。我推開了門，阿希諾夫給怔住了，故着要跑去那桌上手鎗的樣子。這四肢癱瘓在地板上的農民是個老翁，滿面是都血痕。我示意叫他跑開。

「我是主任，請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不，這是黨的事情。我以共產黨員的資格，不許你用殘虐及野蠻的行爲，使蘇維埃威權蒙受恥辱。你還是停止這種舉動的好，否則我將不顧任何犧牲來揭發你的罪狀，你懂得嗎？」

我回轉身跑了。

集體農場內事事順利，比我所希望的還要好。打穀正在積極進行，牛馬有人當心，農具也差不多全整理好了。回郵村中時，已快近黃昏，我們立刻覺得有甚麼事故發生。蘇維埃分部內，秘密警察拔出手鎗，看守着二十個老少農民，背負包裹在哭泣。此即所謂「清算小地主階級」，許多貧樸農民，被迫離開本土，割奪全部財產，輾送到遠地去當樵採和灑澆的苦工。

當我立在那兒，我驟然聽見一個女人怪聲喊着。兩個秘密警察就向她奔去。我幾乎不能阻遏我的情感作用，要摸出藏在衣中的手槍。正在這時，一只強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臂膀。這是我的居停，史都本古，「你決不能連累你自己，」他說。

我打算向黨部的縣委員會，提出對於阿希諾夫的抗議。但這恐怖事件是出於最高當局的授意和核准，使我完全絕望。

本地的禮拜堂，現在已改成穀倉，漸漸地充實起來。阿希諾夫顯然是勝利了，誇耀着他的成功。回到喬伯洛貝屈洛夫斯克，區委員會似乎尚滿意我的工作。但我所寫關於阿希諾夫的報告，簡直大家都不感興趣。

我因在村內化去不少時間，我的功課，很嚴重的落後了。我須比平常更用功，才趕得上去。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史達林告訴全國，農村集體化已勝利地完成，「集體

農場制度，毀滅了農村間的貧窮與匱乏。」會場中拳聲雷動，代表們高聲喊着，「史達林同志萬歲！」讀了這種報導，我不能忘却派克路特奴伊的慘劇。

但在史達林演說後剛祇二十三天，希特勒在德國掌握了大權。幾年來認德國為第一個要跟隨蘇聯的榜樣，這幻想竟破產了。

在德國的失敗，竟曲解做五年計劃的一種勝利。國外的新聞紙和雜誌，我們都不準閱讀，新聞也嚴格配給，而且大部份是人造的。

九 地獄內的收穫

我和徐娜逗促的婚姻史，是我個人傳記中的一頁。

我到鄉間去兩個月以前，認識了徐娜，溫柔的女人，沒有姿麗亞誘人的健美，也不像她那機多情。她很纖弱，柔順，又好感情用事，自私心很堅強。蘇維埃女郎，大部份不顧自身，而徐娜的興趣，則集中在她自己身上。她是資產階級式的，朋友們警告我，她因我為黨務工作忙碌而着惱，又為我進益微薄，和大家庭住在一起而生氣。因此數星期的離別，便足以拆散姻緣。離婚在這時是種簡單的片面舉動，祇須登記解除婚約，你的配偶便立刻接到郵片通知。徐娜結交了一個新朋友，有權勢的上層階級。我們離婚後，她就嫁給了他。她確是新社會中的成功者。我真不能相信我會和她結過婚。

集體化第一次所得的花息，即是死亡。雖在報紙上並無一字提到這般悲劇，可是聶伯洛貝屈諾夫斯克仍充滿了逃難的農民。這次饑荒，恰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的第四年，報紙上瘋狂地誇耀着「我們的成功」

，然而震耳的宣傳，也不能完全湮沒已死者呻吟。

什麼事都要看一次的收穫了。要防止失望的集體農民去吃掉那些青苗，農村內都設立了特別政治部，用的是可靠的共產黨員，我也是被動員者中的一人，同一位同學名叫尤立的，一起動身到派愛鐵卡次基去。我們問到田中的收穫，他們所回答的，只是大眾的饑餓，傷寒的流行，以及人相食的傳說。

我們在黃昏時走到了彼脫羅伏村，街上闐然無聲，「這兒的狗都給吃掉了，所以這樣的寂靜，」那領我到政治部去的農民說，「人民都不大出來，他們也沒有這氣力，」他接着講。見過了政治部的主任，主任叫人伴吾們到一個農家的草屋中去過夜。一盞很暗的油燈，是屋子內僅有的燈光。女主人飢餓的面容，簡直連憂愁與恐懼的表情都沒有了，真是個「活死人」。在屋角小床上，兩個小孩子靜靜地躺在那兒，一些也沒有生氣，祇是眼珠尙還動着，射在我面上，我連忙閃避開去。

「我們不會給你麻煩，」尤立說：「天一亮就要走的。」「歡迎得很，」這女人說，「祇是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請你們吃。」

「你的丈夫在什麼地方？」我問。「我不知道。他是給捉去的，恐怕已充了軍。我的父親和哥哥也放逐了。我們留在這兒也一定要餓死的。我不知道每天要死掉多少人。我們祇要抓到東西，就拿來塞飽肚子——貓，狗，和鳥，田鼠。此地的樹皮都給剝光了，這也是吃掉的，連馬糞也有人吃。」我驚訝不信。「是的，馬糞，我們還要搶着呢，有時裏面也有整粒的穀。」

第二天我和尤立坐了國家農場撥給的馬車動身。駕車老人一路吆喝着那兩匹馬。「你的生活似乎還算舒適，老爹，」尤立說。「是的，我們在此地過着和闖人一樣的生活，兩個人合穿一條褲子，每個人可以活到他死的時候，不論貧富都變成了乞丐。」我問他的身世。他說：「我的老伴是在去冬餓死的，女兒早

已出嫁，我兩個兒子和家眷，給同志們送到西比利亞去了……小地主階級的密探。但因為我是個老人，他就給我這差使。」

車子停在村上政治部面前。政治部主任蘇梅諾夫是個軍人，有一副鎮靜的面容。他的助手，是圖內茲盆地內一個金廠的經理。第二助手是個年輕的祕密警察官員。飯後我們舉行正式會議，尤立和我才知道計劃的大概。這一區的收成情況似乎是很好，我們的職務，在保護和監視收穫，確定政府能全部得到他。九月一日是收穫開始的限期，每人有指定的該管地段。

我到了洛其那，辦公所在地，在當地的村議會前跳下來。屋子雖小，却很清潔。他們正在舉行會議。我介紹了我自己，出示訓令，就請他們繼續進行會議。村議會主席名叫皮羅賽夫，他顯然見了本地黨部書記，古澂柴同志很怕懼。「克拉夫青科同志，請你主持會議，」古澂柴說。「不，不，你們照常進行，你們比我更熟悉此地的問題。」他們重復開會。各集體農場會長輪流演說，都主張除非農夫們能有東西吃，是沒有氣力去收穫新穀的。

會後，一個集體農場的會長却代，向我建議到他家內住宿。我接受了。

「却代同志，請你告訴我，」我說，「此地的情形怎樣？」「收成並不壞，機件也都完好，就是馬匹沒有草料，祇要我們能得到一些雀麥……割下一部份新生的，但這是違背命令。」「不管命令不命令，」我說，「我願負全責，假使沒有馬，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我怕皮羅賽夫和古澂柴不能容許你這樣做，」却代警告着。「讓我來對付他們。」「還有，假使你要收穫新穀，第一你不能使這些百姓餓死，」他說。早晨和却代逐家訪問，所見是說不盡的恐怖。人們逐漸寂然無聞，很可怖地死了。他們上了人家的圈套，以致在家中餓死。這種圈套，是在遙遠的首都，會議和宴席上昧然決定而造成的。最可怕的是那些

兒童。他們在脹得似汽球般的肚皮上，懸擺着僅存骨骼的四肢。我們隨處可以看見地上躺着的男女，面部腹部都發了腫，眼睛沒有一絲表情。

我們在一家門上敲着，裏面沒有回音。我推開了門，目光射到一中年婦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床邊立着一個老婦，身畔還有兩個兒童，低低的泣着。我向四週望了一下，又看見一個腫脹而毫無生氣的男子，睡在炕上。我慌忙退出。

在隔壁的屋子裏，我們發覺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男子，面部也腫了。「你在燒些什麼東西，納太爾佳？」却代問着。「你知道我燒些什麼？」回答的聲音中含有惡意的忿怒。却代拉了拉我的衣袖，我們就跑了出來。「他爲什麼這樣憤怒？」我問。「因爲他燒的是馬糞和野草呀！」

我應取的方針，極爲明顯，除非恢復農民的體力，什麼事都不能做。回到却代家內以後，我寫了一封信給蘇梅諾夫同志，政治部的主任，派專差送去。傍晚專差帶回了一封覆信。

「我都知道這些情形。請你再斟酌一下。你所提議的辦法，違反了我們的命令。然而假使你沒有別的方法的話，祇有照你所認爲必需的去做。我要給你弄一些穀，但坦白地講，我成功的希望極少。」

這封覆信很使我滿意，至少他不說不可。我所提議的是刈一些雀麥餵馬，和割一些田邊的大麥給百姓們充飢。這是指爲「偷竊公家財物」及「小地主的陰謀」的，農民犯此，即遭逮捕放逐。

我吩咐却代去召集村中的兩位教師，女醫生，同時我差人去請皮羅賽夫，古滋柴。當他們都到齊了，詫異着我能變出些什麼戲法。

「我請你們到此地來，」我開始發言，「因爲要聽一聽你們的意見。我們如何能希望人們去工作，假使他們的孩子正在家中餓死？這是我的計劃：我要請婦女們去掃除幾所空屋。我們先從兒童着手，叫他們

住在這屋子裏，剪髮沐浴，注射傷寒預防針。預備幾隻大鍋子來煮東西吃，你們都願意幫忙嗎？」「當然願意的，」一女人發言了。「但你用什麼東西來當糧食？」「那以後我會告訴你們。誰去管理這班兒童？」「教師伊凡·配脫洛維契，」幾個人在喊着。「我轉向這老人說，你負計劃之責，假使有人干涉，報告我便是。」我吩咐他們散去。

我領幾位官員，到另外一間屋子中，關上了門。「同志們，現在我們要談正事了。」我說。「你們不要驚駭，我也懂得命令的嚴重。無論如何，第一我馬上要准許農民去刈取一些雀麥來餵養馬匹。第二我要答應他們去割取田邊已熟的大麥。你們須允許我宰掉幾只農場上的豬，使兒童們可以吃到些豬肉和油。」他們臉色很快地轉變了。這人發瘋了嗎？他是否要我們一起鎗斃？「但是，」古潑柴說。「沒有什麼但是，責任完全由我負。」

我們出來的時候，却代向我說。「現在你已冒險前進了，我們去查究一下這合作商店，好不好？」

這商店很不整潔，經理馬卡侖古狡猾而諂媚。我告訴他救濟本村兒童的決議，請他幫忙。「我知道你曾藏下一些食物，你非放棄了不可。」這人很吃了一驚，既不敢違背總部的命令，又怕得罪了我，黨部的代表。「爲什麼不問奶油製造場去要？」他說。「帶我到這地方去，」我說。

奶油廠經理是個黨員，人很和藹，但面帶重憂。他領我參觀全廠。在一間屋子內。奶油切成小方塊，用紙包裝，上面印着英文「蘇聯出口奶油」字樣。「我知道農夫們都沒有麵包吃，」這經理說，「而奶油却要給那營養很好的外國人去吃。這種感想，同刀一樣刺着我的心，但我能怎樣做呢？我有上面的命令，此外又須供給當地的官員。」「好，從今天起，那已提去奶油的牛乳，一定要交給這新兒童福利會，」我宣佈說。

忿怒纏繞着我的心頭，當我坐車子回到村中的時候。在這大饑饉的當兒，奶油還要輸到國外去。我正幻想似乎見到倫敦柏林巴黎的人們，吃着「蘇聯商標」的奶油。「他們一定很富裕，所以能將奶油賣給外國，」我聽他們在講，「這就是，朋友們，社會主義突飛猛進的明證。」

我到了這集體農場的田中，看見一部份的雀麥和大麥，剛被割去。村中有幾百個小孩子聚在園中洗澡。明天集體農場，可享第一次豐盛的早餐。他們同時也宰掉了幾口豬。

「却代」，我說，「我正式命令你，不再送牛乳給那些官員，而用以供給兒童院，你快去告訴他們。」

開始收穫的時期越發近了。一個青年向我面前跑來，「特派代表同志，議會中請你去！有人看你，從……從……秘密警察局來的！」

我給秘密警察叫去的新聞，霎時傳遍了，村中都以為我供給了人民的糧食，將受處分。

「我要私下和你談話，克拉夫青科同志，」這秘密警察官員說。「很好。史古斌同志，」我說，「你究竟爲了些什麼到此地來的？」「我們已收到幾件報告，說你違背法律，藐視黨部命令，不顧本地當局，一意孤行。」「你是否奉命來調查我？」「不是調查。」「那我不能和你討論我的行爲，祇有政治部的主任能質問我。我是區委會的特派代表，我的行爲，應當對他們負責。」

第二天我去謁見蘇梅諾夫同志。「你是十分對的，在未得我同意以前，拒絕和史古斌談話，」他對我說。「蘇梅諾夫同志，我要自己來担负這肩子。這是你給我覆信，中有任我辦理的話，請你收回去！」我說。

他取了這信放在袋裏，隨即喊着「史古斌同志。」那秘密警察官跑進來了。「請你把關於克拉夫青科

同志的公文案卷拿來。」史古斌帶來一本很厚的卷宗夾，由蘇梅諾夫轉交給給我，就跑開了。他等着我辦。我記下那報告我的祕密警察偵探和那班告發我的官員的姓名。蘇梅諾夫允許我銷滅遺摺案，暫時寄存在他的保險箱內。

回到村中，我便將市民名單拿來核對這些偵探的姓名。我發現他們是很周到地分佈在整個區域，一個在合作商店工作，又一個在奶油廠，第三個在集體農場管理處，第四個是曳引機場的車夫。祕密警察很仔細地展開他們的耳目，能見到聽到每一件事情。

後來我跑到伊凡配脫洛維契處去。他說：「整個村莊，因祕密警察的訪問而為你擔心。」「沒有擔心的理由，」我微笑着，「鬼神都保佑着我。目前是他们報答我的時機了。收獲即將開始，我要你傳話出去，假使任何地方有遊蕩的人，我是不能容許的。他們要救克拉克夫育科同志的頭顱麼？那得刈稻，打穀，照預定計劃繳進去。」「你放心，如果有人工作鬆懈，我們會很嚴厲地對付他。」

兩天以後，各事都準備好了。天明，我到田內，集體農場的男女會員比我還早到。他們已在刈穀，一捆一捆的聚起來。不多一刻，當地官員也到了，自願幫做。他們一直歌唱着，說笑着，和工作着。「這很好，」伊凡配脫洛維契向我耳語，「他們都想救你的頭顱。」我們都笑了。

有一天，正值收穫期的最高峯。我看見還有一座刈穀機放起不用，便跳下去研究其原因。我不停地工作了數小時。黃昏時候，我發現我的皮夾失去了，中有我的訓令，更麻煩的是我的黨證。我祇得到政治部和區委員會中去報失。這件事使我受累了好多年。

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由政治部轉下的一道指令：「奉區執行委員會令，該村禮拜堂，應即改為政府穀物倉庫，限於四十八小時內施行，並將經過情形具報，此令。」這指令很使我躊躇，因我知道農夫們

的情緒。這是一件愚笨的事，但古潑柴，皮繩妻夫及他人都有興趣地在進行這工作。消息像野火似的蔓延到田內。有幾十個農民丟下了農具，衝到村中，當他們見到一切神聖物件都被拆去，他們就咒罵、抗辯、哭泣。我真無法可想。我用了全部精力和唇舌，去恢復他們的工作興味。剛要成功的時候，又發生一件事。當地青年團書記，突然彈着豎琴，跟了一個女友，唱着流行的反宗教歌。那還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鬧禍的原因，在於他們腰中繫着金銀綫織就的繩子和流蘇，村人立刻認出這些是本來掛在禮拜堂內的。他們的怒火，燃燒起來了。「你為什麼偷偷掛在禮拜堂中的物件？」我咆哮着。「我並沒有偷，我是公開地拿。」立刻去遺掉你們所拿去的東西，否則我要將你交給警察。我在村中的時候，不許再有當着大眾做反宗教的滑稽表演。那是我所給你的命令！」

不多幾天以後，集體農場宰掉了一條大的水牛，將肉醃好，藏在冰窖裏面。黃昏時候却代來報告我，一部份牛肉給人偷去了。「讓我們去尋古潑柴書記，」我說。他屋子中沒有點燈，却代把門推開了。我跑進去，把電筒亮着，一個全裸的少女，駭極狂叫，從屋內逃了出去。我點亮了桌上的燈，呈露了一瓶伏特加酒，兩只酒杯，一大盤煎肉。古潑柴身體半裸，頭髮蓬鬆，迷惘地坐在牀上。在椅子上的木碗內，我還看見一顆牛心。「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肉的？」我問。「我買來的，……在合作商店，……你儘可去查問」。當然我得去查明，向村外一所屋子中走去，望見桌子上堆滿了酒，肉，麵包和蔬菜，親密地一起坐着的有三個人——倉庫經理，合作商店副經理，和麵粉廠主人——此外又有三個半裸的女人。我在窗上敲着，門開了，歡娛的景象一變而為狼狽和恐慌，女人們都在哭泣。我搜這屋子，搜到了一普特的肉，許多豬油，麥粉，蜂蜜，和幾袋麵粉。「你們的鄰居快要餓死，而你們這班混蛋還要從他們的嘴裏去偷食吃！」我盛怒地喊着。這三個賊，便移送至區中心，派人審問。

當第一批新穀送進靠近火車站的穀倉，我又新發現一件事，使我渾身戰慄。這磚砌的建築內，竟堆着去年所收穫的幾千普特的穀。這都是政府命令為該區所準備的公穀，而這班饑餓的人們，一向給官場瞞住了。村上有幾百個男女和小孩子都因營養不足而死，雖然這穀差不多即藏在他們戶外。隨後我纔知道，以內有許多地方，政府都會需藏大量食品，而在這種地方的農民，反會餓死。為什麼做這種事情，祇有史達林的政治局能講，然而他們並不肯講。

收穫實際上已告完成了。男女的聲音很和諧地混在一起，經過了死亡的痛苦，他們又能唱歌了！國家固然要取去大部份的新穀，但這一年的收穫非常豐盛，所存下的也差不多足夠維持一年之用。那夜我在房間中，寫那上政治部的最後報告書，聲明我已在限期的十天以前完成了我的使命。我又把竊賊報告他們，建議將他們革職。

一輛大汽車正在駛來，我認識是哈泰伊維契同志。哈泰伊維契拉了我的手臂說：「在農民和我們中間的中間，正進行着殘酷的鬭爭。克拉夫青科同志，假使每個人都和你一樣的心腸柔軟，我們也許不會勝利。你要知道，我並不是怪你。事實上，我確見你在此地做了一件最好的工作。但我要你記住我所批評的話。」

農民仍在囁咕着他們所得的微薄。「社會主義」，他們很不屑似地說。「是比較搶劫稍好一些的名稱。」

我遇見尤立好幾次。有一次我會替他向政治部求情，因為他的收穫比我是落後了，我待他極為親密。我怎能料想得到，後來當我在政治上遭逢困難的時候，他也會是彈劾我的一份子呢？

一〇 我遇到了第一次清黨

追想起來，我很相信在這時候，我內心方面一定已開始與共產黨破裂。鄉村中的恐怖，在心理上已留下了永遠不能治愈的創痕。無論如何，一個人不能即此脫離黨籍。我努力恢復我的忠誠。清黨已在開始，所以更緊急，更重要。

幾百個清黨委員已選出了。他們立刻在工廠，辦公處，機關和學校中，組織公開法庭。我們比平常更要注意那不可見而又遍地皆是的眼目。我能安然渡過這一次大難嗎？

冶金學校的每一層樓，都裝置了密告箱，預備接受匿名報告。清黨時期是一個報復你平日懷恨的人的公開季節。

清黨委員會由兩三委員和一主席組織而成，構成一種法庭，他們同時是檢察官而又是審判官。茹林布同志，後來任冶金部高職的，是學院中的清黨委員會主席。清黨委員會所認為缺乏忠誠的人，就得繳出他們的黨證，以後永遠不再信任，沒有擡升的希望，而且在危急的時候，視為「人民的潛伏仇敵」，加以拘捕。朋友親戚，望風遠避，甚至絕不承認，假使接見了他，那便冒了政治嫌疑的大危險。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冬季清黨即將舉行的時候，校內的人都懷着恐懼。

保留黨員地位的第一條件，當然是對於黨的信念，最重要的，為對於史達林的忠忱。審訊的進行程序，包含懺悔，下流性質的審問，和縱火捕熊的手段，扮演種種醜態。全體黨員，在清黨的幾個星期中，都有出席的餘裕，「非黨員的大眾」列席，亦頗受歡迎。沒有一個共產黨員，能於事前知道所控告的罪行。

你會否在三年以前的一夜，因為友誼的懇摯，而作過多的談話？或許這些好朋友中間的一個，報告了你沒有留神的言語——你的叔父，曾在沙皇手下做官，你的愛人，因右傾而被拘捕了。

學院內的清黨正式舉行了。開始是茹林布主席的一篇冗長而又沈悶的演說。最後進行清黨。手續是這樣的：委員們坐在講台上，受審的黨員，傳到講台上去，將黨證交給了主席，開始背述他一生歷史。這是一幕政治的和精神的裸體表現——他的出身，經歷和興味的大綱，主要的用意就在懺悔他的罪行與錯誤。經過了懺悔，即受委員們和聽衆的質問。有的提醒他所遺漏的事情，有的引誘他作矛盾的答話。同志們起來發言，或表示援助，或表示反對。假使委員會對於被害人有了成見，他們就毫不憐憫地加以非難，爲了保護自己。這難關可能延長至半小時或整個黃昏。

在廣漠的蘇維埃領土的任何地點，同樣的清黨集會正在進行。

「山甯同志，請上來，」茹林布主席發言了。他是一位數學講師，開始講述他一生歷史。他是農民的兒子，早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他的職業，是在軍上工作，隨後進學院，做研究工作，最後擔任教師。「山甯同志，」一委員說：「當你在讀書的時候，你會否連合了其他學生，具名於一篇托羅次基派的計劃書上。」聽衆起了一陣騷動。「是的，我具過名的，但我久已聲明和他斷絕關係。」會場中的情緒顯然見得緊張。山甯的同伴也輪流地質問他，其目的無非要捉住他的把柄，以便保全自己。關係和他愈深的，攻擊也似乎愈激烈。山甯是茫無所措了，他簡直說不出他所要說的話。他們說，「我們知道你是托羅次基派，共產黨的敵人。」山甯的命運，很少疑問，是已經註定的了，大家爭先恐後地去打倒他，要把他從懸崖之上推落至深淵之下。山甯終於給黨中開除了。

熱烈間我們又聽着一個學生的自述。「休爾門同志，你父母在革命前是什麼身份？」「我父親是個破

工匠。」休爾門說謊。他父親開着一身成衣舖，僱了幾個人，他是個努力剝削者。休爾門是努力剝削者的兒子，應該逐出黨去。」被審問者的面色都變白了。這事變化不測，竟使他言無倫次。「你父親是否有個成衣舖？」「但他不是努力剝削者。」「他不是你的父親嗎？」「當然是我的父親。」「那你是從一努力剝削者的家庭中來的，你瞞住了本黨。」休爾門跌跌撞撞地離開了講台，他的前程是完了。

以後的幾個，差不多是虛應故事，然後蔡拉夫同志出現了。據他自述，他曾在軍隊中服役，得過許多獎狀。「你以前對於集體化有何感想？」主席問着。「原則上我是贊同的。」「不幸那是不確。我們這兒記載着，你會贊同布加林對於史達林政策的批評。」蔡拉夫要想申辯，却不生效。他這一件案子，顯然是無望了。蔡拉夫是學院內交際最廣的一人，可是當他由講台上走下來時，每個人都躲避着他。

講台上現站着杜可物資夫。他從八歲起做工，升為工頭，預備做工程師。「你結過婚了嗎？」茄林布問着。「結過婚了。」「婚禮是怎樣舉行的？」杜可物資夫滿面通紅。「在禮拜堂內，」他沮喪地說。聽衆都笑不可仰。杜可物資夫解釋說：「她的父母不肯讓她嫁給我，除非在禮拜堂內結婚。他們都是退化的人。在回來時，我將她的兜紗和鮮花，都藏在我皮包內。」「瞞住了黨部，還是罪惡。」雖有幾個人幫他辯護，他是開除了。

清黨是這樣地天天繼續着。在散課後開始一直到深夜，已成爲毫無興趣的工作。一位有天才的教師，和研究科學的專家，彼得夏爾金同志，也給他們傳了去。主席說，「你認識山爾麼？」「是級友。」「你會知道山爾具名於一篇托羅次基派的文件嗎？」「是的。」「你爲什麼不去報告清黨委員會，你知道這種事情麼？你還想隱蔽本黨？」夏爾金是給褫奪了黨證，差不多人人覺得驚奇。

總會仍繼續下去。一年青女學生，被傳到講台上去。「你已嫁了嗎？」「是的。」「多久了？」

五年。」「那一位是你的丈夫？」「他是個工人。」「他是黨員嗎？」「不，現在不是，但他本來是的。」「爲什麼他要和黨脫離？」「是鬧除的。」「你和他離婚嗎？」「沒有。」「你這位丈夫現在什麼地方？」「在秘密警察監獄中。」「你到獄中去探望過他嗎？」「是的。」「你不覺得慚愧去幫助一個與黨爲敵的人？」「他是我的丈夫。這是在清黨，還是在表演馬戲？我請你公布我的政治罪狀，你何以將我個人的生活，給聽衆當笑柄。」「你何以每星期要去訪問一個叛黨份子？結交人民公敵，你還不承認這過失麼？」於是台下有人喊着「擡她出去！」

當叫到了塞夏柴·朱凡脫可夫的名字，我心頭不禁泫然而動，這或許會運累及我。

「朱凡脫可夫同志，告訴我們，你心中感覺得怎樣，當農村正在集體化的時候？」「我執行區委員會所指定我所做的職務。」「你並不十分堅定，而且有好幾次表示動搖。」我覺得朱凡脫可夫將要失敗，假使無人支持，便不由自主地立了起來，請求准許發言：「我要請你發表對於這位同志做惡意報告的人的姓名。」「阿希諾夫，」主席說。提起了阿希諾夫，朱凡脫可夫重復恢復了他的自信力。「我告訴你們，此人的報告是不準確而沒有價值的。他恐怕我把我所知道的講出來，所以他先告發我，借以保全自己。犯罪的並不是我，而就是這位阿希諾夫。」我立了起來：「我和朱凡脫可夫同志及阿諾希夫同志一起在派古路特奴伊工作。我覺得朱凡脫可夫確是個誠實，肯合作，而有天良的共產黨員。假使阿希諾夫今天在此，我是準備要打倒他的。如果你們允許，我可以講幾件所謂阿希諾夫的成功。」主席顯然是驚惶失措了。他不要複述發付的恐怖。我的擁護激起了別人的勇氣，大家陸續起來替他發言。他的黨證是交還了，感激地握住我的手，淚珠在他的眼眶內滾出來。

我以爲在朱凡脫可夫之後，立刻就輪到我的難關。台上所叫的名字是格林京科同志，學院內的馬克思

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講師。他本是個貧窮農民的兒子，在一富家當看馬廐的小廝。沙皇傾覆的時候，他加入了共產黨。他在紅軍中做到隊長，曾受過傷。內戰以後，他會到一共產主義理論的專科學校去肄業，現在他在講授列寧主義。「你仍去見某些人嗎——譬如說，——」主席提起了三四個人的姓名。「以前碰到他們。」「現在呢？」「我聽見人家報告有幾個是被逮捕了。我不知道是那一個？」「誰給你這種報告的？」「熟人。」「你太老實了，你以為可以瞞蔽我們。你們仍在往來。你仍是烏克蘭第一，列寧主義第二。」格林京科似乎是嚇呆了，他的黨證吊銷，前程已完。

我還在奇怪他將要怎樣辯護，我已聽到傳呼我的姓名，便急忙地跑上台去。我講我一生的故事。「在什麼情形之下，你遺失你的黨證？你知道這是很嚴重地違背黨規嗎？」「我知道，我並且抱歉，同志們。這是在收穫最忙的時期，我替代一個突然暈去的集體農民做工，匆促間把我的皮夾遺失了。這兒是本地政治部對於這件事的證明。」委員會會驗過公文，在我的紀錄上註明，於是再進行審訊。「你破壞一黨部特派代表的信譽。」「恰是相反的，同志們，這是在破壞本黨。我假定你是指阿希諾夫。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關於他的事情了。」「委員會是十分明瞭這件事實。」主席很快地說，急於轉移題目。「最好你告訴我一些關於你自己的辦法——在洛其那收穫的時候。」這是我胸中早有成竹的。我承認為補救這次收穫，曾先割去雀麥和大麥，又組織了一個集體化的兒童院，目的在補救當時情形。這次收穫，比預定計劃還早十天。這是政治部對我工作成績優良所出的正式證明文件。「我將這張紙交上去。主席大為受窘。他便取另一方針，那使我呼吸輕鬆得多。「你父親是個黨員嗎？」「不是。」「你的兄弟呢？」「也不是。」「你父親為什麼在革命以前被關到監獄裏去？」「為了革命。」「他屬於什麼黨？」「他從沒有入過任何一黨。」「好的，別人要發言嗎？」三個同志起來攻擊我，也有人在頌揚我，但這兒沒有燎原的星火，我領向了

我的黨證。在離開講台以前，我請求委員們發表誰會告發我在洛其那所做的事情。他們就去查還案卷。「史古斌同志，」他們告訴我說。「正是我所想到的，」我微笑着。朋友們都圍繞了我，和我握手。

一九三四年初，莫斯科發表有十八萬二千五百個黨員，已為黨所擯逐。最後的數目恐怕還要大些，因為有幾處地區，清黨的手續尚未辦理完竣。二十萬以上黨員的前程，就此這樣結束。

一一 伊麗娜的祕密

這是我最後一年在校肄業。畢業後我盼望在冶金工業中得到一個較負責的位置。

在清黨後不久我即遇見伊麗娜。這全是巧遇，她住在我的鄰近，每日早晨與我同時出去工作，同乘電車，我開始注意到她。有一深晚，散會後回去，忽然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前面走過兩個婦人。我向轉頭來，認得一個是相識的女醫生在招呼我：「你近況怎樣？我介紹給你，伊麗娜·貝屈洛夫娜。」我藉口要送她們上電車，一起走去。伊麗娜乃絕世麗質，雍容華貴。我們走了差不多一個鐘頭，談着一切。她說，她在政府計劃局中做建築師，所以大半要久居此地。

「我覺得有說不出的快樂，當我遇見了你，」有一次我說。「我也這樣想，」她說，微笑着，「但假使你懂得，你該將這次晤面，作為最後一次。」她的批評很使我不安。「我要試試我的運氣，」我說。「記住，我是警告過你的。」「好的，但你也應告訴我一些你的事情。譬如——」「不要問我，」她打斷了我的談鋒，「我已經結過婚了。我的丈夫是個好人，也是個不幸的，我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妻。……我遇到了你，我很快樂，我一向是很寂寞的。」「再告訴我一些關於你的丈夫……」「請你不要問我，我要重提。」

我的警告。你是充滿了希望，我却沒有。」「我不接受你的警告。不論代價如何，我準備時常見你，」我說。

在公園內我們又會面了，我買了兩張音樂會的門票，會面後我們覺得很快樂。她也同樣地在期待着這一次的會晤。「我們上飯店去，」最後我說。「好的——但有一個條件：我自己付錢。你是個學生，而我正在工作，沒有你應當給錢的理由。」

我們至少一星期會見一次，普通還要勤些。冬去春來，我介紹伊麗娜給我母親。兩人一見如故。

一天晚上，她與我們全家同進晚餐，還留着不去。我們倆都知道，她今夜是決不回去了。「這是我們的新婚之夜，維克多，我用整個的心來愛你，」伊麗娜說。

幾個月過去了，伊麗娜常來，實際上成爲我家的一份子。我的父母兄弟都尊重她。

有一下午，散課之後，我去參觀足球比賽，在休息時間，到點心部去喝啤酒。我無目的地望過去，瞧到了伊麗娜華服盛妝，和兩個外國男子坐在一起。三個人都在喝酒，很寫意的聊着天。我簡直好似暈了過去，一夜沒有睡着。第二天，伊麗娜來吃晚飯，並沒有表示變態。我無意地談起足球比賽。「我們局裏的主任請我陪了兩個來賓回去，」她說，「他們真是厭物。」

到廚房去時，我注意到她的手袋開着，瞥見裏面有許多紙張，疑慮和嫉妬的心仍在燃燒着，我匆匆地閱了一遍。內中一紙用德文寫，內容是屬於技術的。另一紙是用俄文寫，開頭就是：「附上報告材料：……」這時我聽到伊麗娜的足聲，趕快把那紙張放好。無庸懷疑，還許多紙張和那兩個外國人，即是她生活上的神祕鑰匙。

那天離去時，我就問何時再見。「星期五，」她說。「星期五要演講，改在星期四罷。」「對不起，

星期四我有緊要公事。」她說。

我疑慮好幾個月了，伊麗娜在星期四總是很忙，不能見我。假如可能的話，我要在星期四那天跟着她，盡力去偵查我所要知道的一切。

這是一個下雨的黑夜，我相隔一段跟着。看她走近一所大廈，揸着電鈴，一個穿制服的人開了門，讓她進去，又向四週細察了一下，然後再將門關上，似乎在查考是否有人偵察。大部分來訪的是女人，有幾個我都認得。最後伊麗娜出來了，後面跟着兩個男子，裏面所着的是祕密警察的制服。我恍然大悟，伊麗娜也是一個祕密警察的偵探，使我大吃一驚。

早上我搬到一個朋友家裏去住。我寫信給伊麗娜，說是爲了我無法宣布的理由，我不能再去看她。我們從此斷絕。

不多幾天以後，母親交給我一封信。「親愛的維底亞：明天晚上六句鐘在車站上候我。我懇求你在水訣以前，爲我做這一件事。伊麗娜。」

她來了。「我們要上薩馬拉河去，」她告訴我，「車票我已經買好了。」我們在車站上下來，走到河邊，將食物都放在一方檯布上。她又帶來了一瓶納巴留利酒。我們兩人都喝着。

「告訴我你爲什麼突然不再愛我？」「你能告訴我你的祕密嗎？你爲什麼和外國人一同進出？星期四在那裏集會？」「啊呀！」她開始嗚咽着。「叫我怎樣說呢？我簡直捨不得你，我實在太愛你了。」她說，「親愛的，你且聽我講。」這是伊麗娜自己所說的一生事蹟。

我們住在基輔。母親是教師，父親是工程學教授。我是獨生女兒，學過音樂和外國方言。鄰家有個兒子，賽奇，在下科夫工藝學院中肄業，友誼成熟，我便嫁了他。可是祕密警察忽來拘捕我的父親。我們的

愉快生活便終止了。每天我到牢獄門口去送食物。

有一次，他們請我去見祕密警察部主任，我心中覺得很奇怪他們爲什麼來邀我。一中年男子很客氣地對我說：「你是個漂亮婦人，受過高尚教育，舉止文雅。我所建議的並不要你和任何人去睡覺，我們也有這種女人。我們要設法使你和相當的人物接近，然後可以聽到許多政府所要知道的事情。我們會給你很高的薪水，非特要保護你，而且要保證你所親愛的人。」「換句話講，」我說，「你是否要我送你幾條性命，幫助你製造幾件驚人的案子？假使我肯做那件事情，你會釋放我父親。」他笑了。「那麼，我很抱歉，我不能應允你。」「請你在這張紙上簽名，」他說。那是一張表格，具名人不許向任何人洩露談話內容，指明種種可怖的刑罰，假使違反了協定。

有一夜，我去交給我父親一個包裹，主管的祕密警察說，「我不能接受這包裹」。我站在那兒，嚇住了。我跑到總部中，求見主任。「你究竟決定了沒有？」他問。「不，」我說：「在我決定以前，我先得見一見我的父親。」「但你父親是在醫院裏。」「請你，請你讓我去看一看他。無論如何，你總是一個人類——」這兒沒有什麼人類不人類，大家都是革命的前衛。這兒也沒有感情作用。我且讓你見一見你的父親。」

我給領到一間病房中去。父親躺在床上，祇剩了一副皮骨，處處都是創痕。「不要哭，」他說，「我們天天打我。」「父親，我想援救你出獄。我應允……」「不，這是無望了，我兒。我的病絕對不會復元了。還是好好的伺奉母親和麥奇。」

幾天以後，我父親死了。我回到丈夫家中去。

我打斷了伊麗娜的故事。「不要講了，我不要再知道什麼了。」「不，我已講了，你就得聽完，」她

說。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過去了。我丈夫已畢業，進廠做工。他也同樣遭了拘捕，不到數月，他的包裹又在監獄門首給拒絕了。我求見主任。主任說：「請你相信我，兩年前所提出的建議仍有效。我們祕密警察實出必信。」「你爲什麼拘留我的丈夫？」我說：「假使你有母親或妹妹，你就會同情於我了。我不能做你們的間諜。」「爲什麼你這樣固執？」他說。

幾星期後，我接到通知，賽奇已判了十年苦工，送到烏拉爾斯集中營去。差不多有一年工夫，我老呈上呈文給政府各部，請求重審我丈夫的案子，當然一無結果。後來無意中我遇見了T.同志。也是和祕密警察有關係的，她吩咐我再寫一張正式呈文，請求和我丈夫會面。她說這次是會允准的。

不多幾個星期，我帶了好幾個大包囊，坐車到集中營去，一片很大的空地，四面用鐵絲網圍住。只見三百多個犯人，四個一排，正從森林內回到營中，簡直都不像人類了。我坐着等候賽奇，不多一會，看見一個憔悴的老人走近了。我問這官員：「這是何人？」這官員放聲大笑：「你是騙我，還是真個不認得你的丈夫！」這老人走近時，我承認識真的是賽奇——但衰弱蒼老，不像樣子了。我跑過去，抱住了他，低聲的喚他，「親愛的？」他意志模糊地望着我，突然跪下來，開始哭泣，吻着我的衣服，我的雙膝和兩手：「伊麗娜，親愛的，救救我，假使你能够。我們受到畜生而不是人道的待遇。」

我回到卡科夫去。還沒有再躊躇的餘地了。我祇不能顧我的身份，訂定了這場交易，——爲了報答賽奇

的自由，我須接受祕密警察的束縛，聽候他們差遣。

他們給我第一道訓令，教我些祕密警察的速成課程。「你先在卡科夫學習。以後我們派你到孟伯洛貝屈洛夫斯克去。那邊集中了許多外國人——從美國來的工程師，法國來的專家等等。那兒有無數要做的事

情。我第一個忠告，是訓練你的記憶力，決不要寫什麼東西下來。練習你的外國語言，那也是寶貴的工具。你的美貌也同樣的重要，不要斤斤於衣服及化妝品的費用——那是正當的開支。不要信任任何人。不論無意與否，決不要提起你的任勞性質。還有一句重要的忠告，決不要接受任何飲料，除非是當你的面倒出來，而你的主人第一個先喝着的。」

賽奇果然在兩個月內回來了。他是個聰明人，從沒有問過我怎樣救他出來的。「維底亞，親愛的，你得仔細一點。我們所住在的國內，四週的人全戴上了面具，切不要把你的思想去告訴任何人。」

一二 尼古泊爾的工程師

我們正準備着畢業考試，但最後的幾個月，儘是政治舞臺上的紛擾。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尼古拉伊夫在列甯格勒黨部辦公處，鎗打死了賽奇。洛夫，政治局委員，北俄羅斯的「迪克推多」。這一鎗的回聲，餘音嫋嫋，幾十萬人要弄得家破人亡。達林趕到列甯格勒去，親自監督着徹底盤詰尼古拉伊夫。外人當然不知道他聽到些什麼，但從他以後的行為看來，可以猜到他已经到十分恐慌的地步。幾百個嫌疑犯都被捉去，並不經過審判手續，立刻就鎗斃了。關了好幾年的，從獄室內拖出來，立被處決。還有幾千個「政治上的敵份子」，給流戍到寫遠的地方。恐怖狀態，傳佈到莫斯科，基輔，卡科夫，最後及於全國。

寇洛夫被刺後，第一次報道說，刺客是外國人的工具，然後來了一連串的官方報告，含糊地說尼古拉伊夫與托羅次基，齊諾維夫，加米內夫，及其他意見和現政府不合的黨徒相勾結。黨內還有一種謠言，即



尼古拉伊夫的行爲，並沒有一些政治性質，——他是爲了寇洛夫誘姦他的妻子，妒火燃燒，所以纔打死他的。道采子至今還不能明瞭，讓人神祕似地推測着。有時我們也討論心中所懷疑的。史達林最親密的友人被刺，使我們覺得這是不滿心理的部份表現，下面却蘊藏着忿怒，熱得像火山一般。

雖然報紙上並沒有數字發表過，但幾千個學生已被逮捕處死。我們學院內的學生忽然失蹤，不足爲奇。我避免加入政治論辯。

我的教友M可說也是少數共產黨員中，我有時敢和他談論政治。他邀我到安特烈·S家裏去會見幾個朋友。我注意到一件奇事，他們都用假名互相稱呼，加上了陰謀色彩，使我覺得戰慄。

我們愈談愈激烈了，漸漸講起「克萊姆林宮的暴君」，可惜着這「壓迫的人民」，以爲史達林一定要先有一個藉口，然後能進行削減黨內反對份子的暴動。散會時，我方纔悟到我所做的事的嚴重性。我是參與了一種陰謀性的集會，全國有數千學生，即爲此而犧牲了他們的自由和性命。

在下午一點鐘，我被傳到黨部辦公室去。我發現M早在那兒了。黨部書記，關好了門，面朝着我們，態度很是嚴肅。我在等着那最不幸事情的進展。「同志們，」他說，「我要報告你們一個很悲慘的消息。我們中一位最優秀的同志，今天早上在房間內自殺了，可能是爲了戀愛，也許是其他私人悲劇。」「這是誰？」我問。「安特烈S。」當我們魚貫而出的時候，M緊緊地捏住了我的手。雖然沒有人確切知道安特烈爲什麼自殺，但學院內謠傳着種種離奇的推測。每個人都覺得安特烈的死亡，和列寧格勒的暗殺案，無相當神祕關係。

核對黨證並不如清黨一般地公開，他有時察調查性質。我們一一被傳了去詢問。當輪到了我，我一身冷汗，懷着恐懼的神情，跑進辦公室去。還是人人熟悉，一貫方式的查問——我的傳記，我的朋友，我的

血系親族，我的黨務工作，在儀式上逐一背誦。「克拉夫青科同志，這很奇怪，就是你家庭中，祇有你一個人是黨員？」他們問。「有什麼奇怪？最後分析起來，國內非黨員比黨員多。」我說。「他的父親，」秘密警察插進來說，「革命前在政治上是很活動的，但共產主義似乎不十分合他的脾胃。」「對不住，同志們，」我說，「因他沒有進黨，而貿貿然作此假定，是未免太不公正了」。

我的記錄顯然還清白，我又可以得到安全。會談完畢後，他們就將黨證交還給我。

我得到文憑的一篇論文——我自己所發明的一種新式輾軋鐵管機器的說明和圖樣——領到了政府特許專利的證書，雖然這機器永遠沒有造成。經過國家檢定委員會的口試，我結束了學生生活。同時我送了一份畢業論文給奧實和尼基次部長，得到很熱情的答覆。在學校內幾年，我經常和他保持接觸。真的，不知不覺地這公事上的關係，竟變成了私人的友誼。但我不願去利用他。我請冶金託辣斯，主管全國鋼管和其他鋼鐵製品的機關給我安插。主持人名雅各伊凡京古，他決定派我到尼古泊爾新建的冶業聯合工廠中去。母親和伊麗娜在碼頭上揮手送着。我的生活將開始一個新局面，我現在已二十九歲了。

尼古泊爾是海伯區的一座古城。可惜這廠離城很遠，五千工人，大部份還是擠在那工程潦草的宿舍之內，比我第一次參觀時，稍為好些。我個人寄居於一所寬大的住宅內，離廠不過一英里路，外有圍圍，裏面裝着浴缸，無線電及冰箱。車間內有一輛汽車和兩匹駿馬都是給我使用的，還有一個車夫，一個管馬廐的，與一個壯健農婦，掌管家務，專司烹飪。農婦的工資歸我付，其餘都由廠方給予。我按月收入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個羅布之間，若將紅利加上，可至二千個羅布以上。我手下的工頭和技術工人，很少有人能賺到四百個羅布以上的，而不熟練的男女工，祇能賺一百二十至一百七十五個羅布。

我因事務繁忙，時常劇烈工作。有幾次連續工作至四十八小時或七十二小時，祇能在辦公室內的椅上

抽空打瞌睡。但有時獨自在住宅內，有寶莎替我做可口的菜肴，自己覺得非常慚愧。我要懇摯地和工人們達立公開的友誼關係。

以前主管該廠建築工程的勃來契克同志，現在是董事了。技術管理方面，祇有勃來契古與總工程師維許內夫，階級在我之上。在政治方面，重要人物為亞力克山·卡士洛夫，黨部委員會的領袖。史帶洛司了同志乃工會主席。尼古泊爾城黨部委員會書記為勃勞慈基，祕密警察主任為杜洛甘，粗魯燥急，面孔類似哈叭狗。他那位得力助手格許貢，在我個人的恥辱史上，佔據着特別地位。他是個胖子，有時會眉語笑，有時肆意凌辱，看人而定其應付方針。

這裏有兩所輾軋鐵管的分廠，每廠要用到一千五百個男女工人，其中一所，全由我管持。雖有許多風險，但我却喜歡担负這種責任。各事都進行得很順利，我覺得有說不出的快樂。但我每一步都受人注意，不但在廠內，即在我個人私生活方面。我時常假定我的私人書記，一個中年女人叫作都維娜的，是在報告我，同時我的汽車夫，我的女傭，至少一個，或許還不止，我的助手，都是密探。

我的母親來訪問我。她腦海中深深印着那富麗的屋子，精緻的傢具，許多令人舒適的時新事物，尤其那五間屋子。我請了幾個同事一起來吃晚飯，她堅持着要自己担任烹調。

第二天，一位工程師告訴我，他在食堂內看見我的母親和廚子及女侍們在談話。次日，又有人來通知我，她在廠內空地上，「手中拿了筆記簿，沿途竊取新聞。」我聽得她已到了工房，合作商店，和託兒所。

那天晚上，我到家的時候，母親正坐在我的椅中，一本正經地在拍紙簿上寫着。吃過了飯，母親發覺了。

她告訴我她已經徹底視察過這工廠房屋，託兒所，俱樂部，洗浴和衛生的設備。她的聲音充滿了譴責

。「我所見到的，使我大為吃驚，」她說，「你會否知道工人所受的待遇？廚房簡直醜不堪，菜肴又絕對單純。至於工房，你真以為配給人住的嗎？」「爲什麼要責備我，這責任不是我負的呀。」「至少你得明瞭事實。污穢的水，簡直不能稱爲浴池。託兒所又沒有醫藥和細麻布，甚麼東西都不够用。」她的眼眶內滿裝着眼淚。她爲她兒子所享受的而更加悲哀。

她回去後不多幾天，卡士洛夫同志召集了一個技術方面，黨部，和工會人員的聯席會議。我感覺到興奮。這是將我母親所指導我的事實，陳述給當局聽的機會。

「克拉夫青科從什麼地方得到這許多的消息？」有人在問。「這是他母親說的，」史帶洛司丁，工會領袖開口了，帶着一種嘲笑的口氣。「這位貴婦人要爲她的兒子製造政治勢力呀！」這屋內頓時就騷然了。「同志們，靜些，」卡士洛夫開口了，「克拉夫青科的母親，並不是一個貴婦人，她是個老工人的妻子。」

在以後幾個月內，母親的呼籲，竟得到了一部份的收穫。託兒所已掃除清潔，得到了更多的細麻布，新浴室的計劃也已經發表。克拉夫青科太太的工人福利運動，在廠內傳播開來，她的兒子也沾着了不少「光榮」。

有一晚，我在城裏瞥見了我那位老處女式的書記，都維娜同志，從尼古泊爾的祕密警察局內走出來。我不用着疑慮，她是在報告我。第二天，我吩咐人事科將這婦人調出去，介紹別人來做她的事，最好是男性。隔了幾天，一個年約三十二歲的男子，拿了人事科主任的便條跑來見我，外貌非常特別，似乎是掛着破布的一具骨骼。「我是剛從監獄中出來的，」他說，「假使你給我一個機會，我想我的工作可以使你滿意。」

我的電話鈴忽然響起來，這是羅曼諾夫。他說，「假使你肯雇用格羅門市民，他是可靠的。」我打電話給秘密警察，和格許貢接通了，這是我的責任去報告他。他聲明假使我覺得這人可用的話，他並不反對。

我告訴他可以在一二天內到差辦公。我預付他充足的款子，給他必需的衣服，替他找一可住的房間。格羅門很快地證明他的聰敏和能幹，人也漸漸地變成豐腴，目光活潑而有生氣，似乎是脫胎換骨過了。有時在工作完畢後，我就開車子送他回去。我們的關係，完全根據於溫和的人情。

一天早上，格羅門沒有到廠辦公，我以為他生病。第二天他還沒有出來，我覺得焦急，在桌上發現了一張紙，都是手繕的，是格羅門的親筆：「親愛的維克多·安特烈伊維契，當你讀此時，我已不再在尼古泊爾了。我正要逃出去，即使死亡，也比奴隸的生活好些……」

我嚇出了一身冷汗，胆怯地關上了門，敲上了手套，再將這信取讀。

「我痛恨蘇維埃政體和他的警察。你遇見我的前一夜，我剛受到命令，從集中營出來，帶去見格許貢。那是怎樣我會到你的地方來的原因，而你是其中的犧牲者。我是主要偵探，在你的工場和辦公室內的偵探都有報告給我，每星期編成綜合報告。爲了感激你的同情心，我向你披露他們的姓名。」跟着是一張表，裏面有羅曼諾夫。「請你當心這班人。我猜你也許要疑惑這封信是圈套，但我發誓我所說的完全是真話。假使你能信任我，將這信毀掉，假裝因爲我潛逃而非非常震怒，他們決不會就我已將他們出賣的。我要請你體上天好生之德，在報告我的事情以前，給我以一天的餘暇。這寬放的一天，也許就是生死的差別。我跪下來懇求你。」我燒掉了這封信，滅去了紙灰痕跡。

第二天我通知人事科，假做很動怒的問他們，爲甚麼不替我找一個可靠的書記，他已無故缺席三天，

連假都不會講。格許真自己也來了，問了我許多問題，搜查了格羅門的書桌，然後離去。逃亡命者是否能脫逃，我不知道。偷渡蘇維埃邊境的機會是很少的，但也有幾百個人，會達到他們的目的。

關於我四週偵探的情報，確能幫助我，保全了我自己，有時也保全了別人。格羅門的繼任者是一位共產青年團女團員。我的汽車夫姓名，也列入格羅門的表中。女傭寶莎則並未列入表內，或者格羅門不知道她。有一天，我買給寶莎一些禮物。「我不能收受這些東西，」她哽咽着。我保證嚴守祕密，她畢竟告訴我了。總而言之，她的意思是這樣的：她不能接受一個善良的人的禮物，而一方面却偵探着他的事情。

尼古泊爾常有幾個外國工程師，在蘇俄人看來，他們都是使人恐懼的人物，和他們往來，是有危險性的。當勃來契古同志向我建議，我屋內可以住兩個美國人，我實在是怔住了。與「敵性階級份子」接觸，難保一無牽涉，我很恐懼。

勞萊和喬易住在我屋子內，已好幾個星期了，一天清早，格許真忽然打電話給我：「寄居在你屋子內的美國人，今天要去打獵，我要你等他們走了之後，立刻打電話給我。吩咐你的用人今天可以休息一天。」

喫過早飯，美國人很高興地向山中出發。格許真來了，另外還帶了一個人，在客人的房間中，很辛苦的搜索着。在四點鐘光景，搜索完畢，一些沒有找到什麼。「你當然懂得，克拉夫青科同志，這件事一個字都不能給人家知道的，」格許真說，「請你簽這張誓約。」

格許真一度與我很友善，他給我看一張照片，據着那兩個人正在一個莫斯科旅館內和幾個女人胡調的情形。他將這有傷風化的照片給我流覽的時候，他一面得意地吮着他的厚唇：「他們回到了美國，決不敢

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寫任何粗鄙的詆毀文字了。」

另有一外國工程師，名叫蘭恩次，是德國人。他的女譯員乃一密探。沒有多少時候，亞力山恩特拉便與蘭恩次同居，成爲公開的祕密，而祕密警察方面，認爲一個女人還不够，所以又加派了年青的娜姐莎去當遣差使。娜姐莎是一個已給充軍出去的牧師的女兒，在城內也很有名。禮拜日，那德國人和她一同到森伯河上，泛舟作樂。他漸漸地情不自禁，正在扯開了這女孩子的內衣，暴露着她的胸部的時候，猛地聽得有人正拍小照。他突然攫取了這攝影機，擲在河內，將那開汽船的祕密警察痛罵了一頓，向管理處訴說，恫嚇着要去報告德國大使館。蘭恩次不久即接到離去俄國的通知。他所以同意不到德國大使館去申訴，我猜是已用去了不少的德國馬克。

一三 快些，快些！

一九三五年九月，圖內資盆地煤礦區中發現了一件奇蹟，一工人叫做斯坦哈諾夫的，在一班上開採了一百另二噸的煤，比每個礦工的普通生產量增加十四倍。這裏面不免有破綻，對於一個實事求是的工程師，其中虛僞的成分是顯而易見的。這是克來姆林宮爲了創設一種新宗教——快速化的宗教——所以定做了那奇蹟。斯坦哈諾夫所做的，礦工全都能做，礦工所能做的，其他企業全都能做，懷疑者要受到刑罰。莫斯科的命令要我們立刻造成斯坦哈諾夫工作隊，表示反對的便當作破壞工作的奸細看待。

我們的工廠開辦了還不到六個月。他們在許多不利的條件下分三班輪值工作。這似乎是最不合理的時期去過份增加工人和機器的負擔。但命令到底是命令，黨部領袖卡士洛天和勃來製古董事召集了工程師和

各部主任會議。最後，我們不得不求助於一種人爲的工作加速化，改變勞動組織，把最好的工人，頭頭和工程師都放在司一班上去工作，選出最精良的工具和原料，專門留給這特別班應用。然後開始那似是而非的表演。

像原來所預期的，完成的工作，超出經常定額百分之八。報紙上登着火辣的大標題，各都會的官吏，紛紛來電祝賀。但這實在是詐欺。其餘兩班奪去了最優秀的人員和最精美的工具，所失的比那有最優條件的工人所得的還多。

在整個國內，加速化運動變成了一種狂潮。頭腦最簡單的工人和礦工，覺得這新紀錄將定爲每個人的「水準」。斯坦哈諾夫工人賺得比他們同伴要多，享受着各種的權利。不久命令到來，斷然地要改訂那工資所依據的生產標準，將他提高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意思是出了同樣工資，要多獲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工作。這等於嚴重地減低工資。羣衆的忿恨是極默的，陰沉的，但很明顯的。火上加油的，新水準應由工人們自己接受，舉行全廠會議。「同志們，本席提議一致接受這件提案，」工會的主席喊着，他是奉命這樣做的。突然一女人的聲叫着：「主席同志，干佑希金沒有舉手。」「干佑希金危害會議進行，毀謗偉大的斯坦哈諾夫運動，」有人喊着。干佑希金聳了聳他的肩說，「是的，我每月祇賺一百四十個羅布，而要養活三個兒女和一個妻子。」會後，我叫人帶信給干佑希金，叫他工作完畢後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將他調做新的工作，先從互助基金內借錢給他，同時發給他一套工裝衣和一雙皮鞋。

有一夜我給電話鬧醒，一座機器忽然損壞了，就穿起衣服出去。我立刻明瞭了發生事故的原因。有幾個斯坦哈諾夫工人的熱心份子和一工程師，擅自決定去增加那製機的旋轉速率。那管子當然沒有接受過史達林黨徒的信仰，有一大段在主要皮帶上爆裂了，以致不能應用，道事情是夠嚴重的，機器乃德國所造，

非經過很長時間，不能修理。那具有警察心理的一羣官員，祇注意於發現罪犯而並不關心到恢復工作，全廠都有調查的人紛擾着。其時有一精巧機匠，迪平斯基，帶了他的助手，許伯克斯基，一同跑來看我。他們以為也許能製成與破損機器相同的零件，但他們先要得到保證，萬一失敗，不能責以浪費時間和原料。我研究了他們的計劃，決定是值得一試的。因要保障，我將我所決定的通知勃來契古，卡士洛夫，和勃勞慈基。我湊巧知道迪平斯基在眾人中間，正是最受官方嫌疑的一人。差不多有四天之久，秘密警察的偵探，從旁注視着，預備告發我們，萬一事情做錯了。最後試驗竟是行的，生產又能進行了。

有一早晨，我發現馬加伊夫，我所器重的旋盤工人，在工作時啞地啜泣。當我問他是否發生了什麼變故，他指着對面的牆頭。那兒貼着一張諷刺畫，畫着那工人，下面還有題詞：「斯坦哈諾夫主義的破壞者。」我承認我或許會有錯誤。「他懇求着，「原因是由于妻子害病，我有好幾天沒有睡。我因此已削減了工資，難道還不夠嗎？」我叫那工頭過來：「將他擄去了。」「我不能做，我會陷入困難地位。」「我負全責。」招紙移去了，幾分鐘內，黨部的狂熱者，一齊向我進攻，要去控訴我。「你們去控訴我好了，」我說，「你們破壞紀律。趕緊替我去上工，不應當在這兒和我辯論。」後來卡士洛夫邀我過去，這事件已控訴到他的面前了。我陳述了我的意見，很欣悅的發現他也和我同意。工人們更擁護我，但同時也得罪了無數的官吏和有勢力的黨員。

又有一件德國機器，主要的「軸承」折斷了，換置新的頗不容易。我細細分析，很明白了。工場內的燈光很壞，有人在無意中檢錯了一塊鋼片，放了進去，「軸承」便斷了。經濟部不滿意於我的說明，仍念念不忘於捉拿破壞工作者。我邀請專家，做了幾篇報告，報告一致趨合，似乎使警察覺得「奇怪」。我收到了一紙緊急定貨單，定的是不生銹的管子，由奧賓和尼基次簽名。廠內沒有做那種定貨的設

備，又沒有做這種工作的經驗，所以通知當局，不要期望過深，方纔着手。爲了幫助我們，莫斯科派來一批特別工作隊，中有一位冶金專家提馬生科。工作開始很遲緩。第一批製成的管子祇有一成可用，而且有缺點。各專家都來貢獻意見。然在多數偵探們看起來，這種困難，可能是故意破壞。

我們到底解決了技術問題，不銹的管子是做成了，但格許賓硬以爲他們捉住了提馬生科的把柄，問我爲什麼要「保護」他。我恫嚇着他要打電話給奧實和尼基次，揭發警察方面干涉我的工作，他方始靜默下來。

一九三六年初，奧實和尼基次同志召我到莫斯科去，他簡直是保護我的天仔了。我與秘密警察的關係，已到了僵局的地步。我久想放胆將這事實陳明部長，這次是我的機會了。奧實和尼基次告訴我所以邀請我來的用意。巴庫油業急需一種特殊的管子，整個採油計劃，全仗我們趕緊製造。「我常常要盡力去做，但我希望你能了解在秘密警察干預之下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於是詳述那巧妙的偵探術。「照你這樣說法，我並非不以爲然。」他說：「有許多事情從你的立場是看不到的。我可以保證決沒有人敢來侵犯你。」他打長途電話，命令尼古泊爾的祕密警察不得再去煩擾克拉夫青科同志。「你滿意了麼？」他微笑着。

警察方面，暫時和緩下來。同時我們對於新公佈的史達林憲法，也抱着無限希望。歐州似乎又趨向於戰爭。跟着義大利竊據阿比西尼亞的，就是西班牙內戰。希特勒正在揮着他的納粹之劍。也許是我們決定要聯合羣衆，故此慷慨地賜予了一些自由。但強迫勞役，却已實行了。四五百個憔悴的男女，正在武裝警衛監視之下工作，這是我所見最淒慘的一羣人類。每天完工後，這班犯人排好隊伍，開拔到不多幾里路的獄舍中去。我審慎地打聽，方始知道這種苦工，是由建築工程官員和祕密警察「訂約」的。

在我父親和我之間，自從我進黨以後，似乎發生了一種隔閡。我請他來盤桓幾天，他終於同意了。「你真像一位鄉紳。」我父親祇說了一句。他在廠內各處交結朋友。「克拉夫齊科同志，你的父親，是位好人，真是好人，」他們都說。

在晚飯時候，我們隨意談談。他說：「貨幣的工資，祇漲了三至五倍，大家就歡呼着，當他是經濟上的大進步，但生活費用不止漲了五倍，而已提高至十五倍，四十倍，五十倍之多。本來每月賺五十個盧布，算是很闊的工人了，現在賺二百個盧布，反而是個可憐的窮小子。我們以前至少能隨便思想，專制政治固然暴虐，比之現在似乎還算寬大。即以我們所稱爲工會的而言，他們除了強迫施行政府決策，在我們身上榨取更多的工作而外，還有些什麼事情可做？即在漫壞的羅曼諾夫王朝時代，人民還可以離開國家。現在我們全都關閉在內，誰要越過國境，就得同狗一般地鎗斃。這與古代的許多農奴，有何分別？」

我緘口無言了，祇有皺眉。

一四 大清黨時期

在市黨部委員會會議後，齊諾維夫，加朱內夫，和其他老共產黨的被逮及就審，已發表了。以前列甯的舊部，是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竟受到死刑的公開審判。莫斯科是混亂不堪，而列甯格勒也不見得好。上千個人被逮捕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就祕密告訴我兩位工程師被捕的新聞。晚上舉行黨部常務會議，薩恩斯基當主席說：「今夜的議事日程上，我們祇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分廠廠長，共產黨員，阿凱第·凡雪里維契·列孟斯基的事情。」「我嗎？」列孟斯基跳了起來。他本來言語流利，態度鎮定，現

在訥訥然講着他的一生，不知所云地夾着與本題無關的事情。蘭恩斯基露出鄙夷的態度：「你曾經發言反對過中央委員會，和我們所敬愛的領袖史達林同志嗎？」「不，當然沒有，」他否認。「那我來提醒你罷。這兒有一張相片。這是你的簽字嗎？」最後會議中一致決定將他開除黨籍，以後就沒有人能知道他的究竟。

一兩個星期後，勃來契古的辦公室前面，停着一輛可怖的，沒有窗戶的秘密警察局卡車，人們都稱做「黑老鴉」的。有許多工程師和技術員，列隊走出大門，逐一給執了鎗的秘密警察，推進車廂中去。當我們正在躊躇着，有一女人發出歇私的里亞的淒厲聲音，大家吃了一驚——然後又是一陣寂靜。一個被捕的人的妻子，也在我們廠內工作的，恰好看見她的丈夫，給推進「黑老鴉」中去，她慘叫一聲，隨即暈去。

廠內工人中，有一個德籍猶太人是共產黨員，在希特勒掌權後，逃難到蘇聯來的，名叫瑞爾門。有一天，給秘密警察傳了去，在數小時後才回來，面色灰白，混身發抖：「克拉夫青科同志，到德國去，你懂得這意思嗎？我不但是猶太人，而且是共產黨員，不但是共產黨員，而且是猶太人。他們儘可以送我到西伯利亞或監獄中去好了，但我不能回到德國，不能回到德國！」那天以後，瑞爾門便沒有再回來工作。

我所能記憶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我知道波蘭斯且朱維契發生困難，當格許黃來問我關於他的工作。我在調查「怠工者」方面，往往拒絕合作。以後不多時，那波蘭人就被捕了，他的老母和妻子也在公寓中逐出。一天晚上，我坐汽車到尼古泊爾去，路上見到一鬢背老婦，攜着一個包裹，我認識是斯且朱維契的母親，我停了車，招呼她坐進來。我知道示惠於法律上所不容許的人，已遭清算的工程師，而且又被控為波蘭的間諜的母親，是何等的危險，但在當時我一切都不顧了。我的汽車夫回過頭來。「董事同志，」他說，「我也許是畜生的兒子，所以把所見所聞的都去報告。信不信由你，但我發誓，這一次決不報告。」

。』在我受審判的幾年內，這件事永沒有提起過，這事夫確不失信。

尼古泊爾聯合工廠內的空氣，是一天天地變得霉霧了。黨書記卡士洛夫聞已被捕。市委員會書記勃勞惹基，平常是堅決而有魄力的，現在他的手在抖着，不久將與握權的人一同關在秘密警察的地窖中。從這時起，控告和揭發黨內「偽裝敵人」成爲一件「榮譽」之事。你不救和你所最親近的同志們談話，疏遠着你的朋友，親戚和同事。任何領袖或官員的失敗，就速累及於他所任命的人和他的好朋友，一齊一肅清。勃勞惹基被捕後，「黑老鴉」和秘密警察的囚車，便忙着搜捕他的助手，他的朋友，和他在尼古泊爾各處所委任的男女。蘇維埃主席，本城最高民政長官，內戰時曾有光榮戰績，也在半夜裏逮捕了。主席遭到清算後，市政府內大部份的高級官員都給一網打盡。

一個新來的人，來接卡士洛夫的遺缺，名字叫羅司，是個愚昧而狂熱的人物，搜覓罪犯最爲起勁。格許賓和他的黨徒意興也極好，雖疲倦而很得意。清算黨徒連到幾十萬人，最後竟至一千萬人，該下獄的，該放逐的，該編入強迫勞工隊的，該立即處死的，都迅速地分別處置。婦女和兒童哭泣號呼，喊着他們的父親，丈夫，和兄弟的名字。

然而在暴風雨中間，報紙上和無線電中，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宣布正式頒行了那「全世界最民主的憲法」。

黨員往往和衣睡覺，以防有事故發生。我也有一隻小皮箱，裝着獄中應用的東西。「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賈莎天真地問着。「誰知道呢，賈莎，誰知道呢？」我嘆着氣。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突如其來地輪到受審。

我們在本廠俱樂部的戲院內，舉行黨務會議，羅司突然地起立發言，「請控告人說明，」馬加洛夫便

走到台上，我在學院時，即認識馬加洛夫。他本無才幹，專靠利用人們的同情心爲生。我替他在尼古泊爾辦到了職業，又替他找着一間公寓。我總假定他會感激我的。「我認識克拉夫青科已有好多年了，」他講，「他一直在欺騙本黨。他對於黨，隱瞞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實，——他父親是個活躍的孟希維克黨份子，煽動非黨員的工人們，反對我們敬愛的領袖。」「我們是在講克拉夫青科，不是講他的父親。」有人打斷他說。「克拉夫青科並比他父親好些，」馬加洛夫往下說，「他四週都用着敵性份子。他是個怠工者，故意凍結了價值百萬盧布的蘇聯貨幣，和不計其數的外匯。他定購了各種價值很貴的器械，將他們堆積在分廠裏面，沒有一件曾經使用過。我控告他這完全是故意的而且是有計劃的危殆政府與國家！」

現在罪狀業已公布，我心上反而輕鬆了。我覺得這種控告未免太牽強附會，鼓起了勇氣，跑上演說台去。「各位同志，各位黨員，」我說，「我並不否認我父親。他是個革命份子，但一生永遠沒有做過孟希維克黨員或任何其他改黨的黨員。至於說懈怠工，那太荒謬了。我分廠內確有大批器械存貨，部長全知道。我時常奉命做特殊工件，所以要特殊工具。譬如說，有一批緊急定貨像巴庫油田所用的管子，是大家知道的，後來忽然減少了先前所定的數量，有時我們已準備好的指定工作，全部取消了，因爲計劃已經變更。這樣才有那些價值不賤的器械堆積起來的現象。我們將這些東西保存着，因爲任何時候，往往不及預先通知，便須用到。然而這全是光明正大的，並不如告發人所說的上下其手。這都是莫斯科的決議，而不是我自己腦中的幻想。若以此爲怠工，是未免太滑稽了。同志們，我有文件可以證明。」

一位年約六十多歲的工人起立說：「克拉夫青科的建議很好。我提議請求市黨部指定委員會進行調查，而這位同志可將所有證據提送該會。」

從這時起，直到我所受苦難暫告結束，那在一年半以後，我是個大眾「不敢接觸」的人。

一五 我的苦難開始了

第二天，我翻開報紙，我已聲名狼藉了。有一段記載說，我父親是個「大地主和剝削者，」另一段說我是人民公敵的「爪牙」。市委員會勃勞慈基的後任叫做斐林的對我說：「請你不要煩惱，繼續工作，目前不會有人來干預你。」我謝過了他，心中安靜一些。羅司是絕對不能使人樂觀，但勃來契古能增加我的勇氣。總工程師維許納夫也在物料室內，查驗所「貯藏」的器械。「早安，」羅斯冷淡地招呼着我。「我們現在要幹正事了。這兒所有的器械，是不是你訂購的麼？」「是的。」「誰答應你這樣做的？誰副署這許多文件？」「維許納夫同志，他是總工程師。」維許納夫顯然吃了一驚。「啊，不是的，我不記得了，」他畏縮地說着：「即便我做過的，那一定是奉了中央的命令。」「那麼，」勃來契古說，「文件該可以證明的。」「我沒設法去找，」我允許他說。

我着意找尋這些文件，但像鬼怪似的，竟找不到，不知是否真的遺失了，或者是惡意毀滅。經勃來契古和斐林兩人的同意，我就動身到卡科夫去，如有必要，我還得到莫斯科，尋覓文件。我又要在聶伯洛貝屈洛夫斯克略事耽擱，以便證明我父親從沒有加入孟希維克黨。

我與我父親間心理上的緊張終於消失了，我不再是一個「堅決的共產黨員」。本鄉所遭遇的事故，也與尼古泊爾相同。瘋狂的清黨運動，僅在一夜中間，就將我們隣居三家的家長捉去了。在悲劇層見疊出的環境中，我家當然因我的困難情況，十分悲觀。我父親現在已不再做工，領得養老金，退職家居。他知道在一百件控告案子中，有九十九件，就算判決了。然而我們仍竭力希望，我會是那九十九件以外的一件。

我夜中不能安睡，因母親屋內忽有燈光，便躡足走去，只見母親跪在聖母像前祈禱，口中念着我姓名字，我躡足回到牀上，甯靜地睡着了。晨起，我和父親談話，他憤忿極了。「假使我做錯了什麼事情，他們爲什麼不將我逮捕？爲什麼要歸罪於我的兒子？好惡憑，毫無理性！沙皇的警察並沒有想到要麻煩我的父親，弟兄，或家族。但是現在——這可說是下流極了！」

那一天父親去拜訪了幾個當地的著名共產黨員，他自己一代的人物，記得起他以前的活動的。他們每人寫了一張宣言，正式證明他從沒有做過任何一黨的黨員。然後我和他去見卡拉范伊夫博士的姪女，說明爲了辯明我父親並不是孟希維克黨員，我們需要找尋「證據」。「可笑極了！」她說。「在那時候做孟希維克黨員，須有英雄本領，每天得去冒險。我想我也許是太老了，所以不能懂得現在這些人心內所想的是什麼。下一次，我到莫斯科去，必定將這件事告訴克魯克斯柏斯葛亞亞！」（按克魯克斯柏斯葛亞亞即列甯夫人。）這時候母親正在孫伯洛貝屈洛夫斯克黨部檔案股內找尋關於她丈夫在沙皇時代被捕和監禁的警察紀錄。

我在家鄉的這幾天，加深了我的恐怖。我的許多朋友，都已失蹤。我詢問時，大家避免作直接的答覆。廠內黨事史梯芬貝門，沒有給他們逮捕。當秘密警察們跑來找他時，發現他已躲在一盆鮮血中間——他不願受清黨的痛苦，竟割破了自己的靜脈。在他割破靜脈以前，他曾寫信給中央委員會，痛斥史達林的殘忍。還有一位約瑟夫·馬納揚可夫是烏克蘭·蘇維埃的著名委員。她的妻子也是個共產黨員，非常活躍，在克萊姆林宮內，曾立在史達林身邊拍過照的，也被逮捕了。同樣遭逮捕的又有總工程師石達諾夫，剛纔頒賜勳章。

當我動身到卡科夫時，母親特地到車站上送行。在卡科夫的鋼管工廠總部，混亂和恐慌是很顯著的，我終不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文件。有一次我竟打電話到莫斯科去，問管是那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人，奧賓和尼

基次部長，病勢正沉重，不便干請。我十分失望，打了個電話給尼古泊爾的勃來契古，問他我應否到莫斯科去試一試。「不，不！立刻回來，」他回答說。「爲什麼？難道出了什麼岔子了？」「我不能在電話中和你討論這件事。你趕快回來，至要至要。」第二天早晨，我就回到了廠內。

勃來契古同志的驚恐是不錯的。狂熱的黨員，正利用我離廠的機會，最先是祕密警察把我的人員都一順清了。有幾個人，已簽名於反對我的文件上面，他們因受威嚇，才這樣做的。

羅司要迅速解決這件公案。會議又在俱樂部戲院內舉行。這一次羅司早已預防有人阻梗，每個演員都準備好他的道白和尾聲。羅司先發表說，「罪狀大部份已給證實了，有大要發言嗎？」「我要的，」古許京說，「這控告全部是虛構出來的。雅西納夫會叫我去，要求我寫一篇攻訂克拉克夫青科的文字。當我拒絕時，他就恫嚇呢罵。所以這種控告文字，你們應給他多少價值！」勃來契古請求發言。他爲我辯護意工罪狀。我所訂購的器械，他堅持着，都是必需的，雖然有幾件因爲生產計劃變更，至今還沒有用過。道不能說是我的過失。「給事實我們看！文件在那裏？」羅司打斷了他的話鋒。「我沒有帶文件來，那是確實的，但相信總會找到。」當付表決時，祇有六個人投票反對開除。「你要上訴嗎？」杜洛甘問着。「當然，」我回答說，「我要打電報給奧賓和尼基次同志，並且要在卡科夫和莫斯科提呈抗議，明天我即向市委員會上訴。」

我回家中走去。疲憊極了，和衣躺在牀上。忽聽見窗上有人敲着。我走到門口一看，來者却非我意想中的祕密警察，而是工人干佑希金。「工人們都很煩惱，他們都尊敬你，替你擔憂。至於我呢，在必要的時候，準備冒險一下。也許你要藏匿什麼東西，或是遞送文件，或是將一種有危險性的信札帶給人家，我知道怎樣去實行。你可信任我……」干佑希金，我並不是怠工者，」我說：「我無須藏匿什麼東西，聽

還秘密警察來好了。我終身記住你，你來訪問我，這是我從尼古泊爾帶回去的最珍貴的東西。」

與干佑希金長談後，我恢復了原來的精力，決計再去搜查屋子中的文件。我走到那時常亂堆着文件的一口壁櫥前，看見上面放着一個公事皮包。我到首都去旅行時，就將皮包裏面的東西都倒空了，將他拋在旁邊。我把他打開一看，裏面空無所有，隨即闖好，想擲回去，忽然又重復開視。這次我轉到旁邊有個小袋，就在那兒——奇蹟中的奇蹟——我發現了定購器械的草稿副本，以及正在尋找中的複寫副本。中間又有油業托辣斯所做的計劃副本，根據以後會裁減過的計劃。此皆足以證明所定零件和特殊器械的數量，按照原來規定，是完全正當的。定單都由維許納夫副署。這整個不利於我的案件，現在似乎已化爲烏有了。

我再不能睡了，急於要將這好消息通知勃來契古，尤其是維許納夫。費事仔細披閱了一會，現出愉快而微笑。「維克多，你真是最幸運的人了！」我將文件印成了照相版，送一套給勃來契古，又送一套給維希納夫，第三套我交給一位親密的友人，連同一篇精心寫就的辯辭書。假使我被捕了，我囑咐他，應將這證據送呈莫斯科中央委員會。我寫信給奧實和尼基次部長，陳明現況，同時正式聲請市委員會，平反該委員會的決議。斐林毫不遲延，召集市委員會會議，宣讀我父親所得到的函件和證明書。勃來契古將複寫副本放在桌上，簡單地說明他們怎樣可以完全證明我無罪，同時維希納夫也無罪。證據既已提供，各委員發表意見，大多數人贊成我的「開復」。這是通過了，羅司和杜洛甘都沒有舉手。接着有人作其他的勸說——即克拉克夫齊科應受申斥。這顯然是要使杜洛甘的面子上不致難堪。令我驚奇的，斐林竟也贊成。我提出抗議，但沒有效果。

這件案子，得操勝算，是例外的。清黨運動在全國正鬧得如火如荼。在莫斯科審判的被告中間，我所最熟悉的人就是派愛他可夫，奧實和尼基次的助理員。派愛他可夫自己承認的「怠工」，大部屬於這

築工業。他手下直接主管全部建築工程的是C. Z 琴斯保，怠工不給琴斯保知道或默認，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然而琴斯保沒有被逮，史達林反升他做人民建築工業委員部部长。大家都認琴斯保是個離間份子。另一個是尼古賴古羅本科。他沒有經過審判儀式，即在卡科夫正法，誣為刺殺政治局委員的「恐怖中心」黨魁。古羅本科，派愛他可夫都是有罪的，祇因為他們不肯服從史達林的專制政策。在國外便給一般無賴笨漢寫成「第五縱隊」，我覺得十分驚詫。在派愛他可夫案內，有一歌司都夫也被控告，說他陰謀暗殺西伯利亞黨部書記，P. 埃愛契。歌司都夫是給鎗斃了。不多時，埃愛契也給逮捕了。大部份史達林憲法的起草人死了。第五縱隊，幾乎包括每一個人，除去了史達林，莫洛托夫，和駐美大使台維司。

在一九三七年的二月，我的悲慘的日子又到了。賽果奧實和尼基次突然去世，我失去了一個保護人。

一六 正義的尋求

我被邀在廠內追悼奧實和尼基次大會中發表演說。報上登載了一長篇哀啓，由史達林及十九位最高領袖簽名，籌備公葬。四位聲名卓著的醫生，證明死者是得了心臟麻痺症而去世的。那在哀啓上簽字的二十人中，現在祇有九個還活着，享有自由，其餘都已鎗決，自盡，或是在獄內瘦斃了。殯儀委員會七人中，祇有兩個活着，能自由，三個正法了，一個自殺，還有一個，流戍至遠地給活埋了。四個醫生，祇有一個存在世上，時常恐懼要受到清算。爲什麼一個領袖死了，要確實證明呢？因爲蘇聯人，尤其是黨員們，早已不信任人們會善終的。舉一個例，在幾年前，史達林的青年妻子，南姬士達，亞麗魯意伐逝世了。亞麗魯意伐是一九一七年前一個革命黨的女兒，似乎對於那大量恐怖的事情，懷抱着不時新的人道主義成見，

這種忍的集體運動的推進，尤非她所能容忍。她不僅在家庭中表示嫌惡，而且在黨部會議上，屢次攻擊她丈夫的政策。當亞歷魯魯意代逝世的消息發表時，正是她單鎗匹馬叛變之際。惟一可疑之點，即她是否自殺，或由史達林下令毒斃。

關於奧實和尼基次逝世的疑問，仍在蔓延着。當大規模清黨運動開始時，他因逮捕了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同事，向史達林提出抗議。他打電話給史達林，「科白，」——科白是史達林的親密稱呼！——「我要求獨裁主義立即停止！我仍是政治局的一員，我會引起大風潮的，在我未死以前！」他將話筒砰然放下，迷惘似的發着無效的忿怒。

在他最後病危時，連他的妻子都不許去探訪他。兩天以後，他死了，許多人相信他是服毒而死，但也有人以為是給雷文醫生斃死的。——這醫生後來承認毒死麥克新。高爾基。奧實和尼基次死於非命，沒有疑問。那末這盛極一時的葬禮，不過是趣劇中的一幕。在印行的照片中，那家婦——即不許和她丈夫見面的——在舉行葬禮時，就立在史達林的一旁。

新部長，奧實和尼基次的後任，是范來里恩。梅士樂克，他用私人名義，請我到莫斯科去見他。梅士樂克似乎在延攬可用的技術人才，但不大有什麼政治權勢，似乎史達林不敢再冒險試用另一個「獨行其是」的部長。「我想委你管理我們最大工廠中一個」，他說。「我會被控為怠工破壞者，」我說。梅士樂克聳了聳肩。後來梅士樂克也被捕而失蹤了，跟着就是他的兄弟伊凡。

一天清早，我剛走到廠內，發現斐林同志已在中夜被捕。那天羅司叫我過去。「我們又要將你這件案子提呈市委員會了。上一次你得到斐林——一個人民公敵的援助。現在我們不怕什麼了！」我的腐折，我以為已告終，不料却剛在開始。

晚上十一點鐘，我遵從格許貢的訓令，跑到秘密警察官署，他還沒有到。差不多一點鐘，格許貢最後出現了。他開始說，「你以前設法用幾張文件，就想在黨內逃罪。但這種戲法是騙不過秘密警察部的。我們要徹底查究。」這一夜，格許貢重復談起很多已公開討論過的事情。狡猾地引誘我自相矛盾的話，招認一切。直到清早四時，盤問還在進行。格許貢很嫌惡我「倔強」。夜愈深，他愈躁急，愈忿怒。虛偽的禮貌，漸次變做意存侮辱的傲慢，滿口蘇聯式的咒罵。當我離開秘密警察部時，天已黎明了。

我那天睡了一短覺，頭目暈眩地跑到廠中去工作，希望晚上休息一下。可是那天下午，格許貢又打電話過來，……我得再去一次，在十一點鐘，進行我們的簡單談話。審訊繼續了差不多一月之久，很少間斷。晚間不能安睡，實乃一種刑罰，其苦楚祇有曾感受過的，方能體會得到。因此我決定要到別處去尋求正義。我將此計劃和勃萊契古董事商量。「他們會利用你的缺席。」他肯定地說：「假使你竭力主張的話，我可以設法派你到別地方去。」

所以我就動身，先到我的故鄉。我舊時級友，沙希尼何夫，現任區委員會的副書記，是個有政治勢力的人物，學院時代的兩個同志，都在他手下任職，一個是蘇伏洛夫，另一個是尤來斯伊維契。這樣有地位的三個人所出的證明書，解釋我在黨部內品行甚好，也許是有助於我的。但他們都很冷淡地提出一種意見，以為我應到上級方面去陳訴，像他們這種位卑職微的人物，似乎不甚適合。我聽了便走，並不和他們作別。在走廊內，看見了伊凡柴爾京，他和我會一起工作。「你一切都順利嗎？」他問。「我被控了，」我微笑着。「啊呀，再會，……得去趕上一個約會，請你原諒……」他就這樣匆匆地跑去了。我最近知道他已做了黨部中央委員會中很重要一組的首長

弗記馬克林，哈泰伊維契的後任，我不熟悉，只有硬着頭皮再試一下。出人意外的，馬古林頗有人性

，表示同情。「關於你的案件，我會下道指令給市委員會的。」後來向到尼古泊爾，我就知道馬古林果然履行他的諾言，但在那時候，他自己也給逮捕了。他的說項，反使我受窘很久。

●我第二個地點是卡科夫。我熱切期待伊凡京古的投助。他是工業權威之一，我知道他的脾氣會維護他的屬員，祇要有理可說。但我發覺這鋼管工廠內充滿了恐慌的空氣。伊凡京古，革命的英雄，據說爲了公事被召到莫斯科去，一到那兒，秘密警察立刻將他擁到監獄中去了。他的同僚都給捉去。

我經過那巨人宿舍，決定進去探視一番，不清潔，無秩序，與七年以前並無多大分別。我有走過省委員會的總辦公處，我聽到一個很熟習的聲音嘆着：「維底亞，」這是山雅伏爾京。他在省委員會內佔着一重要位置。我們談及熟識的人的近況，大都已給逮捕了。分手時，大家約着不久再晤。然而。兩個月後，秘密警察也將他捉了去。

我想起要去探詢伊麗娜，打了個電話去，她親自答話，到旅館內來會晤。她仍然美麗。但也老了，目光中的憂鬱神情，比從前更顯得深刻。她的丈夫，她告訴我，已給逮捕了，又被送到集中營去，所以現在她和她母親同住。我沒有問她是否還替秘密警察工作。

莫斯科並不是個蕪貴城市，他仍是「俄羅斯最大的農村」，感動我的是他的永久性。羅曼諾夫王朝以前，他已在那兒，以後還是在那兒，共產黨徒擅權以前他已在那兒，以後，他還是在那兒。

我決意避免旅館內的登記，請米莎同志和他的妻子，允許我和他們同住幾天。米莎是個著名老革命黨，他曾在鐵絲網邊跟著我父親共同作戰。吃飯時，我告訴他我爲什麼要到莫斯科來，老人異常忿怒。「雅洛斯拉夫斯基，」他突地喊着，「假使沒有徹底腐化，必定會幫助我們！」雅洛斯拉夫斯基乃當權的少數老共產黨之一。第二天早晨，米莎同志打電話過去，接洽會面。他們互抱親額，誠懇地握手。這時我心內

又鼓動了回來。這畢竟是舊式的典型同志。但米莎同志開始解纜這次拜訪的用意，雅洛斯拉夫斯基的面部立刻就露出驚異的表示，漸次感覺到不安。「原諒我，米莎，」他說，「對於敵人，我們是不能姑息的。」我們垂頭喪氣地離開了他的辦公室。「他也死去了！」米莎同志兩眼中淚珠淋漓地說。

我尋遍了我的莫斯科友人地址一覽表，一面讀，一面用筆劃去了許多，這一個死了，那一個是自殺的，其餘的統被捕去了。最後我看到一個名字，使我驟然停止。「拉柴來夫！」我向我自己說，「我要去找他。以前他使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我敲着門鈴，兩個老女人跑來開門。我問起了拉柴來夫，她們竟開始啜泣了。「我的可憐的孩子，已經去世了。他們說他是人民的公敵，這些殺人者！」

我又去拜訪A的家庭。A同志和他的夫人，還有一個小兒子，都是爲了逃避沙皇的警察，在一九〇五年後躲到美國去的。其餘的兒女都在美國生出，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出落得和標準的美國青年一個樣子。革命以後，一家就回到俄羅斯來了。列甯自己曾歡迎過他們。A在內戰時，曾有卓越的地位。我跑到他家中去。一鄰居探出頭來，察看究竟是誰在那兒。「上帝幫助我們！女公民A和她的女兒們已被捕，發配到充軍的地方去了！」她連忙將門闔上，深恐話說得太多。我大爲震驚地離開這所屋子。走了沒有幾步路，我就覺察有人在跟踪我，無疑地是個秘密警察。當我告訴了米莎同志這件事，米莎又抑不住心頭的怒火了。「這班無賴！我們像住在監獄裏面一樣，外界似乎一點不知道這兒所發生的事情。」

我最後一件事，是去到重工業人民委員部中去。我所認識的人中，很少有留在那裏的。

在莫斯科開行的火車上，我無意中碰到了我的朋友，雅各·凡司聶克，克立伏羅格城冶金聯合工廠董事。他也是到首都來，設法消弭他那迅速捕案的。他的妻子，尤琴尼亞，最近在克萊姆林宮中和史達林合攝一影。這照片發表了，似乎是可以免罪的一種佐證。但後來他的妻子，也給捉去了。

我向到尼古泊爾，已是日暮了。當我走近我的屋子，我奇怪爲什麼裏面一些燈光也沒有，寶莎到那兒去了。我試去開門，已給鎖上了。我的鄰居，一個工廠職員，駭異地望着我，似乎他是見到了鬼了。「維克多·安特烈伊維契！」他低聲說着，「這真是你嗎？還活着嗎？沒有給捉去嗎？多謝上帝！」「出了什麼事情了？」「你還沒有知道嗎？你已經拿職了，而且奉令撤離這所屋子。我不知道你的行李在那兒。」我打電話給勃來契古。「奉市委員會命，我已解除你的原職。我現在命你主持廠內的技術部。你知道我沒有別的法法，我實在是痛心的。」「我今夜將在那兒住宿呢？」我問。「我已代你定下了一個房間，不是怎樣好的房間，然而這是惟一所能辦到的了。」

我乘車向到城裏去。旅館內的經理，正在等候着我。那房間與獄室相似，此即以後我在尼古泊爾的「住宅」了。

一七 夜半的拷打

當我在電話內辯出是格許真的聲音，在我覺得有些氣餒。這是我在廠內任技術主任新職的第一天，工作得很很晚。我是在疲倦，頹喪，和半昏迷的狀態中，當格許真叫我進去的時候。

「好的，克拉夫齊科，」他勉強裝作微笑，「你去找尋保障——從伊凡京古到馬古林，現在他們都是人民的公敵了！你的朋友和恩人，都變做了叛逆。」格許真是困倦，他的聲浪就愈粗暴而傲慢，向我孜孜不倦的詰問。「請你原諒我，現在已是早上五點鐘了，在八點鐘，我須報到工作。」

那天下午已很遲了，我給睡魔所纏擾，眼睛紅得發燒。電話鈴又響了，這是勃來契古。「維克多！現

在輪到我了。——廠委員會剛纔開過會，要消除我的黨籍。今晚在廠內黨部的非公開會議中，即將解決這件事情。我請你不必爲我發言，這紙會將事情弄得更壞，」他隨即將電話掛斷。

我出席會議。羅司將所有罪行，都推在勃來契古身上。最後由勃來契古發言，講他二十年來，做忠實共產黨員的歷史。「讓他出去！」有人喊着。開除的表決，是差不多一致的。我離開會場，就坐汽車到勃來契古屋中。他說，「我感謝你。」但不肯讓我多留幾分鐘，如果祕密警察發現了，對兩人都是不利的。第二天，勃來契古向區委員會去上訴，但祇到柴泊羅灣，就勒令下車了。以後我從沒有再見過他。過了兩天，他的妻子，姊妹，和書記都被捕了。祇有他的母親和六齡的姪女還留着，後來也失蹤了。

同一星期內，市委員會重復辦理「克拉夫青科案」。大家都以爲我的氣數完了，但我仍「福星高照」。那天，尼古泊爾報上忽然登載了一長篇論文，控告我們廠內人員的罪行，爲首要犯，是馬卡洛夫和夏開維支，我的主要告發人！預備給我的打擊就這樣不可思議地失去了中心點了。馬卡洛夫和夏開維支結果都爲黨中所逐出。事後我纔知道發表論文，及時救我出險，都不是偶然的，這全是許里甯和他的朋友的安排。

有天晚上，我在睡夢中給人喚起。這是格許貢，命我立刻前往祕密警察部。「好的，」格許貢喊着，「我真希望你懂，這一次。」「你要從我得到些什麼？」「我有許多問題！」他嚷着。「我不能告訴你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在那當兒，電話鈴響了。杜洛甘安他去，格許貢說，請我等着他，把我交給一個祕密警察。「面朝牆，雙手放在背後，不准回轉頭來，也不得將你的頭靠在牆上，」他命令着。我會聽到過這種刑罰，乃祕密警察所用最溫和的一種，但繼續至數小時後，你就知道受不了了。

格許貢來了，我神志模糊的跟他走去，他問了我許多的事情，但我一些不能了解。回到旅館，轉側不

能入眼，到上辦公室的時候，祕密警察方面早已有信送來，叫我夜半再去。

那一夜格許貢是甜言蜜語地謙恭起來。「祇要你具名於這件有關國防的文件上。你可知道廠中爲國防化學工業而製的管子中，含有劣質成分。這當然不是你的過失。」我慢慢的讀去。這是一種半真半假的謊言，內有全國著名的化學和鋼鐵工業的工程師姓名。「我不能具名於這樣一種文件，」我說。格許貢和我反覆地辯着，向我叫罵着，直到天明。

連續幾個月，我每夜被召到總部去，盤問，恫嚇，和誘惑，使我不能睡覺。有一晚，我奉命站在走廊內，面朝牆牆，有四五小時，才放我回去。次晚，他突然又發動了新控告。「克拉夫青科，你會和兩個美國人一起住過麼？」「是的。」「你會否向這些外國人訴說蘇維埃政體？」「不，當然沒有。」關於美國人的訊問，費去了幾小時，門又開了，杜洛甘大踏步跑進來，非常忿怒地對着我。「你要我些什麼，使我這樣長久地受着痛苦？我以共產黨員的地位問你——」我未說完，他便用手掌攔我，抓住我的喉部，準備要扼死我。他的力大，我眼前發黑了。當他將我推出門外時。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設法跑回旅館。

一天下午，格許貢走了進來。「你的化學學室實驗主任，凡倫丁別支柯夫工程師在那兒？立刻叫他過來。」別支柯夫來了。「你是個破壞者，跟我來！」格許貢拔出手鎗，向他的俘虜指着，隨即走出。隔了三四天，別支柯夫的妻子來見我。因他丈夫放在辦公室內的一具快鏡，一只馬錶，及其他東西不見了，財務部不肯給她工資。「請你問別支柯夫，他將那快鏡，馬錶，和其他東西放在什麼地方。」我不得不請教格許貢。「你自己去問他，」格許貢回答說。我奇怪他爲什麼准那被捕的工程師和我會晤。不多幾時，兩個祕密警察來了，夾在他們中間，極難認識的，即是別支柯夫。我見狀不覺驚悚，面部腫脹，全是傷痕，有一只眼附覓至不能張開。工褲上都是血跡，手上凝着血塊，身上有一種穢氣。「你將快鏡，馬錶，和其

他東西放在什麼地方？」我問他。「都在我助手身邊。」他回答時，放聲大哭。

在一九三七年末，訊問從不間斷地繼續進行。我寫信給中央管理委員會，申訴我正受着未經證實的含罪狀的迫害。不多幾天以後，一個調查員來了。在四週蹣跚了好幾天，也就離開了。

在這時候，尼古泊爾貼滿了關於國內蘇維埃憲法下第一次的「民主選舉」標語。十二月十二日，我得到了一張「秘密選舉票」，上面載着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既沒有寫「是」與「否」的空隙，也沒有填別人名字的地位。我們會受吩咐，假如反對那名單上的任何人，我們可以將他的名字劃去。在戒備嚴密的投票處，我將這紙條丟在票櫃內。廠內沒有一個人敢在紙條上刪去一個字。報紙上於是大聲吹着一致當選。我的抵抗力逐漸薄弱了。正在這個關頭，薛里甯到旅館內來訪我。「我請你，同志，不要簽字，你須堅持到底。」我從市委員會方面得到消息，將有一道新指令，非經共產黨黨部同意，不得再捕黨員。我尤諾了，在瀕於降服之際，懸崖勒馬。

一九三八年正月，格許貢給我一束文件，我的「自願證明書」實際上即是一種供狀，充滿了雙關辭句，間接承認我的朋友，上司，和僚屬的罪行。「我決不能承認我並沒有犯過的罪狀。」我說。格許貢突然狂怒。杜洛甘大踏步走進來，將我亂打亂踢。「你們可以殺死我，但我決不簽字，」我忍痛說。「給你三天去致慮這件事，現在滾出去！」

於是，我離去了，走進旅館，和衣躺在牀上，對着史達林畫像，充滿了深切的悲哀。

在半月半暗的光線中，來了一個矮小的白髮婦人。「母親，親愛的母親！」我喊着，投入她的懷中。母親洗滌和裹紮了我的傷痕。她沒有哭。她沒有問什麼。她帶給我羊毛襪，毯子，及幾件和暖的襯衫。「我常常替你父親預備下同樣的東西，當他被捕入獄時，……求上帝援助我們！」母親嘆着。

史達林的畫像，仍向我望着。我將他從牆上扯下，撕成碎片，跑到穿堂內的廁所裏去，將他丟入磁桶，鍊條一拉，便給清水沖去了。

管理委員會要在後天處理我的案件，請我出席。廠內新黨事不准我告假，但我心中決定前去。那天晚上，我在車站上，送別了我的母親。

最後我奉召進謁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共五個人，其中有一個在微笑着，感謝上帝，原來是格魯古利埃夫，老共產黨。我從小就認識他。他會和我父親一同工作。我精神上便似釋重負，大膽地，明白地發言了。費去了一個多小時，我回答種種問題。

「克拉夫青科同志，」主席發表說，「本委員會已決定批准尼古泊爾市委員會的決議案，並取消以前的申斥。你可以回去工作了。沒有人再來麻煩你，但我建議你最好掉換你的工作地點。」我隨即走了出去。那一夜在我父母家中，睡得沉酣甜整。

在尼古泊爾，塔許莫滾有再來叫我，董事絕不提我攬職職守，他們給莫斯科來的命令所嚇住了。我料運了些未了工作，就動身到首都去。

拉柴·卡茹拿維契，政治局委員，號稱爲史達林所信任的極少數僚屬之一，現在正做奧賓和尼基次所擔任的位置。我等候了數小時，才准進去見那威嚴的部長。

我簡單地告訴他在尼古泊爾的因亂，現在何半已告一段落了。「黨和人民，正在清除敵人，」他嚴重地說，「這是無可避免的。」部長生拉硬扯叫我爲尼古泊爾聯合工廠的總工程師，但我向他說明，這不能盡我所長。然後他說他將這問題交給制管委員會去解決。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我受了泰根洛格的安得烈伊夫冶金工廠的新任命。

我回到尼古泊爾，辦理移轉黨籍至泰根洛格。「所以你逃去了」，杜洛甘譏諷着，「但仍不要得意呀

一八 自由的與奴隸式的勞工

羅斯托夫省泰根洛格城位於亞速海畔，乃一整潔而閑暇的城市。安特烈伊夫工廠，專製鐵路車輪，鋼片，鋼管，及其他鋼製品。鋼管部份是我的責任。我派在一所舒適的公寓內住下。

清黨運動的最高潮是過去了。新書記名特文斯基，新董事名西密恩拉司尼柯夫，指揮我們的廠。

杜洛甘早將我的全部「材料」，移送此間。我到了兩星期，還很少時間去分析和組織我的工作，但我已被傳至泰根洛格的祕密警察總部，加以詢問。他使我懂得此地和尼古泊爾相同，每個工程師和經理都給間諜包圍着。

不久，我又奉召到莫斯科鋼管委員會去。主任梅格洛夫對我表示敬意，要我到烏拉爾的諾伏——屈羅白尼新鋼管工廠中去。廠在發伏拉爾斯克地方，頗有惡名，建築在荒涼的地區，產量少而且劣。「我們知道廠中混亂不堪，所以我們將給你最高的薪俸，每改善百分之一，即有一筆紅利，一輛汽車，以及任何你所要的東西，」他說。「我仍請在泰根洛格工作。」——我很抱歉。這是經中央委員會通過的，」他說。我承受了整個冶金工業界所認為最頭痛的廠，而那時候莫斯科的空氣，也足以加深我的悲觀。第三次最動人聽聞的流血清黨審判，正要進行，被告連布加林，列可夫，克拉司丁斯基，及其他和列甯有密切聯繫的人都在內。

史達林設立了一委員會，去寫一篇新共產黨史，改編歷史，曲解事實。在圖書館內，凡與此次審判相抵觸的任何書籍與論文，都取銷了，代之者爲官方實錄。謊言克服了一切。

在大車站上，我遇見了廠中來迎的職員。他告訴我廠內目前混亂的情形，大約有工人六千連家族共一萬七八千人，過着簡陋的生活，都是不會逃亡的人，及強迫勞役的隊伍。在路傍我見到有集中營的鉄絲網籬笆。那集中營全造在荒涼的森林中，作六邊形，每角都有瞭望臺，裝着探照燈和機關鎗。

新董事，奧賽契，早已先到，滿臉憂鬱之色。機械部是笑話，電流名不符實，倉庫還沒有完成，一切都在露天堆放着。調查工人宿舍，更使人失望，潮濕污穢，惡劣不堪。

我的公寓四間，有浴室，廚房及傢具。中年農婦杜尼亞，爲我烹調，灑掃。此外備有轎車，小福特汽車，及良馬。基薪按月一千五百個盧布，加上紅利，獎勵金，可達三千個盧布，而普通工人每月約賺一百五十個盧布，技工二百五十個盧布，有資格的工程師也不過六百個盧布。

我工作不到兩個星期，簿記員已將半月工資送來。在賬單上，我注意到一可怪的項目，「付秘密警察部」的一筆鉅款。「還是爲了什麼用途？」我莫明其妙的問着。「那是根據勞工契約，爲了派在你一部份工作的一百六十個刑事勞工而付的。他們工資的半數須送到秘密警察部中去。」「他們是從集中營來的嗎？」「不，不，那是秘密警察的另一部份。有契約的勞工是住在遣兒的，與自由工人一樣。他們是爲了各種罪狀，放逐到此地來的。」以後別部董事們告訴我，他們都有那強迫勞役的分隊，非常可憐。

我們開始從榛莽中，闢出蹊徑來，把電氣鑄爐拭清潔，成立了一量熱工場，鑄鋸部份是臨時湊合起來的，又添備了必不可少的爐灶，起重機，和工作盛。此外又派男女工去做清潔，擦洗，掃除和油漆工作，兩個月內，頓改舊觀，將生產率提高至百分之五十，而氣管內的劣質，也減至百分之五或六。

清黨的恐怖，還沒有結束。廠內的特別部，由科爾平 and 史多芬兩同志為首，做秘密警察的耳目。區委員會，莫斯科中央委員會，莫斯科鋼管委員會，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及其他機關都派人來監視進行，盜匪恫嚇。波伏喬爾斯克城內另有一個冶金工廠董事，賽米恩馬格立洛夫，曾因此自殺，留下了一封很長的絕命書。

但莫斯科承認諾伏——屈羅白尼工廠的進步，稱揚我的工作。波伏拉爾斯克秘密警察首領，柏興同志，特來拜訪，竭意恭維我促進生產的「奇蹟」。「今晚請你賞光一次，」他說，「約會在早上兩點鐘。」「你要我做些什麼事情？」我問。「我們捉到了一個人民公敵，」他說，「今天晚上，我們賞你的面去審問他，使他無從欺騙。」

兩個警衛帶了一個犯人進來，穿着破衣，看上去像是死人。「為什麼你在電氣銻爐上面蓋造木頂，那是很容易着火的？」柏興同志問。「奧賢和尼基次部長傳下來的政府命令，改用木料，因為這時的鐵極為缺乏，」這犯人說。「你的意見？」警察首領轉向我說。「不錯，尼古泊爾工廠也是為了同樣理由，改用木頂。」秘密警察覺得有些失望。「第二個問題，」他又轉向這犯人，「為什麼你造一個大煙管工廠，而並沒有流電，量熱，和機械部份，又沒有修理的設備？」「國家計劃委員會和人民委員部，都沒有預先籌措補助分廠的金錢，原料，和設備，」這犯人回答說，「便命令開工，那是我認為非常不當的。後來我就被捕了。」「對於那件事，你以為如何？」警察首領問我。「對的，這廠動工太早。」審訊進行了幾小時，這犯人暈倒了。

臨行時，我去參觀獄室，二十多人關在一起，大多帶着傷痕。室內僅有的傢具是連着鐵蓋的一桶清水，另外有一只桶，是供大小便用的。粗糙的木板作為床鋪，可怖已極。

兩天以後，特別部送給我那夜在秘密警察部作證的文稿，要我簽字。我照後毛髮都倒豎起來。我所說的都硬給曲解做相反的意義。我逐一改正。「還是不准的，」來人大驚說。「一切有我負責，」我回答說。

少年工程師柏諾夫，我的衣班，面色蒼白，衣服破舊不堪。一經探問，我才知道他每月所得的五百五十個盧布，除去應扣除的稅款，公債，和會費，祇剩四百個盧布，要用以贖養妻女和母親。「我要懇求你援助我脫離這地獄。我有幾個親戚在軍隊裏面，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工程方面的位置，」他懇求我說。「但你爲什麼對於此地這樣不滿？」我問他。「我要拯救我的家庭。」他解纜給我聽。我幫助他解除了廠內職務。後來我從報上知道，他在戰事中，成就卓越，照在烏拉爾的情形，他可能變成一個貧苦潦倒的人。

有一次有一特別委員前來訪我，因國防工業要定製絕對精密的鋼管，其他輕官廠都拒絕接受這種定貨。我召集首長會議，大家都以爲不妨藉手進行，但失敗的機會，無疑地是很大的。我因聲明結果不能担保，然後接受定貨。假使如期完成，便有二萬個盧布的紅利，所以大家一心一意地努力工作，在十五天內竟完成了。然而特別部和國防調查員每天都尾隨着我們，偵察有無怠工事實。紅利的優厚，賀電的紛多，也不能移去我們心上的陰影。不適廠的名譽，進步甚速，產額仍在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而莫斯科則靜囑安達到百分之一百。

至於犯人，集中營，和強迫勞役的殖民地，在這兒真是太普遍了，太接近了。有一次，我旅行寬日，走近一片荒涼的沼澤。那裏約有三百個囚犯，大都是女的，正在工作，鴉衣百結，鳩首鵠面，都站在深幾及膝的泥漿裏面，看了使我心驚肉跳。

大部份在附近四週的工廠，礦場，和建築計劃內做工的囚犯，不論任何天氣，總得走六七英里的路，往返工作。換句話說，除了每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時以外，他們須再走三小時，很多連鞋子都沒有，赤足奔

走。

一九 當歷史在重編的時候

一隊從莫斯科來的活躍份子，奉令在我們廠中推進斯坦哈諾夫標準。昨天我們剛因為達到百分之八十五而受到稱頌——現在外界的壓力，強迫我們要做到百分之一百。「我們努力些，」奧賽契嘆着氣，「我的頭顱，連你的要孤注一擲了。」「但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回答說，「口才是不能替代工具和金屬的啊。」

奧賽契已熟識下一條妙計。他命我預備一張堆積在倉庫內已製成的鋼管清單，裏面有上年並未定出的存貨。後來我纔發覺他與古齊夫尼柯夫，鋼管委員會主任，獲得一種秘密諒解，來了一大批定單。真是巧合，定單上所需要的種類和數量，恰恰與我們存在倉庫內的管子相合，祇須包裝，即可當作現在的生產品。這是一種無恥詭計，但奧賽契，市委員會，區委員會，都很喜悅，假裝並未覺察此中虛偽。

那偉大的六月份開始了，每日總產額已能符合「斯坦哈諾夫水準」，莫斯科來的電報都在鼓勵我。但這完全是欺人的，工頭和工人們當然不會給他們瞞過。

我決計拒絕加入他們的圈子，寫了一篇揭露詐欺的詳細報告，送呈卡茹拿維契部長，鋼管委員會的古齊夫尼柯夫，奧賽契，和杜夫本古同志，撥伏拉爾斯克市委員會的書記。奧賽契和杜夫本古是恐慌了，立刻打電報給莫斯科，確定了上面有人抱腰，就傳我到市委員會去。「你瘋了嗎？」杜夫本古怒吼着。「我們用的是極宜之計呀！」我拒絕撤回我的報告。

一月告終，我接到一通莫斯科打來的電報：「謹賀你的偉大勝利」。我計算這個月內的實際產額，除了鋼管存貨數字為百分之八十七外，比平常也好得有限。我便起草，報告這件詐欺案，擬送到卡加拿維契處去。

在這時，廠內舉行全體大會，慶祝這一次的成就。杜夫木古要我演說。我站了出來，沒有提起六月份的生產，相反地我說到那前途的種種困難，以為堅定而有組織的努力，是必要的。我感覺至少有幾個聽衆能了解我的意思。

幾星期後，我到莫斯科去。古齊夫尼柯夫很憎嫌我，「我勸告你，不要將這件事聲張出去，否則你會蒙受不利。」我然後去拜訪工業化日報的編輯，把事實臚列在他面前，他裝作憤慨非凡。我寫了一篇稿子寄給他，又寄一份給真理報。這兩家報紙，以後並無消息。關於紅利，工人因論件計工，一無所得。但管理人員都得到豐厚的獎金。

大清黨運動，雖近尾聲，而恐怖行動並未停止。奴役人數，私下估計，不下一千五百餘萬，到後來幾年，竟達二千萬。在人民委員會中，祇有莫洛托夫尚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百三十八人，無恙者約祇二十人，中央執行委員會，七百五十七人，存者不過幾十個人了。論有目標的暴行，以成吉思汗與史達林比，成吉思汗還不過是一個業餘研究者。約瑟夫·史達林為唯一的領袖，列甯的親信，一切書籍，論文，公牘，博物院中材料，凡與此相矛盾的，都不翼而飛了！任何謊言，祇要竭力地傳播，就會變做事實，史達林在希特勒發現這條原理以前，早已知道。對於那偽造的歷史，每句謊話都是我曾經身歷的心痛的經驗。

另一大清黨結果，也值得提起。每個黨員都須帶着一紙黨證，這是他個人的護照，一張政治的特許證

。這本小冊子，除了個人履歷外，上面由發給黨證的本地黨部職員簽字，可是大多數已成爲人民公敵，所以一律換發新證，新黨證也不像原來的那樣簡單，須附照片。還有，每個黨員都編有一本特殊的小冊子，有副本兩份藏着詳略履歷，乃是行勳和懲獎的紀錄，一本存市委員會，另一本存莫斯科中央委員會。此外又實行一種新規則，以後黨員離開一個區域而到別的區域去——即便有上級的命令——也必須先經市委員會的核准。

有一天，杜夫本古書記告訴我，黨部中央委員會業已選定古士明同志爲潑伏拉爾斯克地區的最高蘇維埃候選人，由我正式推薦。「但爲什麼要古士明？」我問，「他並未住在此地，此地也沒有人認識他。」我的抗議給他們輕輕撤開了，教我去準備提名演說。幾天之後，選舉人大會就舉行了。我宣讀了我的演辭。在我們離開時，古士明握住了我的手，說：「謝謝你，當你到莫斯科的時候，可以來見我。我願意幫助你。」不多幾時，我會到莫斯科去過，所辦事情，古士明如願予以助力，必有效束。「有什麼事情嗎，同志？」他厭煩地說，「你是從那兒來的？」我恍然大悟，原來他早已忘掉了他的推薦人了。這是在「全世界最民主的憲法」之下，唯一政黨和候選人的選舉活劇。

我很少談起我的私人生活。有時我也渴望有個家庭，但一想到對於每個丈夫和父親，這捕這件事，將如何可怖，我也就丟了這念頭。卡爾帕夫斯基一家，我們的總工程師，他的美麗妻子及七歲女兒，足以引起我對於正常家庭生活的想慕。他爲了公事上莫斯科去，託我代爲照料他的家庭。他回來的前一天，我會邀奧賽契黃事便道過訪。他很胆怯，不敢向卡爾帕夫斯基夫人及那小女孩子招呼，借了別種藉口，請我到陽台上去，用很低而緊張的聲音對我說，「你可一個字都不能洩露，科爾平 and 祕密警察，明天要來逮捕卡爾帕夫斯基。」「爲了什麼？」「我也不知道。」停了幾分鐘，奧賽契託辭離開了我們。

第二天，當火車駛進了月台，母女二人正在等着。卡爾帕夫斯基攜了兩只手提箱，走下車子來。三個秘密警察，拿着手鎗，走進他們中間，他已被逮捕。那件事發生後，沒有人敢和卡爾帕夫斯基的妻女往來。

勞工的變動率高得驚人。在我的工場中，總數約一千七百人，每月常有兩三百人，不別而行。祇有對於生活狀況實際改善，才能解決這問題。但我們新主人的補救方法是命令工人備一本「勞工手冊」。這是一種桎梏。普通工人的勞工手冊即等於共產黨員的黨證，不能擅離職務。手冊上紀錄着各種過失，不能希望在別的城市中，另起爐灶。在新勞工手冊頒發時，工人們全表示忿恨。

政府又採取另一步驟，命令全國改訂勞動標準。那就是說，實際上減低了他們的工資。最後來了一道嚴厲佈告，規定任何人上工遲到二十分鐘以上的，要判決監禁或強迫勞役，祇有嚴重病症，經廠內醫生正式證明；或家內有人死亡，方算無罪，貧睡或交通上的困難，不能引為藉口。最初三個月內，全國差不多有百萬工人和職員因超過二十分鐘的限度而被捕，大多數定了罪，父母給拖出了家庭，任憑他們的嬰孩餓死，或送到孤兒院中去。

一年老的車床工人跑來見我。「我患着劇烈的牙痛，清晨時候，我睡着了，沒有能趕上時間！」「我相信你，但我如消了你的名字，我自己也要到監獄中去，」我說。老人是給送到法庭上去了。一女工呼天搶地哭着。她遲到了一小時，接到法庭的傳票，她是個寡婦，撫養着兩個孩子。大女兒病得很重，因此上工遲了。但那母親仍判決，照強迫勞役辦法，在廠內工作。另一案子，工人抗辯着他沒有鐘，所以習慣着見日光才起身的。那天早晨，晦暗多雲，使他遲到了。這種解釋並無效力。

二〇 西伯利亞的詭計

「鐵類冶金人民委員部特派V. A. 克拉夫青科同志爲西伯利亞史達林斯克城冶金工廠董事，」莫斯科工業化日報於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宣佈說。這是一種偉大新企業，計劃每年要生產鋼管十七萬噸。我的名字由莫洛托夫特地提出，史達林也重視，使我堅價十倍，躋於經濟政治特殊階級的上層社會中。一直躲避着我的友好，急急地來慶幸我的成功。父親却仍警告着我，不要爲名義和榮譽所籠絡。

我的新地位，並不能使我免去祕密警察照例的關切。我仍保持獨身主義，用心去對付那批所謂「劉別恩加女人」，高尚旅館內的寄生蟲。「劉別恩加」乃是首都祕密警察總部。她們都是女性人體美的鑒別家所挑選出來的，專事誘惑外交家，工程師，新聞記者及孤獨的官僚。舉個例子，有一晚上，電話鈴響了。「披奧脫爾·伊凡諾維契，」一個女人的聲音訴說着，「爲什麼你這樣長久沒有來望我了，我爲了你而覺得很寂寞呢，親愛的。」「我不是你的拍底亞。」「我會過來應個明白。」不久來了一個金髮女郎甜密地笑着。「披奧脫爾·伊凡諾維契在麼？」「請你不要來聒噪我。」「爲什麼這樣的粗暴，我愛？對於漂亮女人談話，應當文雅些。」「我很忙，對不起，」我堅決地關着門說，「你的技術不大高明，還得多多學習。」

我回家省親，走入頭等車廂，在最舒適的條件下旅行着。但火車另一端的「平民」車，滿裝着普通百姓，我能窺察出他們的怨色和恨意。車外到處都是流浪兒童。

到了車站，哥哥康司坦丁和嫂子都在接我。離家一年，我還沒有見過這位新嫂子。我和他們倆都擁抱

接吻。「維底亞。你真像一個標準的小史達林，」康司坦丁笑着。「你第一件事情就攻擊他，」嫂子說。我們大家都笑了。

忠誠的康司坦丁會拒絕入黨。後來當德人攻擊時，他是第一批出發到前線中的一個，犧牲了生命。我在莫斯科得到了這消息，我就確定他並不是爲史達林及其政體而喪身，乃是爲了人民和祖國。

父親和母親是顯著地蒼老了。因有三個兒子在經濟上能援助他們，生活要比鄰居好得多。然而度日仍是艱難，即使有了金錢，也買不到老年人所需要的食品。母親似乎是更衰弱了，我十分爲她操心。

日暮時候，弟弟猶僮尼和弟婦一齊來了。嫂嫂是個工程師，弟婦是個教師。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團敘。父親嚴肅地與我討論。他最大的恐懼是，我也許爲權力的誘惑所屈伏，而賣却我原來出身的階級。我們談上好幾小時。我說：「爸爸，史達林的清黨，對他毫無益處，黨內的敵人還多着呢。」

我動身時，母親和我一起。她從沒有到過首都，我指點她那宏麗的城市，心中十分快樂。「維底亞，你爲什麼要帶我到莫斯科來？」母親出人不在意地問我。「這是我的一片誠心呀。」「當然，但……」——她向我瞞着——「或許因爲你要我見一見阿愛麗娜嗎，我知道你已墮入情網了。」「我承認的，媽媽，我絕端愛慕阿愛麗娜。」「你們登記過了嗎？」「不，但都已決定了。阿愛麗娜現有工作，不能離開。我也不要在遙遠的西伯利亞，開始我的家庭生活。」阿愛麗娜長身玉立，乃法蘭西父親和俄羅斯母親所生的女兒。我在人家茶會時，和她遇見，但不像從前與裴麗亞或伊麗娜初次會面時那樣情緒熱烈，不過不久就知道我們的生活會聯繫在一起。

當阿愛麗娜來看我們時，母親很興奮。然而她漸漸又有了心事，有時甚至憂鬱。她以爲太不公平，因爲我們爲了旅館房間，精美膳食與娛樂，化費了好幾百個盧布，而他人則連飯都不能吃飽。

西伯利亞西部的領土，對於國防十分重要，湯姆河邊的一座古城，錫以佳名曰史達林斯克，定為光榮的地區。所以這是含有褒讚意味的，當我主張在担任建築工程以前，先去查勘地址。古齊夫尼柯夫同志，網管委員會的主持者，不禁勃然大怒，將我交給冶金人民委員部長梅格洛夫同志，梅格洛夫說，「我們是不能和黨部的決議開玩笑的！」

我與總工程師吉拉杜夫一起到了史達林斯克，車站狹小污穢，工人的生活設備很少。在這兒開設軋管工廠，非特困難，不便利，簡直是不可能的。已在進行中的各工廠，因缺乏木材。水泥，磚石，燃料而發生阻礙。最嚴重的，那地面是完全不適用於冶金事業，地土支持不住軋管所需要的魏大房屋和笨重機器。計劃必然失敗，担任這種工作，等於自殺。

我上梅格洛夫和古齊夫尼柯夫的報告，有一種雷霆萬鈞的力量，他們都驚惶無措了。從前也會有人提出忠告，為他們所嚇住。現在有點尷尬。最後他們得到一種解決，完全標準蘇維埃式的解決，那是保全官方顏面：隱瞞巨大錯誤。

在基末羅伏，離史達林克約一百六十英里，也位於湯姆河上，另一工業中心區正在發展。他們立刻把基末羅伏放在史達林斯克的前面。我的任命，也改為出發到基末羅伏去。僥倖得很，基末羅伏是完全滿意的。我們發現已有幾所竣工的房屋，一條鐵路軌道，煤氣與電氣輸送管，自來水管，以及其他可以簡化我們工作的設備。

我回到了莫斯科，匆忙地完成了那基末羅夫計劃。大筆款項，已存在銀行內。我就帶了人動身赴任。阿愛麗娜在莫斯科火車站上送我出發。

雖然我受委託辦理一件數百萬國幣的企業，但他們並不容我去選擇辦事人員，其目的在鼓勵職員們互

相監視。我們又受到官僚文章的壓迫，每步手續，須經無數院局的正式決議，需要七份副本的問答，表格，和報告。這是在全無計劃之下辦事，然而却誇爲計劃經濟。官僚往往把每件次要事務，變成主要問題。用幾百個無用的官員，去做無謂的工作，多方阻礙，瘋狂的偵察，告發，與調查，又增加了嚴重性。

基末羅伏恰巧又遭受着比別處還要厲害的消黨恐怖。他們以爲反對黨的領袖，將在基末羅伏設立一個「秘密印刷廠」。城中的主要「叛黨」者公認爲諾爾京同志，審判後沒有幾小時，即被處決。一個秘密的印刷機關確是存在的。我會到過藏匿這機關的地窖內好多次，那兒仍還留着種種痕跡。但印刷機的裝置，傳單的撰著和印刷，都是秘密警察部做的。

二一 當歐洲在作戰的時候

希特勒和史達林所訂的友好條約，使我們都震驚，迷惘，感到不能置信。與日本發生邊疆衝突，因慕尼黑黑協定而引起的戰爭恐慌，還沒有完全消滅。我們都提防着兩面的威脅。我們久已假定納粹祇有一個真正的敵人，蘇維埃政體。

對於納粹主義的憎惡，已年復一年地灌輸在我們的心坎中。希特勒的罪惡，也像史達林的美德一般，成爲神聖信條。在打靶室內，目標常是那舉着卍字旗幟的褐衫納粹剪像。一張陳舊的反納粹影片，「麥妮克教授」，仍在基末羅伏大街上的影戲院內映演。

直等到我們看見了新聞片上的史達林，正和馮·里賓特洛甫握手，我們方始信了。史達林以熱烈的言語歡迎他的「迪克推多」同伴。納粹軍事上的光榮展覽會，正在舉行。在莫斯科的旅館內，可以見到幾百個

德國軍人和商務官員，很忙碌地將蘇維埃的經濟援助，給予希特勒所領導的抵抗「落伍民主國家」的十字軍。人們須信任任何上級機關所指示的愚蠢政策。經過了二十二年獨裁制下的生活，純正的輿論，已夢想不到了。我們所知道的，祇是我們已超然地脫離了流血戰爭，還得到了一些戰利品——半個波蘭，比薩拉比亞，後來波羅的海的三小國——好像是中立的報酬。我們祇有少數人能預知蘇聯最後也會牽入漩渦。

我們的領袖，稱這種結合為「布爾希維克的現實主義」。在我們的政治會議中，中央派來的發言人，解釋那新局勢，似乎覺得有點勉強和局促不安。在蘇聯十一月底侵入芬蘭以後，即腦筋最簡單的工人，也不相信這種神話，說那弱小的芬蘭，並沒有受到威脅，竟敢攻擊他的龐大的鄰居？

史達林和希特勒訂立協定的時候，是具有誠意的。克來姆林宮如果存心，無論如何我們終須和德國作戰，那末我們反法西斯的宣傳，是不會完全放棄的。有種理論，說史達林祇是「利用時間」。這是後來纔想到的，正所以掩飾克來姆林宮信任德國的悲哀錯誤。這是一種顯著的謊言，因為簡單的事實，是蘇維埃政體並沒有利用時間去有效地整頓自己的武裝。

四千七百萬盧布，已指定用於基末維伏一九四〇年的工作。一九三九年末，籌備完成，着手建築主要工廠，招集必需的工人，因此我第一次與大規模奴役交易，直接發生了關係。秘密警察部，允許先供給犯人二千名，商洽時會有過許多爭論，不知者也許以為我們所談的是驟馮，而不是男女。第一次會議時，我混身顫抖，面色泛白，祇管旁聽，不大開口。秘密警察說明罪犯並不缺乏，困難乃在什麼地方安插。於是我們先去視察當地一個最大的營房。

這所集中營位置在高原之上，正方形，四週籬笆，頂上都裝鐵絲網，四角設着瞭望臺。到了辦公室，我們遇見集中營的主任，他不但誠懇，而且竭力奉承。

向窗外望去，我瞧見約有女犯十五人，頭上戴了麻袋，身上裹着奇異的服裝，以抵禦寒氣。「那邊三個老翁是什麼人？」我問。「兩個教士和一個教師。他們太衰老了，所以做些雜役餬口。」

這所集中營已太擠了，典獄長還想再容納一千人。有幾個宿舍，他解釋着，已做了兩種用途，一班監犯，當另外一班出去工作時。添造第三層「床位」，也是個可能的解決方法。他請我們去參觀宿舍。女宿舍內，老少都有，濃烈的汗臭，使我幾欲作嘔。極微的日光從污穢的木柵中透露進來。有許多女人，衣衫都不完全，趕快拿布去遮蓋胸部，但大多數人，不無理會。她們最後一點天賦的禮貌，現在已消失殆盡了。這兒沒有傢具，沒有桌凳，物件都被沒收，祇剩獄內所供給銅製的杯碗和木匙。

男人的宿舍，與女人的一式無二，大部分是俄羅斯人，也有烏克蘭人，韃靼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波蘭人，以及少數中國人。他們都是鬚髮不修，瘦瘠得難以形容，看上去也許是工程師，教授，文學鉅子，或被污曠的黨部領袖。徒刑期限實在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極少數能得到釋放。刑期滿後，他們仍不能自由，除非奉到莫斯科秘密警察部的特別命令。犯人們的麵包配給，是每天三百至五百格蘭姆，營養不足的病是習見的，往往成羣的死去。

我突然得到莫斯科的召喚。古齊夫尼柯夫的態度異常嚴肅，他說，「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議決，對於基末羅伏的製管計劃，目前暫時停止工作。」我瞠目而視，不知所措。「投資已好幾百萬，」我繼續說，「到底爲了什麼原因？」「最好不要多管閑事。」「我們應否使黨部知道，對於這種決議的反響嗎？」「我建議不必多言。」

我回至基末羅伏，發現城內父老羣相驚駭。市委員會和區委員會，都繕就了上莫斯科的正式報告，請求將這決議重加致慮。我除支持他們的聲請外，簡直沒有別的方法。回到莫斯科，我才知道古齊夫尼柯夫

是惱怒了，因為我不聽他的勸告。他的助手，古魯伐耐科，我會爲了幾件工程問題和他意見相左的，好對我懷有敵意。他們計劃着對我提出控訴，設法使我陷入訟累。他們沒有能夠將我送入監獄中去，最後我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捕票，但使我提心吊膽了好幾個月。

雖等候着新的任命，我的薪水仍由鋼管委員會支給。每夜我帶了阿愛麗娜上劇院，欣賞音樂，歌劇和舞蹈。一九四〇年最初幾月內，莫斯科是歐洲少數都城中的一個，沒有因戰爭而實施燈火管制。戰爭消息祇限於新聞紙上幾行小字，似乎真不相干。店舖中突然地充滿了陌生的外國貨，都是紅軍從邊境區域擄來的。

鋼管委員會正考慮給我一個適當位置。我很想留在莫斯科，末了安插在腓力冶金工廠內，就在首都郊區。位置比我以前所做過的要低二級，但我也滿意了。

這是革命以前的工廠，剛經擴充和革新，雇用工人一千名，出品是鋼帶與鋼管。做了副總工程師，我負着實際生產的責任。董事是曼安洛夫，不學無術，喜歡胡鬧。伊古洛夫，廠內黨部書記兼特別部主任，與秘密警察經濟部有關係。工會組主任，柏柏希維里，是個陰謀家。

新部長，史達林的朋友，德伏西恩，准予發給優厚紅利，所以我的薪水和紅利，竟超過四千五百個盧布。阿愛麗娜文學譯述的工作也可以淨獲一千個盧布。雖然有錢，我們的「公寓」，祇佔着兩間小室。後來纔發現，公寓內也有秘密警察，是個我們不會疑心的人，即一商人的寡妻，名字叫薛莉娜。她聽聽我們電話中的對白，經常做着報告。

除一時期在紅軍中服務外，我住在這地方約三年以上。還是我所能得到最近似於穩定的家庭生活。我的工作，和阿愛麗娜的不同。我不大和阿愛麗娜談起我的工作，更絕對不講起我的政治思想和懷疑，雖然

她是個聰慧而抱着熱烈同情的女子。在極權政體之下，一個人怎能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呢？

六月中，我到接銅管委員會來函，命我解釋在基末羅伏時，我的助理員所支付的幾筆款項。這純粹是一種報復，古魯伐耐科等早就佈置的，已如前述。照蘇維埃法律，有幾種負責工人，當派至本國遠方去擔任職務時，得享受額外報酬，包括旅費等等。這種報酬，是根據契約而來的，而我廠中所支給的報酬，並沒有這種契約。我個人既未雇用這批人員，也沒有核准該項支出。然因為是首腦，在技術上負失察的責任，被控為非法動支公帑，一種能處三年徒刑的罪行。這件事似乎不會擴大。但突然我得到一紙通知，鐵斯冷金人民委員部，用部長伊文·德伏西恩的名義，在人民法院內對我正式起訴，總書記員馬脫維伊夫是共同被告，而實際支付的人，却不在被告之列。

這件事表面上似乎無甚價值，不過控告究竟是從部長來的，又是史達林的胞友，人人勸我服罪。但我怎能對於我所不知道的罪狀認罪呢？我真不會相信審訊這種案子，不由法院長官而由秘密警察來辦理。我到國防律師公會去聘請一位辯護人，在我國是沒有真正私人執行職務的。你和鄰近的公會商洽，接受指定派給你的律師，付給公會以規定的費用。指定派給我的律師不能十分鼓起我的勇氣。當他聽到控告是由德伏西恩提出的，他的表情就從焦慮而變成失望。

法官出庭了，我們都立起來。檢察官發動對我的攻擊。我覺得他無論如何以為這是我的過失，因他每月只用六百盧布去維持一個家庭，而我可賺到這應許多盧布。「但那和控告有什麼關係呢？」我再也不能遏制我自己了，「我是依法支薪的。」「請被告不要插嘴！」法官發出警告。我的辯護律師，不過敷衍形式，沒有辯護我的罪狀。法官們走出去約十分鐘，帶回一份判決書：兩年監禁，七天內有權上訴。

上訴已在適當時間內提請。一九四一年早春，法庭上將這案子詳細考慮，判決減為「在我目前任職地

點，強迫勞役一年」。這是一種奇特的蘇維埃司法上的新發明。定罪的公民，仍能自由生活與工作——但其所賺得的百分之十或二十，應充公送給祕密警察部。

後來我向最高法院上訴。等到將次審理時，戰事已經爆發，莫斯科在納粹攻擊之下，法院已撤退到烏拉爾省去了。阿愛麗娜仍繼續為我進行。一九四二年，最高法院重行檢討，才撤銷了低級法院的判決，案情因而平反。

二二 意想不到的戰爭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早晨，蘇維埃的城市和飛機場都遭轟炸，蘇維埃的陸軍，在前綫已因納粹機械化師團的進展而狼狽退却。報紙上揭載着德國突攻蘇俄的新聞。那天清早日出以前，祕密警察在各處開始掃蕩「不良份子」。但我們一些沒有知道災禍臨頭。昨天的戰報，剛得意地報導着希特勒軍隊的戰績，他的敵人「資本主義的走狗」和「財閥政治的好戰者」的收北。正月間，華盛頓國務院警告我們的大使，說希特勒已準備好對俄的攻擊，英國方面也同樣報告。他們都被認為資本主義的詭計，故意破壞希特勒史達林協定，不加理會。史達林及其僚屬，似乎給他們自己的宣傳所麻醉了。

莫洛托夫訥訥然的沉痛演說，恍如晴天霹靂。他說德國的元首，狡猾而欺詐，卑鄙而愚笨，施用他所熟習的閃電戰來攻擊吾們，而吾們差不多二年來一直將自己所急需的食品，燃料，金屬，油類，和軍火，幫助他去征服歐洲。

工人們為這消息嚇呆了，他們說，「這許多年來，我們一直過着艱苦的生活，戰爭，革命，破壞，五

年計劃，和清黨——現在我們又回到戰爭了！我們幾時纔能開始過着與他人一般的生活呢？」

那天下午，我得到報告，值理督理員，司馬里愛尼諾夫被捕了！

他是戰爭中犧牲者之一。以後幾天，有幾十個人失蹤。「內部敵人」的清算，工作迅速。幾年以後，在美國我聽到了一種驚人的謬論，即「俄國沒有第五縱隊」，因為清黨已將這匪「叛逆」巧妙地毀滅了。前駐蘇美國大使約瑟夫·台維司所著的一本書，一知半解，完全不知道史達林的政策和政體的性質。我祇能對莫斯科宣傳的成功，表示驚異。我們並沒有親德或含有叛國意識的第五縱隊。但我們確有幾百萬愛國志士，忿怒着史達林的罪惡。

戰事爆發以後幾天，「軍事法庭」在莫斯科設立了，分處遍設於郊區。在獄中或勞働營內多年的男女，鎗決的很多，他們都是左派中較爲著名的政治犯——社會主義黨，布加林的黨徒，社會革命黨，無政府黨，以及過去的共產黨員，克米姆林宮中最畏懼的人。

戰事發生的第一天晚上，收音機是開着：「蘇聯的公民聽着！這是德國陸軍的大本營！」我們互相慶祝，「二十四年來，你們一直生活在饑餓與恐懼的中間。你們所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奴隸制度。你們所得到的不是麵包，而是鐵鏈。你們的主人史達林。你們受人驅策，還不及古代的奴隸。你們的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怎樣了？打倒你們的暴君！」第二天，收音機都給警察拿去了。這是新聞管制的第一步。郵政的檢査，並不限於往返前綫的信札，而遍及於普通平民的函件。我們所誇張的龐大紅軍怎樣了？戰爭愈來愈近，向首都蔓延着，全國爲之震驚。

「希特勒的軍隊，」史達林說，「業已佔領沙尼亞，白俄羅斯的大部，及西烏克蘭的一部。我們要從歐美人，獲得忠實的盟友：」我們第一次聽到史達林自己說，布爾希維克政體，突然地和「落伍的民

主」發生了聯繫。

我們不能了解戰敗的理由。二十年來我們因軍事準備而受到饑餓，痛苦，和驅策。現在陸軍遭着可恥的潰敗，據說由于缺乏大炮，飛機，和軍火。三次連續的五年計劃。每次都會「順利的」完成了。然而我們却正用汽油瓶去阻止坦克衝鋒師團。祇因廣袤的幅員，無窮的人力，民衆的英勇和犧牲，從容撤退，集合反攻的資源，纔使我國免於滅亡。

動員是在非常匆忙和混亂中進行。在最初幾個月內，軍官們就穿了臨時衣服，並無適當訓練，而送到前線去送死。幾百萬新兵著上帆布鞋在泥濘中跋涉，已是初冬了，他們還穿着夏季的制服。我見到許多新兵，都用掃帚柄極充步鎗，受着操練。

衝突剛開始，黨部已發起組織人民義勇軍。伊古洛夫命我召集會議，做羣衆的表率，我第一人登記爲義勇軍。廠內工人職員也跟着投効，但沒有一個最上層的管理員自願加入。我去見曼妥洛夫，問他什麼時候去簽字，他面色變了。伊古洛夫也沒有去。戰爭結果時，他們倒得到了榮譽勳章。我雖登記，但給地方委員會的命令取消了，高級人員，一概不准離職。

共產黨宣傳中最下流的，即說史達林會利用和平，着手準備。在戰事爆發後一星期內，莫斯科已沒有麵包。首都竟還沒有完善的防空壕，西部南部沒有一個重要軍工廠撤退，或準備撤退。幾百萬噸的原料，軍備，穀類，燃料，很快的陷入德人之手。

史達林好似睡在鼓裏。假使他接受了美國國務院所提出的第一次警告而採取行動，他將有五個月的時間撤退數百萬的百姓，無數的工業設備，和大量儲存的糧食與原料。克來姆林宮浪費寶貴時間，將蘇維埃人民在十五年工業化中，用汗血及眼淚所造成的東西，都留給希特勒做戰利品。

一個新的最高機構，已設立了，用以應付危機，名爲國防委員會。國防委員會乃蘇維埃最富活動力，具有伸縮性的殘暴團體。縱得最後勝利，歷史仍須譴責史達林政體。數百萬人不必要的死亡，以及居民所受不可勝數的困苦，應該歸咎於他。撤退最後是在進行了，用極拙劣的方式，表現得十分顯著。普通人民祇許帶兩隻衣箱，其餘的東西都須放棄，但最優容的「貴族」，甚至可以帶他們的笨重家具。

游擊運動和「焦土」戰術，會給幾個幻想作家，描摹爲自然的現象。事實上史達林會宣布在退却的時候，全不能攜帶貴重財產，必須「無條件加以破壞」，而農夫和城內居民，則抗拒這種政策，十分劇烈，有時竟至以性命相搏。就大體言，焦土工作，並非平民所做，而由軍隊實施。游擊抵抗的參謀部，設在首都。秘密警察的偵探，故意留在放棄給敵人的每個區域中，主要目的在監視在德軍後方的蘇維埃人民的行動，有幾萬蘇維埃男女是被處決了，幾十萬給判處了奴役。

九月十八日，政府下令，凡在十六歲和五十歲之間，尚未被徵的男子，都須受普通軍訓，每人於每天工作完畢後，約有十二小時之多，準時報到。紅眼的疲乏男子，在半飢餓的狀態中，穿了不合式的衣服，用棍棒在操練着。按照任何文明標準，數百萬不適於作戰的人，胡亂地召集，沒有充份準備，就送上火線，便是藐視人類的生命。蘇維埃驚人的死傷損失，實爲克來姆林宮慘無人道的確據。

莫斯科於八月份開始撤退，在戰事爆發祇六星期以後。高級官員都用汽車，火車，和飛機，將他們的家屬財產，一起遣送出去。而我們仍全日工作，整個晚上操練，炸彈和彈片落在我們的四週。

九月初，本地派遣委員會通知我前往受檢。伊古洛夫同曼安洛夫已將我的姓名在「必需人員」名單上劃去。我的體格檢驗，一共祇費了兩分鐘。我被派至布爾希伏的軍事工程專門學校，離莫斯科約二十公里，仍保留着原有上尉職銜，專心攻讀軍事工程學，直接受戰鬥訓練。布爾希伏離開首都很近，阿愛麗娜和

我還沒有感到離別的滋味。

二三 莫斯科的恐慌

在布爾希伏，我被派為黨部組員，在同學軍官中間，為最高的政治委員。

此間實施的訓練，還不及一個三等國家。我們用來建築橋樑，機關鎗彈地，和飛機場的工具，是這樣的簡單，簡直只有斧頭和鋤刀。講師們是與他們的工具一樣地陳舊。講授築路的學位少校，假使他向做築路工程的工頭去叨教，或許可以得益不少。但不管這許多障礙和煩惱，我們仍是專心地與勤奮地攻讀。

至九月底，恐怖與混亂，已至於爆發的頂點。當局對於撤退方面的徇私，使莫斯科的普通人民，怒不可遏。

十月份秘密警察，最高法院，外交人民委員部，黨部總辦事處及其他各機關的煙囪中，日夜噴出黑煙，匆促地毀滅了他們的紀錄，抹去了數十年來的罪行線索。十月十二日晚，我們給警報警覺了。半小時內，有三營半受訓練的少年軍官，向莫斯科西郊出發。四十八小時後，三份之一狼狽地回來了，流血，凍傷，飢餓與疲憊，其餘的永遠沒有回來。從十月十三日起，我們部隊在森林的雪地內，防守這條通至首都的路線，因為德國的傘兵隊也許要在這兒降落。在雪地內的許多日子，同伴大都因此凍傷而發寒熱。十五日晚上，在莫斯科埋下地雷，直到一九四二年夏季纔移去。

十六日早，伐伐京上校派我到莫斯科去；我發現城中傳布着刺激人心的謠言。他們說克萊姆林宮發生政變，史達林已被逮捕了。騷動與抗爭已在開始，政府已不再存在，數百萬莫斯科人早被逮捕，沒有糧食

，燃料，和軍器，祇能聽命運去安排。秩序是崩潰了。我設法在黃昏時候回到布爾希伏。那兒我發現了一批亂哄哄的，口中吶喊着的暴徒。不多一會我找到了伐伐京上校，他正感到毫無辦法。夜半，搶劫者已離去，我們又都蹲在森林的雪地中。

整天的紊亂與騷動，一直延續至十八日。德國人實際上可以兵不血刃地佔領莫斯科。爲什麼他們要退兵，是歷史上的一件神祕之事，祇有德人自己纔能解釋。大概他們對於莫斯科的防禦，估計得太高了，認爲這是我們的詭計，誘他們入險惡的陷阱。

從十九日起情形是改善了。第一批西伯利亞和遠東軍隊陸續到達。

我個人的困苦爲劇烈牙痛，面頰腫脹得很厲害，全身神經，都在抽痛。我們的工程隊開往東部，離開了危險地帶，向整編的中心進行。阿愛麗娜見了我腫脹的面頰，很是關心。平常火車每輛容二十四人，現在裝到五十多人，不得同時坐下，祇能輪班睡覺，這樣旅行了十七天之久。我們不得車上指揮官的許可，絕對不准走出去，許可也絕難得到。這種侮辱人的規則，造成種種痛苦，發產不少怨恨。我們不能了解爲什麼到本國內地去的軍官，要受這樣嚴厲的監視。

我的朋友紐米特夫上尉請求離站片刻，而遭到拒絕。「這不是一輛蘇維埃軍官的專車，簡直是一所監獄了！」他壓住了怒氣喃喃地自語着。我們中間的不良份子——我疑心是一個妒忌我黨政治指導員的共產黨員——一定去報告當局。在下一站我大受政治主任的叱責。「你的車子中發生了反革命的示威運動」，他向我咆哮着。「我並不會覺到有什麼示威運動，」我說。「旁的人都覺得了，你必須摘發這階級敵人」。

第二天同樣情節，又演一次。一年輕中尉再也忍不住了，「這是荒謬極了！」他大聲地喊着。就在下

一站，指揮官懲處罪犯，罰他立於露天月台上，十天之久。怒潮在我們一羣中間洶湧着。從清晨五點鐘直至夜半，犯人立於敞車內，在朔風狂吹之下，一路前進。到第二天，對於這種不人道的辦法，我不能再緘口了。我去勸L同志，請他代為緩頰，才得延期至到達目的地後執行。

我們在第十七天方始到達亞辨利士城，次日清早，我們奉令在六天以內，徒步趕至梅恩斯令斯克報到了。我們很上勁地走着，以保持溫暖。談起這次戰事，大家和我一般地不滿意：「我們參加這次戰爭，是爲了國家，不是爲了史達林。史達林一些不顧到我們的生命——」日暮，我們抵達一個村莊。一農夫和他妻子熱烈地接待我們，送了一大盆燒好的熱水進來。這是三星期中我們第一次洗澡。蔬菜湯，雖沒有肉，在我們長途勞頓的管來，好比甘露一般。但麵包切得很薄很小，這是農家生活艱苦的確實象徵。那晚我們躺在潔淨的床舖中，睡得很是甜蜜。我們竭力要給主人翁一些錢，但他們執意拒絕。他們願意爲作戰的人服務。

第三天薄暮，抵達一個小鎮。我足部起胞，渾身疼痛難禁，病頸像受着鞭笞一樣，一夜沒有合眼。清早我走到區立醫院去。「你患的是骨節組織發炎，」一女醫發表說，「牙內病毒，滲透全身。你應當趕快上梅恩斯令斯克去，進醫院療治。在這兒我是沒有辦法的。」「但你可以拔去這病齒，」我說。「不，我沒有麻醉藥。」我仍懇請她拔去這牙齒，她畢竟做了。我沒有言語能形容這十五分鐘無可比擬的苦楚。第六天到達梅恩斯令斯克，身體似有千鈞之重。在草床上睡了兩天，熱度很高。第三天我給移送至梅恩斯令斯克的軍醫院中去。我的體力恢復得很慢。醫院每天供給病人兩餐，睡在草席上面，蓋着硬冰冰的軍毯。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我奉陸軍醫院事務委員會命令，回到莫斯科，進行醫治。在首都他們並沒有給我指定醫院，每天祇到慈善醫院去門診一次。在阿愛麗娜親切愛護之下，我的症狀大有起色，下顎全愈了，一身如，

釋重負。慈善醫院囑我不必再去，同時建議我應有相當休息，恢復體力。我到委員會聽取以後的訓令。在那裏我照例受到兩分鐘的檢驗，宣佈適宜服役，送上前線。但當我向軍事人民委員會報到時，一道新命令剛纔頒佈，受過高級技術教育的人，為加緊國內工業進行起見，可以免役。

這是莫斯科最淒慘的冬季，正充滿着飢餓，寒凍，和敵人炸彈的痕跡。人人精神頹喪，勞苦已到極點，連失望都說不上。公家的配給，僅足以維持生命。饑餓與凍寒，比之德軍的威脅更大。市民捕殺貓犬及網得的烏鴉作食。折碎家具，拆除木柵，用以生火。死亡率逐日增加。

我向黨部區委員會報到，被任派為潑朗姆屈來斯脫總工程師，總管九家種類不同的工廠托辣斯，其中大部份是供給前線物資的。我所監督的廠中，有幾家製造手榴彈，地雷，和其他軍火。另有幾家專事修繕工程上的設備。我加緊進行，工人都因飢餓而面容消瘦，然每天仍做十至十六小時的辛勞工作。

有一天我在書桌上發現了一封信，請我立刻與某號電話機通話。我打電話過去，報明我自己的姓名。「哦，是的，請你於十二時正到 R. S. F. S. R. 的人民委員會去。一張通行證已給你準備下了。」R. S. F. S. R. 即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簡稱。

我到了這所大廈，出示我的身份證，得到一張派司，由一警衛轉領到走廊內而入應接室，稍待片刻，一女書記准我走入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安得烈·伊凡諾維契。烏脫金同志的大辦公室。他示意我坐下。「很好，克拉夫齊科同志，你的事業怎樣？」我告訴他關於托辣斯的一切生產活動。他問了許多問題，我回答了一大串的說明。「你可喜歡為人民委員會工作？」他問。「那要看工作的性質，」我回答說。「好的，我們需要一工程師，一黨員，主持作戰工程器械部。我想你能勝任愉快。這並不是說今天就要解決這問題，我祇在採取正式初步手續以前，徵求你的同意。」「我完全沒有把握，能否處理這樣一件重要事務，

「我說。「我想你能做得極好。你有必需的經驗，而且我們已注意過你在托辣斯中的工作。」「如果那是你的意見，我當然祇能接受。」「這樣很好，再會了。請你到樓下人事科去報到。」

我填了一大批的表格。沒有幾天，我就奉命去見烏脫金的上司，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左右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庫斯坦丁·配姆菲洛夫。我又回答了許多問題。經過祕密警察部的同意，黨部中央委員會的承認，我即在與烏脫金為鄰的一間辦公室內就職。我是政府的一員了，我有特別金字紅色手冊——一本具有特別能力的小冊子，權威的象徵。

這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之末，剛巧德國的新攻勢開始向史達林格勒疾進的時候。

二四 戰時的克來姆林宮

在人民委員會中，我已近於權威的頂巔了。烏脫金部下，設有五科，內中一科就由我主持。這樣我比最高長官祇差二級。我一科內又允許多專門職司，由我的助理員指導。我因他人一時的高興而受其提拔，在我之上者，稍一不滿，我祇有辭職，而他們呢，也常為其上司毫無警告地推落深淵。在獨裁政體下，有無限的威權，也有無窮的恐懼。

在人民委員會內，我們占一層樓面，由祕密警察警衛。應接室外面，因防他人窺聽，特地加上兩道門。我們精美的晨晚兩餐，一律免費，還有特設餐室，可以隨意進食，價格特別低廉。全部特權中最寶貴的，是一本紅色小冊子，那使我能上克來姆林醫院診治，買到藥物，在一個醫藥不是大眾所能講教的時期中。我們甚至有特備的廁所，不准外人使用，有警衛監守。

外人見我，須寫通行證，蓋上我的私章，在發出以前，警門的還須打電話給我，作第二次的證實，我須用一個祇有秘密警察和我自己所知道的暗號證明是我。我的暗號是「勒那十七號」。取得了通行證，來客須連續經過檢驗四次，證明是否本人。

在克萊姆林宮與我們的機關內，流行着一種「棋盤」制度，目的在阻撓警衛中的叛逆份子。做法是這樣的，相隔若干時間，並不規定，警衛們須如棋盤上的卒子一樣，按照中央控制點的信號所指示的複雜圖案移動。汽車須停在門外，定時炸彈的危險，也就消弭了。還有一只保險箱，祇有我和秘密警察同時享此秘密。連秘密警察也不知用法的，全國又祇有一只，——那就是史達林的。保險箱乃秘密部和特別部從閱我文書的處所。我就職的第一天，一位秘密警察軍官，謙遜和恭敬地解釋來賓訪問規則，告訴我的暗號，說明我桌上許多電話機的奧妙。其中有一只是通政府專用的線路的。每件公文是國家的秘密，不要的須交給秘密警察部去焚燬。

十一點鐘，我的女書記叩門進來，「她問：你要用早餐嗎？」「你吃過了嗎？」我問。「我祇有一杯茶和一塊糖的權利，」她嘆着氣，「我從這裏帶麵包來的。戰爭啊……有什麼辦法呢？……」不多一會，女侍者來了，帶着一盤食物，兩隻雞蛋，幾片蒸肉，白麵包，奶油，一杯熱茶，幾塊方糖，少許餅乾。除掉茶和雞蛋，每樣東西很清楚地都是從美國租借法案中運來的。我留下一只蛋，一些肉，幾片麵包和一块方糖，再也吃不下去了。書記跑了進來，將剩下的食物都堆在盤上，拿了出去。隔了片刻，她從愧地站在桌子邊。「我不大好意思講，」她說，「但你是聰明人，定會了解。我適纔貿然吃了你早餐中所剩下的東西。請你原諒我，……生活是這樣的困難呀。」「那完全是無所謂的。我想遣女侍者……」「但麗莎與我有一種協定，」她插嘴說，「第一天我吃，第二天就換到她了……饑餓是件可怕的事情，比暴風還厲害。」

「所以我始終祇吃牛頓早餐，其餘牛頓，留給麗莎與我的書記。我知道麗莎將她的一份帶回家去給她的兩個小孩子吃，她的丈夫正在前線。」

中午，主持祕密特別科的人員來訪。「這是保護國家祕密的條例，請你細讀。」他交給我一束文件，教導我怎樣去處理國家，黨部，和軍事上的祕密文件；怎樣使我的寫字檯，保險箱，和辦公室，不受到陌生人的窺探。上司每件命令，必須誓而寫明。

我平均每天可以休息五小時。辦公室人員大都從九時工作到五時，我則須從十時或十一時到第二天的清早，難得偷暇回家，偶而冒險在辦公室的長榻上，睡上一二小時，還得將門上鎖，電話機移置耳邊。莫斯科高級官場的辦公時刻表，是很特別的，完全只迎合一人的特殊習慣。史達林經常於每天早上十一點左右開始辦公，一直工作到四五點鐘，從那時起，到晚上十點或十一點，平常都是休息，然後繼續工作到三四點鐘，或再遲些到第二天早上。在這兩節辦公時間中，晚上一節特別重要。首都官場就用這古怪的史達林時鐘，去校準他們的生活。

人民委員會是國防委員會的「統制機構」，實際上我們負全部戰具生產之責，集中於我現在所管轄的一科。我的生活成爲一種慣常的奮鬥，拳覓原料，人工，和燃料，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生產，常受上司的咆哮和咒罵。蘇維埃官僚中所用的污穢辭句，全世界無可比擬，因為我們都是「無產階級」出身。最擅長的是開茄諾維契，罵起人來，口如懸河，滔滔不絕的，都是最下流的言語。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安托烈伊夫及他人，在這藝術上，僅居其次，而史達林自己也並不後人。

有幾個星期，我忙于接洽製造簡單工具，如割鐵絲網用的刀，擷單人壕的鐵鏟，和暫作手電筒用的油燈。有一紅軍將官，哀求我供給那割鐵絲網用的刀。幾千個軍士，他解囊給我錢，都爲鐵絲網所刺傷而被

屠殺，爲了缺乏這種簡單設備。我們徵用了幾千隻學校中所用的簡陋指南針，有限制地分配給前線各處。我們需要軍用野戰指南針五萬隻，但單是磁鋼一物，即已無法供應。爲克羅馬蹄鐵，我們又舉行了許多會議。幾千匹馬，因缺少這件東西而死，影響及於騎兵。假使沒有美國的飛機，摩托運輸船，電話機，及其他上千件我們所缺乏的東西，絡繹輸入，蘇維埃抗戰的命運，結果將不堪問了。

上面發下來的命令，變調情緒是時常緊張的，固定地附帶着嚴厲懲罰的警告。我以前從沒有工作得這樣勤奮。很快地我膚色青白，眼睛充血，帶有些微寒熱。假使我們能加速供給前線一些迫切需要的設備，也許能援救無數的生命。

我在人民委員會時，適逢戰局最爲困難之際。這是一九四二年的酷夏，德人已向伏爾加進攻。遭挽回危機的戰役，使史達林格勒這幾個字，在人類歷史上，永遠與滑鐵盧齊名，但與史達林却無關。我們戰士的年齡，從十六歲起一直至五十六歲，免役虛文，也給取消了。戰士創傷未愈，已趕上前線。正當入學年齡的男女兒童，兒女成羣的母親，和已喪失丈夫的田間農婦，都集合了去做工。在這人力緊縮的危機中，幾百萬囚犯的強迫勞役，當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動力。戰事工業，與德國一樣，須靠奴役制度。最主要的分別，乃在德國所役使的是被征服的外國人民，而克來姆林官所役使的，乃是他自己的人民。在德人佔着優勢而撤退時，撤退奴隸比自由公民，更爲重要。倘無法撤退，即集團處死。我在要緊關頭，爲人力的缺乏，常感失望。解決人力問題，利用拘禁計劃——這個離奇的名稱，至今還使我戰慄。羣工數額的鉅大，在國外無人知道，在國內也保守秘密。幾百萬兒童，違反他們或他們父母的意志，被迫離去其家庭，根據「動員會」的法規，派往實業界去服役。此事在一九四〇年早已開始，戰事終止以後，反而推行愈廣了。假使這種強徵羣工制度繼續下去，那末在一九六〇年，蘇維埃政府可以有三千萬至四千萬受過軍隊化訓練

的工人，供其指揮。此外又有秘密警察部的強迫勞役犯人，約二千萬名。

差不多在戰爭開始時，我就知道作戰物資決不可憐。史達林的一個最有權勢的助手，亞力克山·卡西琴，在克來姆林宮內，召集會議。會議預定在清晨一時舉行，時間尚遠。大家閒坐着講笑話，戲謔，和聊天。開會時，卡西琴表情嚴肅，我們期待着暴風雨的來臨。伏羅皮契夫元帥，依他的紀錄，講着補給品的缺乏。「沒有渡河的汽船，」他說，「所以犧牲了我們數千人的生命。我們沒有預先建造的橋樑，沒有地雷去阻住敵人前進，沒有摩托修理工場，沒有話筒和器械，沒有戰壕內用的簡陋火爐，沒有步兵所用的斧頭和鐵錘，甚至沒有手提電燈，——不要說手電筒了。」「我們竟至不能製造這一點小東西？」卡西琴盛怒地喊着。我恰巧熟悉這問題，得到烏里金的許可，我就站起來發誓。「請你允許我解釋，提燈生產之所以遲緩，是因為我們沒有銅片，沒有軋片機，沒有大小適當和質料恰好的球。」「這燈是必須做的！」卡西琴突然地喊着。正在暴跳時，電話鈴響了，他的面部表情，頃刻改變了：「是的，約瑟夫，這是馬上要舉行的！……是的，我立即採取行動！」原來是他打來的，史達林啊！

我們每個人都發了不少訓令，五十萬件偽裝的軍服，一百萬把鐵錘，十萬隻軍用電話機。我們大家知道所指派的任務，辦到是不可能的，假使能完成百分之七十五，也就不勝欣喜了。

二五 兩種真理

當人民委員會科長，收入不如在實業界所得的多，沒有意外紅利。但在物資缺乏時期，金錢並沒有多大意思，所注意的乃是配給品的數量。我能跑進特別店舖，「不公開的配給商店」。他們在民衆視線之外

。普通人對於租借法案所輸入的奢侈品，從未見過，不要說嘗到味道了。國內水深火熱的情景，正和內戰最壞的時期相同。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冬季，大家燒去了家具，書籍，愛好的樂譜，以及任何可以得到一些暖氣的東西，使他們的孩子不致凍死。清晨常有人打門問：「你還活着嗎？」而阿愛麗娜和我却在家裏裝置了一隻火爐，從人民委員會中得到了若干木柴。我們時常省下一些給我們的鄰居，雖然這是違背定章的。在此時期，莫斯科街中，到處都是餓殍，不足為奇。死的是埋葬了，半死的在他們寒冷的屋子中呻吟着，而活的還得要掙扎。

某次配姆菲洛夫派我坐汽車去調查工廠。工廠經理以為他那裏的機器能改作製造精細鐵絲的用途，但他們難於挨餓，正與他處相同。當我回至辦公室，將改造和利用工廠的詳細計劃，起草好了。配姆菲洛夫正讀我的草案，「好的……好的……好極了，」他點着頭，但突然面上起了一重疑雲，「什麼？工人們每天須有五百格蘭姆的麵包……這一點請你刪去，」他下命令了。我向他懇求注意糧食需要問題，他發怒說：「要做國家大事，人道主義是極不應當取法的。你須從史達林同志學習——愛你的人民，但在必要的時候，犧牲他們。」

另一次我深入莫斯科省內部，去調停兩工廠間的衝突。我起身得很早，聽見一隊男女約有四百人，十人一排，剛在嚴重監視之下，走向秘密工場。這幾年來，我會見過許多不幸的奴隸，但在這兒更其恐怖，都是行屍走肉，中了化學藥品的毒，毫無希望了。當他們經過我這所屋子時，一女人突然暈倒了。秘密警察把她拖了開去，沒有一個囚犯表示驚訝。他們已失去了同情，失去了人類應有的反應。

十二年來，國防一部，克來姆林宮中會浪費他最好的人才，精力，和宣傳文字的，就是航空。然而我們在航空方面顯然是落伍了。根據與辱國的「友誼」條約同訂的經濟協定，堆積如山的鋼鐵銅都已交給

希特勒了。城市中的航空工廠，祇撤退了一部份，其餘的都落在敵手。結果使我們的飛行員有幾次須駕駛用木夾板所製成的飛機，只要幾顆燃燒性的子彈就可以使他們了結。

一九四二年秋，史達林發出一道緊急秘密命令，立即製造鐵在飛機上的一種避火質料。這是松香的混合物。我問一位航空將領，「這真會有什麼用處嗎？」他低聲地說着：「差不多就同請死人吃冰淇淋一般……假使給最新式的德國燃燒子彈打中了，飛機會像羽毛般地起火，」他說。

軍用電話的繞電綫軸子也是常使我頭痛的問題。供給前綫交通工具的責任，集中在沙白洛夫、史達林的助手身上。特殊的指令，由史達林親自簽字。因為沒有金屬片，議決用木料做軸子，不願軍部發言人的劇烈反對。一個月後，有關各部的代表和負責的軍部官吏，逐一報告所得的結果。一位副部長，似乎是很興奮，他發表說，「業已逾額完成了百分之百零五。」我知道這種說法有些歪曲。這種器械的一部份零件，他確會照所需要的，生產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但其他部份，祇有百分之三十可應用。他所自負的聲明，是指平均數說的，代表一種標準官僚式的統計。大家都笑他糊塗，但這並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情。像出席的將軍們所說的，不合用的電話器材，可以犧牲我們數千人的生命，有時竟可使我們潰敗。

因此我去參觀莫斯科郊外的一個木器工場，親自查核，何以軸子不能交貨。我所見到的使我氣得面容失色，約有一百五十個工人，正在製造着富麗的家具。這家具是最高的黨部，政府，和紅軍官員所定購的。我闖進了烏脫金的辦公室，將事實逐一陳明。「這太豈有此理了！」他喊着，「這些家具，是為普羅賓可志，許却貝阿夫，和毛京將軍——」我說。烏脫金的表情立刻改變了，「嗯：確是一個問題。我想我們領袖的舒適也是戰時的先決問題……讓我再加以考慮。」

我們有防毒面具設備的，祇佔少數。甚至在莫斯科也僅每四人備一具，在其餘地區，情形更不對。更

使人驚駭的，沒有幾只面具是有效用的，主要理由是因為沒有橡皮，我們不得不用一種內塗橡皮的帆布，那是不能將我們的面部封得密不透氣的。

但假使我們在防毒面具，軍用電話，及飛機方面，都有困難，我們至少在另一點，却不同了。各級軍職的美術制服圖樣，從元帥下至尉官，已完成了。這些肩章，一度曾被痛斥為沙皇軍國主義的象徵的，現在正謀恢復，還沒有公開宣布，不過已由政治局決定，進行製造。

如東有人列席我們黨部高級人員的星期例會，就不免要大吃一驚。在我們，「從列甫主義方面的退却」，祇是一種臨時的戰略行動。宗教妥洽，是一種羞恥，而又不能避免的讓步。這是推進史達林主義，及獲得最後勝利的一種手段而已。晚上我們舉行週會。俞廷同志，政府出版經理處主任，代表黨部中央委員會宣傳股，用史達林的語氣發言。土耳其與日本，成為俞廷諷刺的一部份。「我們知道，」他吶喊着，「就是松岡——史達林同志加以優待，親至車站送他啓行的日人——也會力勸天皇向俄羅斯作戰，當德人正迫近莫斯科，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前。日本和松岡要受到他們應得的報復，等我們解決了希特勒以後——土耳其，展開瘋狂的反蘇運動，必有一天和他們清算。現在我要講到美國了。在那兒，羅斯福正敷衍着蘇維埃。但我們決不能因與資本主義國家戰時的合作而孕育幻想。我們一定要堅持原則。現在有兩個世界，偶然可能地在他們中間的深淵上面，架起了一條橋樑，如我們在這次戰爭中所做的，但我們知道這條橋樑遲早總要坍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個世界決不能永遠並肩共存，誰將克復誰，仍是將來最主要的問題。我們不要根據了租借法案而造成思想上的錯誤，這僅是一種交易。」俞廷講完了，這些「大人物們」——俞廷，配姆菲洛夫，和其他少數人——一起跑到餐室中去，得到些物質上的享受，很有滋味地大嚼着美國租借法案的奢侈品。

因戰事的必要，在宗教方面，曾作最難堪的讓步。我們雖很少有人重視，但在國外曾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米羅諾夫說：「共產主義青年團比之教士們，是一種較強的力量。我們真會這樣愚蠢，將下一代交給教士們嗎？」

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表面上是取銷了，但祇在儀式方面，暫告結束。事實上，共產國際的工具，人員，和團結，更加强了，因為將從事地下工作。史達林說，「必要時對剝削階級和他們的政府，出以行動，甚至訴諸武力，亦所不恤。」如果史達林的政府——而不是美國——第一發明了原子炸彈，真不知將要發生怎樣的後果！

因我的地位關係，我可以聽到內幕消息。最高領袖們中間，時常吵鬧，爭取繼幸，頗有引人入勝的資料。閒談中最有刺激性的題目，是史達林自己。聽得說他的消息是下棋和打彈子，最愛喝酒，時常用成語去剪短人家的談話，號稱喜歡音樂，但鑑賞力可惜不很高。據說遇着重大的決定，他喜歡去「請教」陵寢內死去的列寧。大眾都說他極其迷信，爲了「預兆」的不利，有時變更他的計劃。他根本是個孤獨主義者，愛好祕密，喜歡獨自幽居。他的個性非常頑強，只知依賴武力，把奸詐也認爲武力的一種。他是睚眦必報，從沒有聽見他寬恕或遺忘了人家的過失。許多年來，他出於不得已，差不多將他最親近的朋友和同志都殺光了。最親密的只有米柯楊·伏羅希洛夫，貝里亞，和莫洛托夫。他日理萬機，沒有時間去縱情逸樂，所閱讀的書是很嚴肅的。厭惡出現於公共場所，這或許由於他的面目可憎，很像一個便便大腹的侏儒，膚色比大多數人知道的還更黑些，較近於亞洲種，面上滿是痘瘡，左臂一部是彎曲的，牙齒高低不齊，多是蛀孔。

十一月七日，革命紀念日已近，雖有戰禍，但仍頒發特別配給品。人民委員會內每個雇員祇領到一基

繃白麵包，五基羅甘薯，和三磅蜂蜜，不够分配。官場中的食品要好得多。我們收到豐厚的包裹，依照各人在聲望上地位上而分級的。

人民委員會設法，最後撥給我一所公寓，兩間居室和一間廚房——就莫斯科的居住情形而論，已是十分富麗堂皇了。房屋委員會主席說，「現在你得向祕密警察部副主任報到。」「但這和祕密警察部有什麼關係呢？」我問。「這是一件屬於政府的公路，政治局委員們每天得經過這兒，所以沿馬路的住宅，性質有些特別。」我明白這點了，但我住在那兒，並不會對於史達林的安全，造成一種威脅。可是我命中註定不能佔有這所公寓。正在這時，一個派往外國去的機會發生了。擴大租法案的進行，使我們有遣派擅長經濟各門的人員數百名至英國，加拿大，尤其是美國的必要。

一天晚上我和一最友善的朋友，國際貿易組織內頗有地位的官員，討論租借法案情形。謹慎而巧妙地，我用談話去逗引他。他說，「我知道我們在那兒需要更多的人，我看看辦罷。」我謝過了他，不信他的建議竟能成爲事實。約兩星期後，配姆菲洛夫傳我去。起初我以為也許與出國的夢想有些關係，但我是錯了。配姆菲洛夫娶和我商議一件事。有許多冶金工廠的工作情形，極不能使人滿意，需要一個具有堅強手腕的人，去矯正他。他說，「我想你就是這個人，我要你了解這絕對沒有降級的意思。」我表示接受。實際上我很高興，以一負責的人民委員會科長的要職，派往國外服務，是未必能成爲事實的。現在被調的機會，就比較容易了。

戰事已得到更有利的轉機。德人離開他們的補給基地太遠，而且在不慣常的冬季生活之下，增援是實際上不可能的。同時我們又打了個勝仗，殺得德人遺屍遍地，流血成河。在這戰役內，紅軍所獲得的德國軍械，足以配備三四十師的軍隊，希特勒也自食其果了。

二六 到美國去的前奏

我到美國，在是一九四三年一月，才有成議，而出國護照，實際上是在七月份發給的。調查是鄭重其事，先盤問我從生出到現在的個人歷史，然後再及於我祖父母，父母，兄弟，和家譜上旁系親屬的歷史。血系親屬都弄清楚了，再縝密地追溯凡有婚媾關係的姻親，詳細問我許多年來的朋友及職業上的同事。他們給我一組印就的問答題，令我填好交卷。我遵照命令進行。隔了幾天，我得到了回音，「假如遇有派你出國的必要時，再會通知你。」

差不多三個月過去了，我幾乎完全放棄了這希望。但在四月，一個雨雪的晚上，我却發現一紙神秘的通知，我必須與某號電話通話。我奉命立刻過去，受到更狡猾的盤問，有時善言逗引，有時厲聲詰責，用詭奇的問題來哄誘我。格許貢和杜洛甘兩位教授所授的夜課，現在竟對於我大有裨益。

我又須向人民委員會黨部主任委員，米羅諾夫同志處陳述一切。米羅諾夫是慫恿的，但十分拘謹。他試驗我對於政府及我們敬愛的領袖的忠誠。第二天，他給我一封信，一封很好的信，證明我的政治和辦事的人才。最後我奉命到國外貿易部的醫藥實驗所去檢查體格，攝影處去拍攝我的面貌，作為官方記錄。兩天後，我得到通知，去向勒埃特夫同志報告。他是國外貿易部副部長。

經過了正式寒暄，勒埃特夫再開始盤問我，逐一錄下來。他最後嚴肅地說，「你覺得出國任務的重要嗎？」「是的，我已再三考慮過了。」「你必須不負黨的託付。」「我將竭力圖報，」我說。「以後的事，再通知你。」

不久我又應與某一號碼通話，請我在明晨十一時三十分報到。我照命令到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處去，因其尊嚴，所以特別神祕，官僚文章的意味也愈重。我的證件又經過一番詳細檢查。一位官吏說：「我要知道你的見解，你的政治思想。」我胡亂地吹着。「你會懷疑到黨的政策政策的賢明嗎？」「絕沒有，」我迅速地說。「好的，你在四五天內，也許就能聽到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一星期內，我奉到了調入國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命令。第二天我就到國外貿易部的原料輸入管理處報到。他們頒給我一些機密報告和訓令，使我熟習租借法案的手續。

然後我又奉召至中央委員會總部，發給兩本機密的小冊子，說明共產黨員在國外時舉動上應守的規律，尤注重於違背命令的罰則，我讀後永遠不忘。冊子中警告着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活上的誘惑，陷阱，和勾引，不准與外人作不需要的談話，絕對不能議論政治。假定有女子，尤其是會說俄國話的女子，逗引我們和她談話，我們須毫不猶豫地躲開她。女色以外，酒可算是第二種釣餌。除公務上的原因外，不得擅入酒排間與夜總會。

交還冊子以後，便到另一辦公室，另一中央委員會的官員處，聽候訓話。他聲調很是嚴肅：「你得記住，對美國人講起來，你並不是而且從來做過共產黨員。你須說，對於政治，不感興趣。在美國，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是在地下工作方面發揮他的威力。不必帶你的黨證前去，表面上你祇是一個工程師罷了。這一點你可明白？」「是，我懂得。」

第二天，我又到共產黨總部去。另一官員，比較更為威嚴一些，正等候着我。又是一番講經說法：「你須成爲我們美國的耳目。到了華盛頓之後，即向塞洛夫同志報到。你將黨證繳進後，我們另給你一種證件。你將證件交給他，他會知道一切，那可清楚嗎？」「十分清楚。」「還有一件事情，不要傳布你行將

出國的消息。」爲什麼派遣一個購料代表，須守祕密，我並不知道。

還許多手續，都辦妥了，我然後再度進謁勒培特夫同志。勒培特夫面現微笑，再三教我們謹防着美國祕密警察的奸計。「當心美國女人的大腿啊，」他用着該諧的聲調說。

當我回到家中，我帶了一本紅的小冊子在胸袋中，此即蘇維埃的出國護照。在家中，阿愛麗娜正盼望着我。她一些不知道我的意志所在。而我心上則知道或許不會再見到我國和我民。我在動身的前幾天，未免有些依依惜別了。

當然有十幾個朋友，我應在動身以前，和他們晤面的。中有一位是化學專家，在政府中，佔一很高的位置。他是在大清黨事件內受過迫害者之一，後來是「開復」了。他熱烈地和我握手，「恭喜你，維底亞！假使不是爲了我的妻兒，我自己也要出國旅行一次，……」他和我暢談了：「他們以爲將這些糜爛的徽章，可以買服了我的心了。但他們是錯誤的，我沒有忘掉他們給我的痛苦。你知道，酷刑是怎樣的難受呀！你聽到過用燈光逼供的方法，但我會身歷其境，強烈的電燈泡在眼前炫耀着，我坐了足足有七十二小時，沒有睡覺，沒有食物，沒有飲料。我打着乾噁，眼睛生火，像燒紅的煤一般。他們做出各種新奇的變化，這些刑審的天才作家。他先給犯人鹹的食品吃，然後不讓他們喝水。犯人的頭髮，連同頭皮，一齊連根扯去。我在刑審室內，他們用長而且濕的手巾鞭打着，先把我渾身脫光了，鞭打着我的面部，我的腰部，然後向我的兩股……向我的下部抽着。他們釋放我後，我與妻子的關係，竟名存而實亡了……」

在莫斯科最後幾天，另有一件意外事情發生。這是一位最有權力的共產黨員，我一度曾去救護他，他尚未忘懷。「你真要去了嗎？」他說，「恭喜你！但我須同你講。在國外，你常有洩露你的感想的危險。然後突然被召返國，借着一些十分合理的藉口，因此一切就完了。這兒在國內，照我估計起來，任何辦公

室內，每五人中，就有一個間諜。現在你所去的地方，却近於三與一之比。」「我十分感激你，我將竭力留意，」我謝了他。

阿愛麗娜到站上送別。我安慰着她。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面，但我一點不能告訴她，使她完全睡在鼓裏，要好得多。

一個白髮的人，和我合住在兩個鋪位的車廂中，用互不信任的方法，我們漸次相熟了。「我正向海參威去，」我回覆他友好的詢問。他的答覆，對於我所問的，還安不着邊際，——「烏拉爾省過去。」那夜，祕密警察跑了來。我將護照交給他檢視，我的朋友，也出示一張同樣的出國護照。我們大家都到外國去，我們兩個人，全都撒謊，不敢直說。

他過了烏拉照省，隨即下去等候換車。他的位置立刻給一位穿皮外套的大漢所佔據了。那大漢老是喧嘩，大驚小怪，神氣很自負，後面跟着一個青年，他的侍從。我立刻認識這位新來的是鮑羅廷同志，以前是史達林格勒區域內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大腹便便，細小的雙目，在一張冷酷而扁平的臉部上，狡猾地望着。「我會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嗎？」他問。「是的，在人民委員會內。」「好極了，你上那兒去？」「美國。」鮑羅廷是因公而上阿爾泰區域去，本乘飛機，被迫降落，不得不改坐火車。他食物帶得很多，陳列着很豐盛的午餐。餐車經理因鮑羅廷大駕光臨，感覺到誠惶誠恐，每夜特地為我們設下晚宴，平常人不能加入。在車站上，偶而看見受餓，半裸，無家可歸的兒童，鮑羅廷將一些吃得很乾淨的鷄骨，擲出窗外，那許多饑餓的兒童立刻便向這些珍寶，跳躍而前，連每根骨頭，都經過劇烈的爭奪。鮑羅廷緊繃了一皺雙眉。沒有多久，鮑羅廷也就下車了。餐車經理，鬆了一大口氣，差不多可以聽得出他的欣慰的神情。他的空隙，由另一位蘇維埃貴族填補。他和鮑羅廷同樣營養充足，同樣自滿，但溫和不少。

在海參崴，我耽擱在迎賓旅館內。海參崴是十分富於朝氣的，穿制服的水手到處可以見到，碼頭上美國物資堆積如山。我乘汽車到港口的海關公署中去。三個祕密警察，一個穿便服的，有條不紊地搜查每一只衣箱和包裹。

在船中佔了一間小而舒適的房艙，我心頭湧起了不少思潮。我向我的朋友，我的家族，我的過去，已告永訣，我離開了祖國去尋覓自由。我回想到我的幼年時代，我回想到我所得到的經驗。我的父母會因為我所決定的計劃而遭受痛苦嗎？還有阿愛麗娜，她會因為我的行動而受到刑責嗎？我的朋友能知道爲什麼我不得不離棄他們嗎？

我們經過日本海岸時，恐懼地注意着兩隻日本驅逐艦在背後跟隨着，一架日本戰鬥機，在我們頭上往來環繞。幾天以後，我們遠遠見到水平線上，有一片陸地，這是美國的一個海島。

至第十九天，加拿大已全境在望。加拿大的海關稽查員隨卽上船，約略地檢視了一下，沒有查驗我們的衣箱，沒有問過我們的口供。停泊後，不到一小時，我們就自由上岸。所謂資本家階級的仇恨，究在什麼地方呢？我一生三十八年以來，這是第一次踏入他國的境界，我已在史達林及其祕密警察的勢力範圍之外了。

二七 史達林的海外部屬

溫哥華！我心中不勝雀躍，我已經得到了自由。當時的心境，恐怕祇有釋放了奴隸才能够明瞭。走在大街上，最興奮的是我看見貨價低廉得令人發笑。

我們這一羣與高彩烈的蘇聯人，惹起了一位老年美國人的興趣，他作自我介紹說：「貴國人民確已于

德國以致命的打擊。」他和每個人握手：「我相信蘇聯終必戰勝。凡屬貴國盟邦，也同深感謝。」幾天之後，我們換乘火車，有一穿制服的美國人來檢驗我們的護照。他略略過目，便闕照道：「可以了。」這樣疏懈，真使我們莫名其妙。個人自由，固應尊重，但他們不怕有人攪亂麼？在赴華盛頓的旅程中，我看見男女不拘形跡地接談，坦白天真，又使我深深感動。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我抵達了美國國都。在火車總站上遇到蘇聯購料委員會派來的代表，原來他已經替我在美國人的家庭中，租好了一間屋子，明亮潔淨，非常舒適，而我的房東似乎對我——一個「了不起的蘇聯人」——也甚表歡迎。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出示身份證件，也不會將我的姓名呈報房屋和賃委員會。相處既久，我們能用一種特別的談話方法，包括使用手勢，以應付日常接觸。

第二天早晨，我向服務機關報到。索洛夫同志儀表不俗，但免不了官僚習氣。我把黨員證遞給他。「多少號碼？」他突然問。我隨口答道，「二四八六四七五。」他接着又問了好幾個問題，我一一答復，他滿意了。索洛夫是蘇聯派駐美國的高級間諜，名義上只是購料委員會裏的一名助理員，絕少參加美蘇之間的交案事件，而實在乃是「美利堅的史達林」。索洛夫同志告訴我，我的頂頭上司是亞力山大·雷斯次赤克，金屬部主任。根據租借法案的規定，有千百萬元的金屬物品，由美國用船隻運往蘇聯，而我的任務是檢查這些物料，察看是否盡合我們的需要，編製各種細目說明，鑑別品質優劣，定其取捨。總之，凡是經過我手的物品，必須由我負其全責。

我們仍生處於獨裁政治之下，脫離不了那可怖的警察掌握。美籍同伴所得到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行動自由，我們一點也享受不到，除非秘密地冒着絕大的危險。凡是我們所看的，所想的，所能接觸的，完全受到限制和監視，與在國內無異。每人的一言一動，都成爲密探們工作的對象。在黨部會

議中，蘇洛夫同志監督着，討論重要政策。

我的月薪在美金三百元左右。應酬方面的化去的錢，另外撥付，收入相當可觀。但和美人接觸，則限制甚嚴，和美人交友，必須繕具一張詳細報告，由高級人員核准。美人往往親切地表示着好感，但倘使我接受了他們的邀請，那便是自找麻煩。

一位年老的美國婦人，在我們的機關中，當個小差使，屢次要我到她那裏去敘談，我不好意思拒絕她。數星期後，我無時不在恐怖狀態之下。每次我被傳到黨部祕書室中，心早下沈了。便是新年中發幾張賀年片給美國的官員和商業上有關係的人，也要經過上面的許可。管理之嚴，可想而知。

我們有時也不能避免用異性的吸引力來刺探一點內部消息。有一次，我被直屬長官叫了過去。他說明他所經辦的一個難題：這是戰時生產局中一件很重要而急待辦理的事情，而該局主要人員，有一位是年輕女子。他說：「我要你去和這女子交友，帶她到夜總會去，買一些她所愛好的東西送給她，博取她的歡心，這事情便容易辦了。」我聲明我沒有辦這件事的能力，我簡陋的英語，難以應付。

有一天，在紐約接洽事務，我去看米脫牙。我發現他犯了大罪，正在看一本俄文雜誌——「反革命」的禁書。我故作大驚，大聲呼道：「你看這個！」我那朋友臉色頓時慘白，眼中流淚，求我饒恕他。我向他保證，並無報告他的意思，並且說，我也曾看過那本雜誌。於是我們作長夜之談，他透露他的意見，與我相同，因在國內還有個家庭，所以不敢斷然宣佈脫離。我不會把我的真意告訴他，以免他知道了反担心事。

雖然沒有命令禁止我們閱讀報紙，但也需審慎，至于哈斯脫和司格立潑·霍華德的刊物，則在違禁之列。最安全的是看勞工日報，或俄文的格羅查爾，袖珍版的紐約郵報，以及親蘇的雜誌如「民族」和「新共和」之類。「生活」在意義上也可是可取的，但因刊載了前大使威廉·蒲立德的一篇文章，論及蘇聯對歐

政策，而地位一落千丈。

我在赴華盛頓的途中，偶然翻看星期六晚刊。忽有一位B同事走進來談談。數天後，竊賊馬可夫就叫我到他辦公室中去查詢。幸而B同志沒有勇氣堅持他所提出關於我反革命的報告，主任才決定不再追問。

另一件小事是這樣的。有一次，我略感不適，美國同事寫條向我問候。馬可夫同志忽然又叫我去，問這些寫信給我的美國人，和我究竟發生了什麼關係。最後，他給我很嚴重的訓誡。

通信是另一種危險行動。美軍中一排長，從兵站上寄給我一張明信片，偶然給機關中長官看見了。我立刻被傳到當局那裏，定了「未得許可證，和美軍通訊」的罪名。我費了好多時候，說明這排長是我房東的兒子，房東與我相處得很好，純是友誼，毫無政治作用，而且並不回信。最後一句是諛話。事實上我是覆他的。

辦公處有一圖書館。一天晚上，我借了一本浮德的史書，中間提到德開哈基夫斯基將軍，但未借到。不久我被一高級黨員叫去審問。「德開哈基夫斯基是個叛逆，已殺頭了，要去研究他，豈不可怪？難道你不知道浮德一書，在蘇聯已禁止發行了嗎？」圖書館是監視我們思想的重要工具。

監督之嚴，在國外更比國內為甚。在國內的朋友，祇知道我們辦事處的地點，每封信轉過來，都經折頭，然後交給我們。寄回本國的信，託人帶去，也必須開口交給機關中轉過去。

不論蘇維埃經濟代表的特殊工作如何，其最大任務是在搜集美國商業，工業，軍事，科學上的種種統計。在黨部秘密會議時，我們公然把搜集經濟資料及其他有用情報當作我們的重要職務。

美國人似乎有意每件事都說史達林好。克萊姆林宮造成了許多外交上的錯誤，但在美國印刷品和美國人的談話中，幾乎以為他是不可思議，神祕異常的。美國通訊社所收到莫斯科的消息，不但沒用，而且往

往是錯的。在國內，我們完全知道這是要打折扣的，何況美國新聞記者，只能從莫斯科報紙上摘錄一些材料，沒有其他來源。克來姆林官所撒的謊，在他們都認為可靠。生長在民主國家中的人，如何會知道統制新聞比沒有新聞更壞呢？

在知道一些蘇聯生活的人看來，以為史達林之後——史達林不是也有死的一天嗎？——社會主義的民主，也許能發揚光大起來。但不幸的是種種劣點，已在蘇維埃制度中生出了根，即使史達林死了，也不會消滅。其他獨裁者，或獨裁團體，還會繼續下去。

我發現許多華萊士的演說稿。一個譯員解釋給我聽，我簡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民主政府的副總統，稱讚在史達林統制下，警察密佈的政府，是個「經濟的民主國家」。我會努力讀完威爾基的「天下一家」。但他到蘇聯的時候，我會見宣傳的人，用了種種把戲，給他一個好印象，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這計劃果然成功了。但我又奇怪，一個人竟會這樣容易受欺？

我到華盛頓電影院中去，看見放映的是一張新片，「莫斯科印象記」，依據前美國駐俄大使台維斯所寫的書而編成的。我看這本書是對於蘇聯人民的重大侮辱——好似謗譏他們革命的失敗，嘲笑他們長期的痛苦。這本書的內容，不僅荒謬，簡直是糟透了，全不明瞭實情，前後矛盾得可笑。另有一張影片，叫做「北星」，也使我十分失望。那是一齣滑稽歌劇，描寫一個充滿愉快的蘇聯村落，沒有一塊不是肥沃的土地。那裏的農民，一天到晚，都過着享樂的生活，歌唱，跳舞，流露着天真的愛。我問問自己，為何美國人將這樣一個痛苦的國家，描寫得像天堂一樣？為何他們要掩飾布爾希維克的恐怖，洗刷史達林的罪惡？很明白的，有一班人，聽了蘇聯宣傳家的甘言蜜語，不分皂白，也說着蘇聯的謊話。此乃階級爭鬥中的一種手段，奪取政權的捷徑。但為何大多數的美人也會囫圇吞下呢？

史達林的宣傳員，在海外的成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社會主義的理想樂土，在國內認爲是一派胡言，而在民主世界中，却認爲真有其事，幾乎視同宗教上的信仰一般，不易動搖了。

二八 因不公平而出亡

當報上發表我驚醒了史達林的迷夢，反叛蘇聯政府，而傾向於美國民主的消息時，我已脫離蘇聯聯料委員會，開始嘗試美國的自由風味。我是經過了周密的考慮，纔決定解脫那嚴重的束縛的。現在我已能隨時隨地，自由活動。

蘇聯的希望是黑暗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保證是遙遠的。大西洋憲章公佈了，四強協定成立了，人民都抱着無窮希望，可是不久必盡成泡影，僅是白紙上寫黑字而已。

爲何我要在美國耽擱七個月後，纔解脫這束縛呢？因爲我在大轉變前，需有充分時間來認識那新環境，估計我的計劃的價值。在美國，我一切覺得陌生。七個月的時間，使我對於美國生活漸漸習慣，學得了一點簡單語言和社交常識。我要使他們無所藉口，所以把最重要的借款合同，辦得絕無不妥之處。我小心地計算我所有的金錢，自己祇剩了三十元。在那時我一元要當作一千元用。

在本書開始時，我已成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我是共產黨怨恨的目標，四周充滿着恐怖氣息。但我審慎考慮的結果，我終於選擇了自由，去替代那奴隸生活。做一個現代獨裁統治下的國民，專制壓迫，使他時常要惴惴不安，心理上發生反感。

當我離開華盛頓時，我知道參謀部要擢升我，但助桀爲虐，對於人民一無幫助。想了好久，我決定仍

留在海外。我要反抗苛政，尋求自由。此後，我再不是過去的克拉夫齊科了，我將叫什麼名字呢？

在曼漢頓村中一家旅館裏，我草就了那份報告書，一部分已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其餘則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寫好的。勝利以後，我將那報告書再看一遍，覺得沒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當克萊姆林宮計劃和英美締結盟約時，我覺得這是一個矛盾。第三國際還沒有解散，莫斯科繼續指揮着各地共黨的活動，還是很明顯的。史達林的政策，已深入波蘭，巴爾幹半島，捷克，匈牙利，奧大利，以及其他各國。我發見他們的目的，純粹是蘇維埃主義而不是民主的。

史達林已草擬了納粹犯罪罪行的報告，來顯示納粹政權的殘酷，但我讀後，以為對於蘇聯政權，這結論也極適當，祇要在報告中將納粹改為蘇聯，這就是克萊姆林宮中統治者的寫照了。

當報上宣佈我的行動時，蘇聯聯料委員會伴作不知，顯然是要等待莫斯科的訓令。他們最有力的要求，我可不曾想到，即我是一紅軍軍官，因此我這次政治上的轉變，可能當作軍隊中的逃兵，按照法律，引渡到史達林軍隊之前，雖然我的軍營生活，早已在兩年前結束，此後祇是一普通公務員。共產黨的報紙，竭力鼓吹，引起論戰。四月五日，勞工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攻擊文字，是由史太洛平署名的，題目是「中途免脫的逃兵」，用政黨間設罵的口吻來寫，不知者不能辦，但我已耳熟能詳了。這是直接對我感戴。史太洛平在報告中說，「蘇維埃的叛逆，一時或許可以誘惑許多人，」同時又警告着說：「但我們自會用精密的報復手段，去抓住他，毀滅他。」

在紐約，我雖小心戒備，但蘇維埃的偵探，仍不辭監視我，絲毫不會錯誤。我幾次掉換旅館，改用姓名，但在我所住的旅館對面，總有人活動着，徹夜看守着。我屢次雇汽車疾駛而去，但他們老是追隨着。有時我約了朋友到郊外去消磨一些時光。他們都是美國人，在我發表了那篇文字之後才認識的。我去時用

盡心計，不告訴任何一人，買票也沒有給人看見。但我又錯了，我的朋友在火車站月台上等着我，告訴我，在過去一刻鐘內，有三個人毫不掩飾地在偵察我。有一輛祕密車子，屢次在我住所附近巡邏。同時又有長途電話從紐約打來，對我說：「現在你的生命很危險，該躲藏起來。」這陌生的聲音，顯然是對我威脅着。房東把我換了一個地方，那裏不容易給人發現，使我較為安全。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許多美國朋友，也有幾個蘇聯人，設法保護我，避免威脅。

現在這本書是寫完了。兇手們仍在繼續幹他們的工作，要毀滅我。可是這本洩露蘇維埃壓迫人民的報告書却是毀滅不了的。我希望有一天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蘇聯人民，一定須從強暴政權下解放出來。假使有天傳奇蹟似的，蘇聯忽然成爲民主國家，那末威脅人類和平的緊張局面，自然解除，世界也真正能够合作了。

這本書是蘇聯一個典型人物的生活經過。他不會拋卸自由意志，而要向美國及全世界的民主主義國家，大聲呼籲。

書 後

我開始寫這本書，是在脫離蘇聯購料委員會之後。在艱難和恐怖的環境之下，度着飄泊生活，隨時掉換住所，改姓移名，冒用國籍，躲在美國人或本國人的家中。他們都親熱地款待我，給我精神上的鼓勵，使我非常感激。

當我脫離了購料會後，戰事仍進行着。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在軍事上密切地合作，使我受到一層束縛

。但我願忍受，因為共同勝利，該比什麼都要緊。現在勝利已到，所以我必須把我要說的坦白地說出來，此即本書所講的是。

另一原因是，當大戰結束後，有許多國家和人民——有的是自動的，有的是被迫的——有左傾之勢。這種傾向是很自然的，假使初步即以克來姆林宮的獨裁共產為模範。但很不幸地，在世界上尚有很多地方，仍在蘇維埃勢力之下，為蘇維埃主義所控制着。

蘇聯人民不能把自己的苦痛來告訴全世界。現在我把克來姆林宮獨裁主義的全貌發表出來，給民主國家看，喚醒世界去反抗這欺騙手段，實在不無小補。

蘇聯的獨裁政治，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問題，或民主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人類的問題。世界人類，不能讓占有六份之一土地的人民白白地犧牲掉了。

克來姆林宮的領袖，雖不承認人民經濟上政治上的基本自由，但在國外宣傳者，卻要使人相信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另有一種自由，——與民主主義的「老式」自由，恰恰相反。

這本書是用俄文寫的，所以不得不翻譯，但譯得很忠實，很詳細，我又親自校閱過，確作定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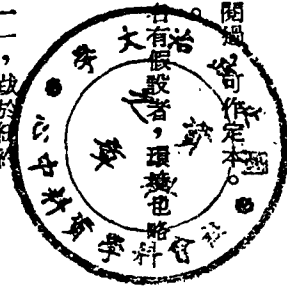
這書是個人寫照，所以關於政治上的複雜問題都刪除了，我預備將來另寫一書。地者有假設者，環繞也略料。因要保護蘇聯極權政治之下的可憐無辜之人，所以我更換了幾個人的姓氏。地者有假設者，環繞也略料。略掉換一下。但這種掩飾，無關大雅，並不利於事實的真實性。

我將這書貢獻給各地前進的，有社會思想的人們。

維克多·克拉夫青科

李正手

一九四六·二·一一，藏於紐約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我選



自由 (簡本)

價新臺幣 壹元

著譯者

維克多·克拉夫青科著
勤宜譯·冰士節

贈稿者

季

灝

印行者

臺灣省教育會

國家圖書館



002822123

